

國際問題研究

2026 年第 3 期（总第 233 期） 双月刊 2026 年 5 月 15 日出版

■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 1 习近平外交思想蕴含的共同繁荣观 江时学 周 青
- 20 中非命运共同体：从重要理念到伟大实践 吴传华

■ 区域与国别

- 40 特朗普“常识革命”：理念建构、政治实践与范式冲突 刘飞涛
- 63 技术右翼介入美国政治：影响及挑战 赵明昊 姜星宇
- 92 从秩序到权力：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演进 王 浩

■ 国际关系

- 114 美俄关系新调整：观念基础、内外驱动与实践限度 赵 隆

Table of Contents

The Vision of Shared Prosperity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JIANG Shixue & ZHOU Qing

The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rom Concept to Reality

WU Chuanhua

Trump's "Common Sense Revolution": Ideological Formation, Political Practice,
and Paradigmatic Conflict

LIU Feitao

The Tech Right in American Politics: Influence and Challenges

ZHAO Minghao & JIANG Xingyu

From Order to Power: The Evolution of Revisionist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NG Hao

The Recalibration of US-Russia Relations: Ideational Foundations, Driving Forces,
and Practical Limits

ZHAO Long

Abstracts

习近平外交思想蕴含的共同繁荣观^{*}

□ 江时学 周 青

〔提 要〕习近平外交思想蕴含着共同繁荣观，其主要内涵包括共同发展、普惠包容、合作共赢、成果共享。共同繁荣观指明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凸显了发展的重要性，为缩小南北差距确立了大目标，为南南合作注入新内涵，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动力。共同繁荣的缺失不利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稳定，不利于弘扬社会正义和国际正义，不利于构建和谐的南北关系，不利于共同应对全球问题，不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不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政局稳定，不利于发达国家自身的发展。为了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高度重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工作，确保中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实际行动参与和推动南南合作，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繁荣观、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江时学，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周 青，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6) 3 期 0001-19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A170）的阶段性成果。

繁荣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目标，共同繁荣是这一目标的道德内核与最终形态。在国际关系层面，理想化的共同繁荣是指世界各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实现均衡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一种状态。但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与发达国家（全球北方）之间的贫富悬殊十分明显，而且久治不愈。这一残酷的现实既损害了国际正义，也破坏了南北合作的信任基础与发展前景。

在西方发展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较多地使用“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分享增长”（shared growth）、“普惠式增长”（broad-based growth）、“面向穷人的增长”（pro-poor growth）、“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等概念。这些概念表述各异，但核心关切点是通过经济增长提升整体福利水平，并在增长过程中兼顾分配问题。由此可见，他们关心的是增长和发展，认为缩小或消弭南北鸿沟的手段就是加快增长和发展。相比之下，习近平外交思想蕴含的共同繁荣观既重视共同繁荣的前提（共同发展），也关注共同繁荣的准则（普惠包容）；既强调共同繁荣的路径（合作共赢），也聚焦共同繁荣的核心（成果共享）。换言之，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就是为了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悬殊，夯实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根源上化解冲突与动荡。中国的繁荣是人类期盼的共同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不是追求一枝独秀，而是希望百花齐放，在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携手共进，为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共同繁荣观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习近平主席着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在 2013 年 3 月访问俄罗斯时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 年 9 月，习近平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总体框架，其中之一是“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1]2017 年 1 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出了建设“五个世界”的总目标，其中之一是“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2]

共同繁荣涉及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在国内层面，共同繁荣是指一个国家的全民共富，其核心要义是一国的全体人民能够在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受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崇高目标。在国际层面，共同繁荣则着眼于全球视野，倡导各国摒弃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秉持平等、互利、共赢的开放理念，加强经济合作，共享科技进步的成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挖掘发展机遇，不断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南北差距）。

应该指出的是，国内层面的共同繁荣与国际层面的共同繁荣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国内层面的共同繁荣为国际层面的共同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力量支撑，国际层面的共同繁荣则为国内层面的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毫无疑问，国内层面上的共同繁荣不仅关乎一国经济的稳健增长，而且涉及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质量与人民幸福指数的关键指标。国际层面的共同繁荣既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也能促进全球治理；既能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能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既能助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能改善南北关系。因此，实现国际层面上的共同繁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从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的重要讲话中可以看出，共同繁荣观的内涵主

[1]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9 日，第 2 版。

[2]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全文）》，新华网，2017 年 1 月 19 日，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81.htm。

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共同发展是共同繁荣的前提

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因而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主题。只有加快发展，才能促进社会进步，才能积累可供分享的财富。因此，共同发展为共同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历史与现实已充分昭示，发展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各国利益交融、兴衰与共的正和博弈。此外，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市场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增强，各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互交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任何试图将他国排斥在发展之外的孤立行为最终都将反噬自身。只有实现共同发展，才能释放全球经济潜力。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各国应该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1]“人类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追求现代化，都应该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走在前面的国家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要坚持共享机遇、共创未来，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蛋糕’，努力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坚决反对通过打压遏制别国现代化来维护自身发展‘特权’。”^[2]

（二）普惠包容是共同繁荣的准则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各国应该超越差异和分歧，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包容发展，携手应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少全球发展不平衡，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各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449 页。

[2] 同上，第 433 页。

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1] 确实，繁荣不是少数国家独享的“盛宴”，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普惠包容正是世界各国在共享世界经济发展成就时应该奉行的准则。这一准则强调的是，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这一准则并非追求发展水平的绝对均等，而是要求尊重各国发展差异与自主选择，摒弃排他性政策，通过平等对话、互助协作，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支持，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以缩小全球发展鸿沟，最终实现共同繁荣。

（三）合作共赢是共同繁荣的路径

发展从来不是少数国家的独角戏，而是需要所有参与者共同演绎的交响乐。合作共赢倡导的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使各国在相互成就中共同进步，在优势互补中共享机遇。此外，合作共赢打破了零和博弈的片面思维，构建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发展格局。尤其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各国利益深度交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自实现繁荣。同样重要的是，合作共赢能够汇聚起最广泛的力量，鼓励各国发挥各自优势。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市场，都能在合作中实现价值最大化。这种众志成城的合力，正是推动共同繁荣最强劲的引擎。习近平主席用“陆锁国”“陆联国”“拉一把”“赠人玫瑰”等生动的比喻阐述了合作共赢的重要意义：“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只要各国合作的愿望、协调的行动，天堑可以变通途，‘陆锁国’可以变成‘陆联国’，发展的洼地可以变成繁荣的高地。经济发展快一些的国家，要拉一把暂时走在后面的伙伴。只要大家把彼此视为朋友和伙伴，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成就，赠人玫瑰则手有余香，成就别人也是帮助自己。把别人的发展视为威胁，把经济相互依存视为风险，不会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快。”^[2]

[1]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53 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第 464 页。

（四）成果共享是共同繁荣的核心

共同繁荣是人类社会的崇高愿景，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正是这一愿景最本质的体现。这一愿景回答了“经济为谁增长”“繁荣为了谁”等根本性命题，体现了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正义感和国际责任。换言之，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仅为少数国家独享，那么，无论这一成果多么耀眼，都只能是局部的繁荣或少数国家的繁荣，与共同繁荣相去甚远。如果发展只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如果增长的果实只为少数国家垄断，那么世界将陷入贫富分化、矛盾丛生的泥淖，共同繁荣便无从谈起。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各国应该坚持包容普惠，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追求幸福生活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人类社会要持续进步，各国就应该坚持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1]

二、倡导共同繁荣观的时代意义

共同繁荣观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中华文明既有“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价值追求，也有“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共同繁荣观站在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高度，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将世界各国的共同福祉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目标之一。

共同繁荣观强调了人类社会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历史必然性。这一必然性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命运紧密相连的客观现实。换言之，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表明，世界经济的持久增长和财富的不断累积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世界才能更好地发展。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富者愈富、

[1]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第153页。

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1]。

在全球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持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倡导共同繁荣的理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一）指明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2] 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是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共同繁荣观反对以邻为壑的经济霸权，倡导通过做大“蛋糕”来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并主张各国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兼顾他国合理关切，通过深化互利合作、扩大利益交汇点，构建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型发展格局。因此，共同繁荣观不仅超越了零和博弈的经济霸权思维，而且为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凸显了发展的重要性

发展与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发展是共同繁荣的前提与基础，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硬道理”；共同繁荣是发展的最终指向与归宿，也是衡量发展质量和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准。纵观世界历史进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以发展为动力的。因此，为了实现共同繁荣，必须加快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 习近平主席也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当今时代的许多问题，追根溯源都是发展不充分造成的。”^[4] 他还强调：“要把发展置于国

[1]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88 页。

[2] 同上，第 133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23 页。

[4]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第 232 页。

际议程中心位置，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打造人人重视发展、各国共谋合作的政治共识。”^[1]

（三）为缩小南北差距确立了大目标

南北差距难以缩小是一个久治不愈的痼疾，既不利于改善南北关系，也不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践行共同繁荣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方向改革，打破长期以来制约南方国家发展的技术垄断、金融壁垒与规则不公，使南北关系从单向性依附转向相互依赖和共同发展。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合作才能办成大事，办成好事，办成长久之事。发达国家要履行义务，发展中国家要深化合作，南北双方要相向而行，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2]

（四）为南南合作注入新内涵

一方面，弥合全球发展鸿沟和缩小南北差距是全球南方的追求；另一方面，南南合作旨在通过发展中国家间的资源共享和能力共建，实现集体性发展跃升。这与共同繁荣观倡导的合作共赢和“不让任何一国掉队”的理念是高度吻合的。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伟大创举，是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团结互助的合作，帮助我们开辟出一条崭新的发展繁荣之路。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提升，南南合作必将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崛起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持久、平衡、包容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3]他还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大雁之所以能够穿越风雨、行稳致远，关键在于其结伴成行、相互借力。”^[4]

[1] 《习近平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全文）》，中国政府网，2022年6月24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6/24/content_5697592.htm。

[2] 同上。

[3] 《习近平在南南合作圆桌会上发表讲话》，新华网，2015年9月27日，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7/c_1116689451.htm。

[4]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第43页。

（五）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提供了观念上的动力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的大趋势。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以及各国人民交往。但是，在世界各地（尤其在发达国家），反全球化的势力之强大，也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习近平主席将其称之为经济全球化遇到一些“回头浪”。毫无疑问，这一“回头浪”来自多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中受益的程度不同。因此，如何使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中获取更多的收益，努力实现共同繁荣，是遏制反全球化的“回头浪”、推动全球化的关键所在。

三、实现共同繁荣的必要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表明，人类的存在与发展必须依赖于财富的创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创造的财富与日俱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二十一世纪初，非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约为十九世纪初的8倍；在1820年至2010年间，世界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约10倍。^[1]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用大量数据说明，人类社会在第一个千年，人口仅仅增长了约17%，人均收入不仅没有增长，甚至有所下降。但在第二个千年，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人口增长了22倍，人均收入增长了13倍。尤其在182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1998年的人均收入比1820年高出8.5倍。^[2]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J. Bernstein）的研究同样表明，

[1] Jan Luiten van Zanden et al., eds., “How Was Life? Global Well-Being Since 1820,” OECD, 2014, p.32,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14/10/how-was-life_g1g43e0f/9789264214262-en.pdf.

[2]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2006, p.29,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06/09/the-world-economy_g1g-h69e4/9789264022621-en.pdf.

在1820年前，财富的增长极其缓慢，甚至是停滞不前的。此后，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呈现出爆发性的增长。^[1]

繁荣的对立面是贫困。受多种国内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对贫困的认知和界定是各不相同的，因此衡量贫困的尺度显然也是各不相同的。为了进行国际比较，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以1985年购买力平价（PPP）为依据，将贫困线（poverty line）确定为平均每天维持生计的开支低于1美元。^[2]此后，世界银行多次提高贫困线的标准，2025年6月确定为3美元。根据这一标准，世界上约有8.38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3]由此可见，虽然人类社会创造的财富在增加，但国与国之间的贫富悬殊并没有消失。根据世界银行每年7月公布的数据，2025年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平均数仅为1135美元，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数则高达13935美元。^[4]2024年，布隆迪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19美元，而摩纳哥则高达28.8万美元，两者相差巨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认为，虽然世界上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在减少，但全球范围内的不公平依然很严重。^[5]世界银行出版的《2024年贫困、繁荣与地球报告》甚至认为，全球范围内的减贫进程已几乎停滞不前，2020年至2030年将成为“失去的十年”。^[6]

[1] 18世纪中叶开始不断发展的工业革命，无疑是欧洲经济取得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参见威廉·伯恩斯坦：《财富的诞生：现代世界繁荣的起源》，易晖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页。

[2]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7.

[3] “Factsheet: June 2025 Update to Global Poverty Lines,” The World Bank, June 5, 2025,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factsheet/2025/06/05/june-2025-update-to-global-poverty-lines?>.

[4] “Understanding Country Income: World Bank Group Income Classifications for FY26 (July 1, 2025–June 30, 2026),” The World Bank, July 1, 2025, <https://blogs.worldbank.org/en/opendata/understanding-country-income--world-bank-group-income-classifica>.

[5]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The Next Frontier: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Anthropocen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2020, p.121.

[6] “Poverty, Prosperity, and Planet Report: Pathways Out of the Polycrisis,” The World Bank, 2024,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67cc31d7-583a-47fa-9e02-ca7a2914f1a1/content>.

为了消除或减少贫困，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措施。例如，2015 年联合国大会第 70/1 号决议通过了著名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一议程明确指出：“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消除极端贫困，是世界最大的挑战，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该议程确定了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个具体目标。^[1]

应该指出的是，也有人认为，南北差距在缩小。例如，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Ngozi Okonjo-Iweala）在世界贸易组织发表的《2024 年世界贸易报告》的序言中指出，由于低收入经济体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收入得到了强劲的增长，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比例从 1995 年的 40% 下降到 2022 年的不足 11%。她认为，这是工业革命以来贫穷国家首次开始缩小与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差距。^[2] 美国学者罗山·潘迪安（Roshan K. Pandian）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全球不平等显著下降，扭转了持续两个世纪的上升趋势。但在南北不平等和南北差距为什么缩小这个问题上，不同学者却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一良好的趋势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许多人相信的所谓“穷国的工业化得益于全球化”，而是因为富国的经济增速在放缓。^[3] 还有人认为，这一良好的趋势应归功于人口规模约占世界总人口 40% 的中国和南亚国家在推动工业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4]

且不论贫困问题的严重性是否得到了缓解，可以肯定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悬殊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而且这一问题的危害性是多方面的。

[1]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2015, <https://sdgs.un.org/2030agenda>.

[2] “World Trade Report 2024: Trade and Inclusiveness - How to Make Trade Work for All,”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24, p.6,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wtr24_e/wtr24_e.pdf.

[3] Roshan K. Pandian, “The Decline of Global Inequality in the 21st Century: Reconsidering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29, No.5, 2024, p.1493.

[4] Glenn Firebaugh and Brian Goesling, “Accounting for the Recent Decline in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10, No.2, 2004, p.283.

一是不利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稳定。共同繁荣的缺失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甚至已成为危害世界和平的安全问题。这一危害性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等多维度的复杂机制，其核心逻辑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共同繁荣的缺失蕴含的结构性不平等，会激化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破坏国际合作的基础，刺激有组织犯罪（贩卖人口、毒品走私和武器走私），甚至还会产生美国学者萨缪尔·斯托弗（Samuel A. Stouffer）等人所说的“相对剥夺感”。^[1]众所周知，长期困扰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毒品走私问题和非法移民问题，都与美拉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有关。例如，为了遏制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美国经常性地对拉美动武或用武力威胁，破坏了拉美在本地区构建“和平区”的美好愿望。^[2]

二是不利于国际社会弘扬正义。正义即天下之公义，既体现了公平、公正、平等和善良的信念和行为准则，也蕴含了人类应该具有的体恤弱势群体和对其表达怜悯之心和恻隐之心的精神内涵。因此，正义是社会和谐与进步的必要条件。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通常被看作德性之首；康德坚信，一旦公正和正义沉沦，人类就不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毫无疑问，如果国与国之间的贫富鸿沟得不到弥合，那么，国际社会应该秉持的正义必将荡然无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会公然取代本应普照全球的正义之光，我们今日的漠视与不作为必将成为后代子孙难以承受的历史重负。

[1] 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是萨缪尔·斯托弗等人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设。这一理论假设认为，人们常将自己的处境与自己想象中的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如果比较后发现自己处于劣势，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这种感觉产生的消极情绪会演变为不满、怨恨和愤怒，进而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参见 Samuel A. Stouffer et al., *The American Soldier, Vol. I: 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Samuel A. Stouffer et al., *The American Soldier, Vol. II: Combat and Its Afterma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Robert King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57; Walter Garrison Runcima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Eng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2] 2014年1月28—29日在古巴举行的第二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首脑会议宣告，拉美国家决心在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不用武力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使拉美成为一个“和平区”。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拉美发出这一庄严的宣告。

三是不利于共同应对全球问题。全球问题数不胜数。尤其在最近一二十年，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生态环境恶化、网络安全威胁激增以及传染病的蔓延等全球问题不断恶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正是因为这些全球问题具有全球性的特点，所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团结，齐心协力，共迎挑战。毫无疑问，共同繁荣的缺失以及南北鸿沟的扩大，必将损害这一合作。

四是不利于构建和谐南北关系。诚然，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与其内部的多种因素（如政局不稳定、经济政策失当以及社会问题严重）息息相关。但外因也是不容忽视的。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市场和技术等领域严重依附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正如许多依附论学者指出的那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对称性，其本质就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显然不利于改善南北关系，而且使双方陷入信任危机。

五是不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贫困，无法实现共同繁荣，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这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外向性息息相关。众所周知，发达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包括高附加值产品、服务、技术和奢侈品。如果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性的贫困陷阱，其消费能力就得不到提高，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市场就难以扩大，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就会受到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也难以提速。

六是不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政局稳定。贫困意味着各种资源匮乏，经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就业机会少，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差，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面对这样一种不良局面，不同社会群体（有时甚至是同一个社会群体中的成员）都会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地展开博弈和争夺，民众对政府的怨恨也会与日俱增，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政局稳定难以为继。应该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局不稳定导致的种种不良后果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发达国

家也因此难以独善其身。例如，2010年和2011年西亚北非动荡后，一些西亚北非国家的政局不稳定致使大量难民进入欧洲，使欧洲在此后不久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难民危机。中美洲国家的贫困问题使许多人为生计而被迫背井离乡，使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边境线面临巨大的压力。特朗普政府用巨资在边境线上建高墙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挡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七是不利于发达国家自身的发展。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因此，全球南方的贫困以及由此而来的共同繁荣的缺失，会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良影响：一是导致全球南方的购买力得不到提高，从而使发达国家的商品和服务无法拓展海外市场；二是导致全球南方的经济脆弱性得不到改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难以强化，从而使世界经济增长失去持久的动力和稳定性；三是导致全球南方参与全球价值链、全球供应链和全球生产链的能力无法得到增强，从而使发达国家难以发挥自身在资本和技术等领域的优势。总之，正如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指出的那样，全球范围内的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灾难必然会对发达国家产生反噬效应。^[1]

由此可见，共同繁荣既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诉求，也是应对全球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必由之路；既是弥合南北贫富差距的重要基石，也是人类共存的前提。换言之，正是因为共同繁荣的缺失会产生多种多样的危害，所以，世界各国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平等互利的合作，努力缩小南北差距或弥合贫富鸿沟，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让子孙后代免受今日不公的恶果，共享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

还应该强调，与西方发展经济学大不相同的是，共同繁荣观的内涵强调共同繁荣的前提（共同发展），坚守共同繁荣的准则（普惠包容），追求共同繁荣的路径（合作共赢），进而彰显共同繁荣的核心（成果共享）。

[1] “General Assembly Fifty-eighth Session Official Records 11th Plenary Meeting,” United Nations, September 25, 2003, <https://documents.un.org/doc/undoc/gen/n03/531/33/pdf/n0353133.pdf>.

四、中国为构建共同繁荣世界作出的贡献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发展图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中国的繁荣承载着人类对共同繁荣的深切期待。中国始终秉持兼济天下的胸怀，将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紧密相连，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支持并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中国不追求一枝独秀，而是致力于百花齐放，与发展中国家并肩前行，为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是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这一倡议的要点是“六个坚持”：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这一倡议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既表达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共同繁荣的向往，也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作为；既为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新动力，也为世界各国追求共同繁荣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是高度重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工作。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问世后不久，中国就在2016年4月发布了《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并先后在2016年10月和2017年4月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由于这一议程囊括发展的多个领域，因此，中国政府成立了由数十个政府机构参与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并将落实2030年议程纳入“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十五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中长期发展战略。此外，中国还发布了多个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展报告。这些报告不仅介绍了中国落实这一议程的进展和经验，而且还提出下一步工作计划。

三是确保中国经济取得长足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新关口，2025 年达到 140.19 万亿元。^[1] 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还是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以及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是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由此可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作为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能确保本国经济取得长足的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就是对世界经济作出的重大贡献，也是对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作出的重大贡献。

四是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中国是一个拥有 14 亿多人口和 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最具潜力的大市场。因此，中国的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为了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和利用更多的外资，中国制定了行动方案，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措施，如扩大市场准入，提高外商投资自由化水平；加大政策力度，提升对外商投资吸引力；优化公平竞争环境，做好外商投资企业服务；畅通创新要素流动，促进内外资企业创新合作；完善国内规制，更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这些措施无疑为其他国家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和“便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五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心是借鉴古丝绸之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同各国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国际经济合作开辟新空间，为实现共同繁荣奠定物质基础。迄今为止，“一带一路”合作已从最初的亚欧大陆延伸到遥远的非洲和拉美，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已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 各方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使“一带一路”从构想走向实践，从蓝图变为现实，

[1] 《李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摘登）》，新华网，2026 年 3 月 5 日，<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60305/2dec3fbdfc16487592038bd047bb2aaa/c.html>。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2026 年 6 月 17 日，http://www.scio.gov.cn/zfbps/zfbps_2279/202606/t20260617_994999.html。

从宏观规划的“大写意”阶段迈向细致落实的“工笔画”阶段，基本实现了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国际感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的预期目标，为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

六是以实际行动参与和推动南南合作。讲信义、重情义、行仁义、扬正义、立道义，是中华文明深植的文化基因和鲜明的民族品格，也是推动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虽然国家百废待兴，财政紧张，但依然坚守着这些原则，以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与胸怀向有关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力所能及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谋求发展的事业，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外援助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除了力所能及地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以外，中国还通过技能培训等方式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传授手工艺技术，并大力支持联合国为推动南南合作而开展的工作。

七是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问题的应对之道就是全球治理。在经济领域，多种多样的全球问题不仅破坏了国际经济关系，而且削弱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在道义层面上，中国提出了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治理经济观；在制度层面上，中国提出了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主张，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其他成员国）共同发力，成功地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11月同意对份额和治理进行全面改革；在规则层面上，中国推动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此后又在2020年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在2024年提出了《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在政

策层面上，中国提出了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设想，以避免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1]在工作层面上，中国主动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牵头设置了《投资便利化协定》，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达成《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并带头完成国内核准程序。

八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因资本积累能力弱而无法在基础设施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从而使经济增长面临着难以破解的“瓶颈效应”。为帮助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扩大基础设施投资，2013年10月，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6年1月，该行正式开业。截至2025年6月，它已拥有110个成员国，覆盖世界81%的人口和全球65%的GDP。^[2]作为最大的股东，中国充分展现了国际公信力和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坚定支持该行恪守国际性、规范性和高标准的原则，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运作。截至2025年6月，它为38个成员的300多个项目提供了610亿美元的融资，覆盖交通、能源、水资源、卫生等领域。^[3]

五、结语

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责任与追求。当前，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严峻，南北差距、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冲突交织叠加，使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的这一宏伟目标面临巨大的挑战。对此，世界各国不应该丧失信心，而要继续恪守合作

[1] 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国金融》2009年第7期，第8页。

[2] “AIIB’s First Decade Marks a Path of Multilate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Xinhua, June 24, 2025, <https://english.news.cn/20250624/674e003651c8476eb6a00ca51a6b3b2a/c.html>.

[3] 《践行多边主义 完善全球治理——亚投行第十届理事会年会观察》，新华网，2025年6月26日，<https://www.news.cn/20250626/15dfd114fb0b4996a00d66c575d8881d/c.html>。

共赢、包容普惠的发展理念，努力使这一目标早日实现。

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胸怀。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中国倡导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我们将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世界和平，捍卫公平正义，推进共同繁荣。”^[1] 无数事实表明，中国一直是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国际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将更加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因此，中国的发展不会牺牲别国利益，只会增进共同利益。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坚持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南南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等务实举措，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注入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为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提供了众多机遇，也使其能充分享受中国发展的成果。

【责任编辑：宁国辉】

[1]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第308页。

中非命运共同体：从重要理念到 伟大实践^{*}

□ 吴传华

〔提 要〕从“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到“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再到“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然后到“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要义不断丰富和发展，其思想性和理论性不断提升，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经过十余年发展，中非命运共同体在各层面、各领域、各国家不断落实并取得巨大成就，一直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面临的内外形势日益复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非需要更加团结合作，携手推进“六个现代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设，全面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拓展全新路径、创造有利条件、开辟广阔前景。

〔关 键 词〕中非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国式现代化、四大全球倡议

〔作者简介〕吴传华，中国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亚非学会秘书长

〔中图分类号〕D82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6）3 期 0020-20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工程2026年度重点项目“习近平外交思想在非洲的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2026XYZD02）的阶段性成果。

在中国外交布局中，非洲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长期坚定的战略选择。习近平主席基于对中非关系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在 2013 年 3 月访问坦桑尼亚时首次提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回答了“中非关系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重要课题，为新时代中非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在 2018 年 9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在 2021 年 11 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又明确提出“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在 2024 年 9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不仅是新时代中非关系的新定位，而且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再升级。历经十余载，中非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在中非友好合作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其非凡意义和影响力已经超越双边及区域范畴，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深入研究阐释中非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全面梳理总结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挑战，进而积极探索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深化路径，不仅有助于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关于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精神，而且有利于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行稳致远，为促进全球南方团结振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一、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与基本路径

中非命运共同体揭示了中非关系的根本属性，反映了中非合作的本质特征。自 2013 年提出中非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以来，随着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与合作持续推进，习近平主席围绕构建什么样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以及怎样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一系列重要阐述，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要义不断丰富和发展，其思想性和理论性不断提升，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

对于构建什么样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作出全面系统阐述，首次提出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这六个方面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六位一体，构成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纲领，也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

责任共担至少涵盖中非关系、发展中国家、国际和地区三个层面。无论哪个层面，中非双方都需要密切配合、加强合作，推动中非关系行稳致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习近平主席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表示：“我们要扩大各层级政治对话和政策沟通，加强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密切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作配合，维护中非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1] 责任共担体现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

合作共赢强调通过全面加强中非发展战略对接，实现中非共同发展和繁荣。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抓住中非发展战略对接的机遇，用好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重大机遇，把‘一带一路’建设同落实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相互对接，开拓新的合作空间，发掘新的合作潜力，在传统优势领域深耕厚植，在新经济领域加快培育亮点。”^[2] 中国快速发展为非洲带来重要机遇，中非合作极大促进了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非洲大陆一体化进程。非洲以其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成为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中非发展互为机遇，中非合作优势互补；中非以合作促进发展，以发展带动合作；以合作实现共赢，以共赢提升合作。合作共赢成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鲜明特色。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49 页。

[2] 同上。

幸福共享强调以改善民生为目的，旨在为中非人民谋福利，不断实现中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中非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非合作要给中非人民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和实惠。”^[1]只有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升级，中非人民才能享受到更多成果和实惠，中非关系才能得到更多支持和拥护。幸福共享代表着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民心所向。

文化共兴标志着中非关系从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向文化领域拓展，向文明层面升华。中华文明和非洲文明交相辉映，都是世界文明的瑰宝；在彼此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两大文明交流互鉴，相互包容，相得益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各自文明，而且为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和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主席表示：“我们要促进中非文明交流互鉴、交融共存，为彼此文明复兴、文化进步、文艺繁荣提供持久助力，为中非合作提供更深厚的精神滋养。”^[2]文化共兴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安全共筑体现了中非对和平安全事业的共同追求，也展现出中国为守护非洲和平安全主动担当的大国作为。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愿为促进非洲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非洲国家提升自主维稳维和能力。”^[3]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安全的建设者，主张建设一个永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世界。中国一直是非洲和平安全的贡献者，支持非洲人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增强非洲自主维和维稳能力，推动解决非洲之角、萨赫勒、大湖地区等热点问题。和平安全是发展繁荣之基，安全共筑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安全保障。

和谐共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法则，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和非洲都面临着保护生态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使命和艰巨任务。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449-450页。

[2] 同上，第450页。

[3] 同上。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愿同非洲一道，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共同保护青山绿水和万物生灵。”^[1]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利于推动中非在生态保护、气候治理、绿色产业、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这既符合中非双方的根本利益，也体现了中非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责任担当，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绿色动力。绿色发展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和谐共生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绿色共识。

在系统阐述构建什么样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习近平主席对于怎样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思想和指导性原则，构成建设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路径。

第一，践行“真实亲诚”政策理念。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坦桑尼亚时首次提出“真实亲诚”政策理念。^[2]真诚友好是中非关系的深厚底色，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始终同非洲国家站在一起，永远做非洲的真诚朋友和可靠伙伴。务实合作是中非关系的鲜明特色，从2015年“十大合作计划”到2024年“十大伙伴行动”，中非合作从理念到行动再到成果都是实实在在的，为促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作出重要贡献，同西方国家对非援助与合作口惠而实不至形成鲜明对比。相亲相近是中非关系的天然本色，中非人民有天然的亲近感，人文交流促进中非民心相通，推动中非友好合作。坦诚相待是中非关系的基本成色，对于中非合作特别是经贸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加以妥善解决。“真实亲诚”交朋友，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独具特色的理念和实践，大大拓展了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高度、维度和深度。^[3]“真实亲诚”政策理念不仅适用于中非关系，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了重要遵循，而且成为中国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重要指导原则。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450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06-309页。

[3] 毛晓刚：《“真实亲诚”交朋友彰显中国外交理念》，人民网，2013年3月29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329/c40531-20959048.html>。

第二，坚持正确义利观。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 3 月访问非洲期间提出的。^[1] 习近平主席在 2015 年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时进一步指出：“中非关系最大的‘义’，就是用中国发展助力非洲的发展，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2] 具体来说，正确义利观讲求的是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政治上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经济上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国际事务中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3] 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是新时代中非合作的必然要求。

第三，奉行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4]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责任和担当。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的发展繁荣不仅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重要标志。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谋求与非洲国家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强调：“中非关系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中非关系发展应该更多面向人民。”^[5] 这回答了中非关系发展与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依靠谁”的重要问题，即要依靠 28 亿多中非人民友好团结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还指出：“中国坚持把中非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为中非人民福祉而推进合作，让合作成果惠及中非人民。”^[6] 这回答了中非合作加强与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为了谁”的问题，即为了实现中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中非人民，依靠中非人民，造福中非人民，是中非命运共同

[1] 《义利相兼 以义为先（和音）——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⑤》，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3 年 3 月 30 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23/0330/c64387-32654088.html>。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56-457 页。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5 页。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5 页。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 308 页。

[6]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9 月 4 日，第 2 版。

体构建的核心要义。

第四，秉持“五不”原则。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对非合作中要坚持做到“五不”：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1]“五不”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是新时代中国对非重要外交立场和原则。“五不”原则不仅发出新时代中非友好合作的最强音，赋予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内涵，而且对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深化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为此做强和夯实“五大支柱”：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2]从2000年中非新型伙伴关系，到2006年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15年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多年间中非关系发展实现了影响深远的“三级跳”，也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奠定坚实基础。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实践路径，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是目标方向，二者高度统一于新时代中非关系发展逻辑。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双方在政治、经济、人文、安全、国际事务等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将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合作项目，创造出丰富的合作成果，从而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全方位的实践路径和多维度的有力支撑。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则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提供理念引领和目标方向，推动中非各领域合作不断提质升级，向更高层次迈进。

[1]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456-457页。

二、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取得的巨大成就

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1]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提出最早、基础最牢、涵盖最广的区域命运共同体。^[2]经过十余年持续深化发展，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在各层面、各领域、各国家不断推进落实，理念深入人心，共识广泛达成，实践不断丰富，价值日益彰显。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取得巨大成就，一直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前列。

（一）政治互信持续深化

中非高层交往日益频繁，元首外交发挥重要引领作用，政府间对话与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政党、立法和协商机构交往日益增多。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对非外交工作，2013年3月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就选择非洲，十多年来五次踏上非洲大陆，先后到访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布）、津巴布韦、埃及、塞内加尔、卢旺达、毛里求斯等八个国家。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亲自部署并先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2018年北京峰会、2021年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和2024年北京峰会，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共商合作大计，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在整体层面，2000—2015年中非关系完成了从新型伙伴关系到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三级跳”，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2024年中非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在一个大陆达到“全天候”层级，翻开了中非友好的全新一页。^[3]在双边层面，中国分别同冈比亚（2016

[1]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9日，第1版。

[2] 王毅：《谱写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求是》2024年第18期，第22页。

[3] 同上。

年 3 月)、圣多美和普林西比(2016 年 12 月)、布基纳法索(2018 年 5 月)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至此,中国已经同 53 个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非合作论坛成员达到 55 个(包括非盟委员会)。中国还分别与南非、尼日利亚、刚果(布)等国签署联合声明,加快构建高水平双边命运共同体。在习近平主席宣布的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中,文明互鉴伙伴行动排在首位,旨在不断加强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持续深化中非政治互信。政治互信是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石,有力推动了责任共担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二) 经贸合作迅速发展

经贸合作是中非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在“十大伙伴行动”中,贸易繁荣伙伴行动、产业链合作伙伴行动、互联互通伙伴行动、兴农惠民伙伴行动分别着眼于促进中非贸易、产业链、基础设施与农业合作,推动中非经贸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贸易方面,中国主动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对 53 个非洲建交国实施 100% 税目产品零关税政策,扩大非洲对华商品出口,推动中国大市场成为非洲大机遇。在这一利好政策带动下,2025 年中非贸易额达到 3480 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同比增长高达 17.7%,中国已连续 17 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1] 投资方面,过去 5 年中,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年均保持在 30 亿美元以上,投资项目涉及广泛领域。^[2] 中国成为非洲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投融资合作为当地增加税收、创造就业、出口创汇作出重要贡献,有利于促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设立中非经贸博览会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宣布的重要对非合作举措,2019 年以来已举办四届。2025 年 6 月举办的第四届博览会签约项目 176 个,金额 113.9 亿美元,较上一届均有大幅增长。^[3]

[1] 李若杨:《“2025 年非洲形势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非洲研究院网站,2026 年 1 月 26 日,http://cai.cssn.cn/xw/xsxw/202601/t20260126_5970802.shtml。

[2] 欧阳洁:《中非经贸合作取得新进展》,《人民日报》2025 年 5 月 22 日,第 2 版。

[3] 《113.9 亿美元!第四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成果丰硕》,人民网,2025 年 6 月 15 日,<http://hn.people.com.cn/n2/2025/0615/c336521-41260440.html>。

经贸合作为中非关系发展带来强大动力，有力推动了合作共赢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三）发展合作日趋紧密

中国坚定支持和帮助非洲加快实现发展、全面改善民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加大对非援助。作为“十大伙伴行动”之一，发展合作伙伴行动旨在助力非洲发展，促进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中非人民。2013—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2702亿元人民币，其中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占比44.65%，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1]中国对非援助项目遍布非洲各国，涉及诸多领域，非盟会议中心、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大楼等重要示范项目相继落地，极大促进了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减贫方面，中国通过自身努力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为解决非洲贫困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中国与非洲加大减贫经验交流力度，通过各种方式支持非洲消除贫困，中非减贫合作潜力巨大。医疗卫生方面，1963—2023年，中国累计向76个国家和地区派遣援外医疗队队员3万余人次，援建医疗卫生设施130余所，诊治患者近3亿人次。^[2]其中非洲是最主要的受援地区，援助时间最长，涉及国家最多，成效也最为显著。作为“十大伙伴行动”之一，卫生健康伙伴行动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深化中非医疗卫生合作。中非在其他领域的发展合作也不断扩大深化，助力非洲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展合作是中非友好的具体体现，有力推动了幸福共享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四）人文交流日益扩大

人文交流有利于增进中非人民相互了解和认知，厚植中非友好事业的社会基础。近年来，中非在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媒体、智库、青年、妇女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扩大，极大促进了中非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文化方面，中非签署并落实一系列双边政府间文化协定执行计划，举办“国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第15页。

[2] 《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人民日报》2023年12月30日，第5版。

年”“文化年”“欢乐春节”“中非文化聚焦”等品牌活动。中国分别在毛里求斯、贝宁、埃及、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摩洛哥设有中国文化中心。教育方面，中国大力支持非洲教育发展，通过提供政府奖学金、招收自费留学生等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培养各类人才。2012年起实施“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搭建中非高校交流合作平台。2018年以来，中国在埃及、南非、吉布提、肯尼亚等国设立“鲁班工坊”，为当地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截至2023年底，非洲19国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47国建立77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1]2023年《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明确帮助非洲重点培养四大类人才：现代化治理人才、经济社会发展人才、科教创新人才和民生福祉改善人才。其他方面，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中非智库论坛致力于推动中非媒体、智库交流合作。中非民间论坛、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中非青年大联欢活动等持续举办。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人文交流伙伴行动将2026年确定为“中非人文交流年”。人文交流为中非关系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营养，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有力推动了文化共兴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五）安全合作稳步拓展

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致力于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与非洲各国及非盟委员会加强在和平安全事务上的合作。中国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支持非洲国家加强集体安全机制建设，自主实施维和行动，打击恐怖主义。中国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支持非盟提出的和平、安全、发展三位一体计划。中方任命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积极斡旋非洲热点问题；任命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推动落实“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中国设立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基金，加大支持非洲常备军、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自2019年以来已举办五届，成为深化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安全共筑伙伴行动被列为“十大伙

[1] 王毅：《奋楫扬帆，在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道路上携手前行——写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召开之际》，《人民日报》2024年9月2日，第6版。

伴行动”之一，着力提升非洲自主安全能力。中国支持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努力，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向非洲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派出的维和人员超过 80% 部署在非洲，累计向非洲派出 3 万余人次，在 17 个联合国维和任务区执行任务。^[1] 安全合作不仅有利于维护非洲和平与稳定，而且为中非关系发展提供安全保障，有力推动了安全共筑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六）绿色合作快速推进

在全球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支持非洲实现绿色发展转型，绿色发展伙伴行动被列为“十大伙伴行动”之一。中非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严峻挑战，积极推动落实《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加强在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开发利用、气象监测、防灾减灾以及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防治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截至 2024 年 9 月，中国已与 17 个非洲国家签署 19 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2] 2020 年中非环境合作中心的设立是深化中非生态环境合作的重要举措。“中非绿色使者计划”和“中非绿色创新计划”的实施，从人才、技术等方面支持非洲加快实现绿色发展转型。中国支持“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加强荒漠化防治合作。中非共同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合作。能源方面，非洲各国已形成普遍共识，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既是解决非洲能源短缺问题的关键，也是非洲实现绿色转型的必由之路。中国支持非洲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在非洲建成一系列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南非德阿风电站、肯尼亚加里萨光伏电站、尼日利亚宗格鲁水电站、乌干达卡鲁玛水电站等标志性项目。肯尼亚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希尔认为，中国是非洲开发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3] 中国通过技术、资金、项目支持

[1] 国务院办公厅：《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第 32 页。

[2] 《成果丰硕 前景广阔——相关部门介绍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新成效新方向》，中国政府网，2024 年 9 月 2 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9/content_6971968.htm。

[3] 黄培昭：《非洲加快能源绿色转型步伐》，《人民日报》2025 年 2 月 24 日，第 14 版。

等为非洲国家加快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动力。绿色合作成为中非合作新的增长点，有力推动了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三、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不断取得进展的原因

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非洲方向的生动实践和光辉典范，其背后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习近平外交思想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重要科学指引。任何伟大实践都离不开伟大思想的正确指引。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原创性思想，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核心理念。^[1]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最早提出的区域命运共同体，既要遵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布局和愿景，如“五位一体”总框架和“五个世界”总目标，又有其自身显著特征和重要原则，如“真实亲诚”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非洲在我国外交战略全局中具有重要基础地位，而且是践行和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先行先试地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一直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前列，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光辉典范。习近平主席十分珍视中非友谊，高度重视中非关系，并且基于对非工作实践就新时代中非关系发展提出一系列重要新理念、新思想和新倡议，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非友好合作继往开来、全面深入发展指明方向，为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思想指引和强大理论指导。

其次，元首外交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全面战略引领。元首外交是一国最高层、最权威的国际交往形式，有着其他交往形式无法替代的重要作

[1] 王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5 年 11 月 5 日，第 6 版。

用和意义。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元首外交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对于新时代中非关系发展和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而言，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作用尤为凸显。2013年3月，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中非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开启了中非友好合作的新篇章。十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五次访问非洲，足迹遍及非洲东南西北中各个区域。习近平主席通过各种方式同非洲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人士保持密切交往，亲力亲为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不断取得重大进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助力双方加快实现共同发展，不仅从理论上验证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性和正确性，而且从实践上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方同30个非洲国家建立或提升了战略伙伴关系，完成中国与非洲所有53个建交国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实现了双方关系又一次整体跃升。^[1]

再次，中非友好合作精神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传统友谊是中非关系的宝贵财富，也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情感纽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非友好合作的内容和方式有所不同，但是中非友谊历久弥坚，中非友好合作精神世代相传。2021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当时正值中非团结抗击新冠疫情，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首次高度总结概括了中非友好合作精神：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2]其中，“真诚友好、平等相待”是中非友好合作的原则基础，“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是中非友好合作的鲜明特征，“主

[1] 王毅：《谱写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篇章》，第20页。

[2] 《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中国政府网，2021年11月29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11/29/content_5654846.htm。

持公道、捍卫正义”是中非友好合作的道义担当，“顺应时势、开放包容”是中非友好合作的时代风范。这是首次对中非关系精神内涵进行系统梳理，对中非合作本质特征做出精辟概括。^[1]中非友好合作与美西方对非洲长期奉行的殖民性、掠夺性、霸权性政策形成强烈对比，也体现出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维护好、传承好、发扬好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对于新时代中非关系继往开来、中非全面战略合作扩大深化、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持续推进，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最后，中非合作论坛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有力机制保障。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和非洲国家进行集体对话的重要平台和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重要的机制保障。自2000年成立以来，中非合作论坛已走过25年历程，共举办四次峰会和九届部长级会议，下设农业、减贫、媒体、智库、青年、和平安全等一系列机制化分论坛。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非合作论坛工作，对论坛建设和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出席2015年以来的三次峰会和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并根据最新形势发展在论坛会议上先后提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和“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指明方向。非盟轮值主席国毛里塔尼亚总统加兹瓦尼认为，中非合作论坛为巩固和发展非中伙伴关系搭建有效机制和高水平平台，非中伙伴关系已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2]还有学者通过合作研究认为，中非合作论坛的独特优势在于，不仅提供了一个多边合作框架，还提供了一个能够提升中非双方同西方及其他国家议价能力的平台。^[3]随着中非合作论坛建设持续深化，其在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

[1]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介绍习近平主席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国政府网，2021年12月1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12/01/content_5655147.htm。

[2] 《非洲领导人：做全天候朋友 逐现代化之梦》，《光明日报》2024年9月7日，第5版。

[3] Abdoukadre Ado and Ellis L.C. Osabutey, “Africa–China Cooperation: Potential Shared Interests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s?” *AIB Insights*, Vol. 18, No. 4, 2018, p.22.

体方面的重要作用愈发凸显。

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深化路径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非合作面临的各种挑战相互交织。一些非洲国家深陷安全与发展困境，大国在非洲的博弈加剧，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干扰不利因素叠加。但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非关系不是一天就发展起来的，更不是什么人赐予的，而是我们双方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1]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非应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接续发力，守正创新，携手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拓展全新路径，创造有利条件，开辟广阔前景。

第一，携手推进现代化事业，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筑牢坚实基础。在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中非要携手推进“六个现代化”：要携手推进公正合理的现代化，要携手推进开放共赢的现代化，要携手推进人民至上的现代化，要携手推进多元包容的现代化，要携手推进生态友好的现代化，要携手推进和平安全的现代化。^[2]这六大主张相互呼应、系统集成，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也是中非人民探索现代化规律的理论成果，为回答人类现代化之问提供了重要答案。^[3]中国式现代化和非洲现代化，既要遵循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要自主探索适合本国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现代化道路；既面临共同的历史机遇和现实挑战，又体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重要特征；既存在明显的外在差异性，又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向世界展示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305页。

[2] 《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全文）》，中国政府网，2024年9月5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2495.htm。

[3] 王毅：《谱写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篇章》，第23页。

径选择，对同样正在积极探索现代化道路的非洲国家而言更是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与“六位一体”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目标完全一致，有利于促进非洲各方面发展，尤其是破解最为紧迫的安全发展困境，从而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筑牢坚实基础。

第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打造实践平台。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成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和发展繁荣注入强劲动力，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非洲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和自然延伸，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参与方和重要合作伙伴。“一带一路”倡议对非洲发展来说是“世纪机遇”，非洲国家普遍认为应当抓住这一重要历史性机遇，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现自身发展，因此一直走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最前列。中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着力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盟《2063年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全面对接，积极推动中非及非洲各国之间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促进非洲自主发展和一体化建设，助力中非实现共同发展。中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和中非人民“心联通”，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统筹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和稳步拓展新兴领域合作。中国始终认为，非洲是国际合作的“大舞台”，而非大国博弈的“竞技场”。中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而是着眼于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不仅促进中非合作，而且推动国际对非合作，使非洲真正成为国际合作的“大舞台”，有效化解大国在非洲博弈加剧的风险，从而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打造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实践平台。

第三，加强中非合作论坛建设，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机制保障。经过 25 年发展，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日趋完善，推动中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国际对非合作和南南合作的一面旗帜。与此同时，针对中非合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强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充分发挥重要平台作用，推动中非各领域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注入强劲动力。政治方面，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通过峰会、部长级会议、高官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及各分论坛机制等，扩大中非各层级交往，加强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支持非洲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不断夯实中非友好的政治基础。经贸方面，推动中非经贸合作优化升级，尤其是加强中非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全面落实对非洲建交国 100% 税目产品零关税政策，同时本着“真实亲诚”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妥善解决中非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中非农业合作论坛、中非民营经济合作论坛等经济发展类分论坛，着力加强中非减贫合作，助力非洲解决贫困问题。和平安全方面，充分发挥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中非和平安全合作，解决中非关系中的“安全短板”问题。人文方面，通过中非民间论坛、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中非智库论坛、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等分论坛机制，持续深化中非人文交流合作，全面促进中非相互了解和认知。尤为重视中非媒体、智库交流合作，共同反对西方话语霸权，逐步改变“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非合作论坛在国际上的“金字品牌”效应和旗帜引领作用将会愈加凸显，对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机制保障作用也会愈发重要。

第四，全面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创造良好条件。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四个维度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战略引领。发展是解决非洲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非洲发展难以独善其身，应纳入全球发展议程，通

过参与全球经济体系实现自身发展。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不仅能够为非洲带来发展繁荣，而且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全球安全倡议明确支持非洲国家、非洲联盟、次区域组织为解决地区冲突、反对恐怖主义、维护海上安全所作努力，呼吁国际社会向非洲主导的反恐行动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非洲国家增强自主维护和平的能力。^[1] 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不仅能够为非洲带来和平安全，而且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非洲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但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偏见之下，非洲文明长期遭到漠视，甚至被全盘否定，“大多数研究文明的（西方）学者都不承认存在着一个独特的非洲文明……欧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活动带去了西方文明的因素”。^[2] 非洲文明长期遭受西方殖民主义摧残和丑化，在世界文明中应有的地位得不到尊重和体现，与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也严重受阻。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不仅有利于促进非洲文明发展进步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而且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筑牢文明纽带。治理是维护安全、促进发展和传承文明的重要手段，治理缺失或者治理不善将导致安全不保、发展不善和文明不昌。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增加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等，是非洲国家面临的共性或共同问题。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不仅有助于推动非洲从全球治理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向“积极塑造者”转变，而且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强化治理保障。非洲学者认为，中国发起的全球倡议能够为非洲国家带来巨大的、积极的变化，从而能够改变非洲国家的命运。^[3] 全面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能够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四个方面破

[1]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外交部网站，2023年2月21日，https://www.fmprc.gov.cn/wjbxw_new/202302/t20230221_11028322.shtml。

[2]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

[3] Eric Biegon, “Capitalize on China’s Pledge to Share Modernization Experience, African Countries Urged,” Keny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KBC), August 5, 2024, <https://www.kbc.co.ke/african-countries-urged-to-capitalize-on-chinas-pledge-to-share-modernization-experience/>.

解非洲面临的困境，也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创造良好条件。

五、结语

回顾历史，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非人民患难与共，并肩战斗，改变了遭受殖民统治与压迫的命运，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面向未来，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中非人民为之接续奋斗，在继往开来中不断向前推进。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国式现代化完全不同于建立在殖民掠夺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非洲各国人民也在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谋求联合自强、自主发展，在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命运基础上团结合作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非洲。在此时代背景下，加快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不仅有利于中非携手实现现代化，进而深刻影响全球南方乃至世界现代化进程，而且有利于中非携手创造人类文明崭新形态，进而深刻改变人类历史进程。

【责任编辑：肖莹莹】

特朗普“常识革命”：理念建构、政治实践与范式冲突

□ 刘飞涛

〔提 要〕特朗普在2025年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正式提出“常识革命”，并将其上升为统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官僚体系改革的整体性意识形态纲领。“常识革命”并非临时性竞选口号或浅层政策修辞，而是一场与传统常识政治相错位的，以反精英、反建制、反“觉醒”为动员旗帜，以“美国优先”为价值归宿，以行政集权与结果实用主义为治理手段，以本土蓝领与保守中产为社会基础的民粹保守主义政治运动。它在理念层面制造“民众—精英”“常识—专业”“国家主权—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在制度层面推动总统行政权急剧扩张、联邦文官体系结构性重组与治理逻辑的极端简化；在国际层面推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持续崩解，并引发全球范围内主权民族主义思潮的回潮。“常识革命”的内政外交影响广泛而深刻，但它并未摆脱美国政治左右摇摆的历史惯性，也无法完成其所期待的制度救赎。

〔关键词〕特朗普、常识革命、民粹保守主义、美国优先、美国政治

〔作者简介〕刘飞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77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6) 3 期 0040-23

近年来，随着逆全球化回潮和大国竞争加剧，全球政治图景呈现一系列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结构性变化：多边国际机制权威性持续下降，经济全球

化动能减弱并伴随明显的区域化与集团化转向，身份政治取代共识政治成为西方社会潮流，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在美欧主要发达国家实现突破性发展。作为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构建者、主导者与最大受益者，美国内部政治生态的变迁具有超越美国自身范围的世界性影响。如果说 2016 年唐纳德·特朗普突破传统共和党精英主导的选举格局成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并首次赢得美国大选标志着右翼民粹主义政治的崛起，那么 2024 年特朗普再度赢得总统大选，则标志着美国政治正式进入一个以反建制、反精英、反“觉醒”为鲜明特征的全新历史阶段。与第一任期相对零散、事件驱动、议题波动较强的执政风格不同，在 2024 年共和党竞选纲领“美国优先：回归常识”^[1]的指引下，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执政呈现出理念化、制度化、体系化特征。在 2025 年就职演说中，特朗普以极具煽动性的话语正式提出“常识革命”（Revolution of Common Sense），宣称要终结由建制派长期主导的扭曲政治，清除盘踞在华盛顿的官僚利益集团与“深层政府”网络，破除政治正确对公共议题的话语垄断与道德绑架，回归普通美国人所信奉与依赖的“常识”，包括国家安全优先、经济利益优先、本土就业优先、传统价值优先等理念。“常识革命”在充当竞选工具之后又成为其执政合法性来源、政策制定根本准则与政治动员核心旗帜，深刻重塑美国内政外交议程，并引发美国社会的深度分裂。当前国内外学界多数研究将特朗普主义简化为民粹主义浪潮、个人威权风格、反全球化运动或交易型外交，较少将“常识革命”视为一套具有内在逻辑、话语结构与制度指向的完整政治范式进行系统性学术阐释。大量研究集中于外交政策与选举行为分析，对“常识”这一核心观念的思想史溯源、话语机制分析与制度化实践考察明显不足。本文通过对“常识革命”考察范式的建构，重点分析特朗普引领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广泛性、剧烈性及其对美国内政外交的深刻影响，揭示“常识革命”在美国发展进程中的

[1] “2024 Republican Party Platform,”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July 8, 2024,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2024-republican-party-platform>.

历史方位和未来前景。

一、“常识”的政治思想史谱系与特朗普式转向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常识”大多是理性精神的代名词，在启蒙时代为民主、人权等社会进步共识的达成提供哲学和意识形态工具。美国独立战争正是在“常识”的动员和激励下展开的，在此后美国大部分历史进程中，“常识”通常与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运动相伴，但总体仍在共识政治和社会规范的目标框架内运行。而特朗普“常识革命”由于过度放大反精英、反建制而走向身份对抗和反智主义极端，与美国传统“常识”观念发生严重错位，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常识”范式的特朗普式转向。

（一）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常识”观念

“常识”（Common Sense）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具有悠久、稳定且占据道德高地的传统。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常识便被理解是人类共通的感觉能力与理性基础，是连接个体认知与共同体秩序的关键纽带。亚里士多德将常识视为统合个别感官、形成完整统一认知的“共同感觉能力”^[1]，强调政治共同体的存续依赖共同价值、普遍理性与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成为西方经验主义哲学的源头，其后经历与无神论的对立和与怀疑主义的争论，^[2]至18世纪的英国形成了以托马斯·里德、亚当·斯密、法兰西斯·哈奇森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学派，又称“常识现实主义”^[3]学派。苏格兰启蒙学派将“常识哲学”推向理论高峰。该学派认为，人类知识与道德判断并非完全依赖抽象理性推演，

[1] Sophia Rosenfeld, *Common Sense: A Political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8.

[2] Christopher Holden, “Exploring the Roots of Populism in ‘Common Sense: A Political History,’” *PopMatters*, April 28, 2011, <https://www.popmatters.com/139983-common-sense-a-political-history-by-sophia-rosenfeld-2496045551.html>.

[3] Robert Curry, “Harvard’s Path from Common Sense and Realism ... to Postmodernism,” *WorldNetDaily*, June 7, 2025, <https://www.wnd.com/2025/06/harvards-path-from-common-sense-and-realism-to-postmodernism/>.

而是植根于普遍共享的常识直觉。^[1] 常识具有自明性、普遍性、稳定性与非专业性，是道德、法律、政治与日常生活秩序的共同基础。在这一思想传统中，常识不是某一群体的特殊利益或偏好，而是人类共通的理性能力与道德直觉。

对美国政治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常识文本，当属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潘恩以通俗易懂、极具感染力的语言批判英国专制统治，主张独立、自治与共和政体，将常识塑造成反抗压迫、追求自由与共同体自治的合法性符号。在潘恩那里，常识意味着自然权利、自治理性、公共福祉与政治平等，具有普遍性、革命性与公共性。此后，“常识”一词在美国政治文化中长期占据道德制高点，成为政治家诉诸民众、凝聚共识、批判特权的重要话语资源。总体而言，传统常识政治具备三大核心特征：其一，普遍性，诉诸跨群体、跨身份的共同理性；其二，规范性，以自然权利、正义原则与公共利益为核心；其三，共识性，旨在构建社会团结而非加剧对立与冲突。

（二）美国政治传统中的“常识”话语

美国建国设计在思想源头上与常识现实主义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不言自明的真理”作为常识现实主义原则是推动北美殖民地寻求独立建国的核心理念，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常识现实主义就是美利坚共和国的官方信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通常又被称为“常识之国”。^[2]《常识》对北美殖民地普通民众的巨大动员作用从建国之初便为美国政治文化注入了强烈的民粹主义基因，其核心特征之一便是以“普通人的常识”对抗东部精英、金融资本、专业官僚与技术专家。19世纪30年代，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担任总统期间，政治参与大规模向普通白人男性扩展，对精英特权与官僚体系的批判成为重要政治动员方式，并由此形成了美国历史上的“杰克逊政治传统”，其重要理念是相信“美国人

[1] Thomas Reid, “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Mind,” July 2007, <https://www.earlymoderntexts.com/assets/pdfs/reid1764.pdf>.

[2] Robert Curry, “Restoring America with Common Sense,” RealClearPolicy, February 11, 2025, https://www.realclearpolicy.com/articles/2025/02/11/restoring_america_with_common_sense_1090622.html.

民的政治和道德本能是健全且值得信赖的，而且政府运作过程越简单直接，其结果就会越好”。^[1]19世纪50年代，杰克逊民主与反智主义结合催生美国入党（American Party）^[2]。该党派的理念是相信普通白人新教徒的生活常识、道德直觉比东海岸精英、知识分子、天主教教士的学问更可靠、更代表美国精神。美国入党具有强烈的排外主义及反移民倾向，反映了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早期张力。^[3]19世纪末，人民党（People's Party，又称 Populist Party）运动进一步将民粹主义推向高潮，批判金本位制度、垄断资本、东部银行集团与联邦官僚扩张，主张将共和国归还给“普通民众”，强调政府权力的拓展应以“民众的明智判断与历史经验”为指引。^[4]

20世纪初，随着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相继兴起，推崇理性和专家知识成为主流，民粹主义、本土主义以及反智主义开始长期蛰伏。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代保守主义运动兴起，至80年代，里根保守主义思想开始大行其道，反大政府、反官僚、重传统价值成为主流社会思潮。^[5]保守主义者长期批判联邦政府过度扩张、精英专家治国、进步主义价值主宰与多元文化侵蚀，强调地方自治、个人自由、传统道德与市场效率，形成一种以“普通人常识”对抗进步精英与官僚集团的稳定话语结构，以至于里根总统在告别演说中称他接受“里根革命”的叫法，但更倾向于认为“它更像是一次伟大的重新发现，一次对我们价值观和常识的重新发现”。^[6]

进入21世纪后，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开端，自称继承波士顿倾茶

[1] Walter Russell Mead, "The Jacksonian Traditi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1999, pp.5-29.

[2] 该党又称“一无所知党”，英文名称为“Know Nothing Party”。

[3] "American Party Platform of 1856,"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355656>.

[4] "Populist Party Platform of 1892,"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273285>.

[5] Gil Troy, *The Reagan Revolu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6] Ronald Reagan, "Farewell Address to the Nation," January 11, 1989, <https://www.reagan-library.gov/archives/speech/farewell-address-nation>.

精神的茶党运动兴起，他们打着 1776 年《常识》旗号，反联邦干预、反奥巴马医改、反气候变化政策、反多元文化，把《常识》所代表的启蒙精神，扭曲为反建制、反专家、反进步的右翼保守武器，从思想和文化上为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铺就了道路。纵观历史，美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与保守主义虽有鲜明反精英倾向，但仍基本接受宪政框架、法治原则、代议民主程序与权力制衡理念，其“常识”诉求仍以维护共同体秩序为目标，并未走向激进的制度破坏、身份对抗与反智主义。

（三）特朗普的“常识革命”范式

特朗普所倡导与重构的“常识”，与西方近代以来的传统常识政治发生了显著错位，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旗号的 MAGA 运动的兴起事实上代表了保守民粹主义常识范式的形成。

第一，从普遍理性转向传统保守价值尤其是宗教保守主义优先。传统常识诉诸全人类或全体国民的共同理性，特朗普常识则高度聚焦本土白人蓝领、保守中产与本土主义群体的特殊利益与传统保守价值偏好。特朗普在谈及共和党意识形态色彩时称，共和党算是保守派，但实际上主张“我们需要边境，我们需要公平选举，我们不希望男性参加女子体育比赛，我们不希望未经父母同意就给未成年人做变性手术的政党，这些 99.9% 都是常识”。^[1] 特朗普还通过行政命令方式宣布：“美国的政策是承认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这些性别是不可改变的，是建立在基本和无可争议的现实基础上的。”^[2] 特朗普还在白宫设立“白宫信仰办公室”，并成立“消除反基督教偏见特别工作组”，负责调查处理拜登政府时期对基督徒存在的“系统性歧视现象”，以彰显其

[1] Brooke Singman, “Trump Says GOP is ‘Party of Common Sense’ during Contentious Bloomberg Interview,” Fox News, October 15, 2024,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trump-says-gop-party-common-sense-during-contentious-bloomberg-interview>.

[2] The White House, “Defending Women from Gender Ideology Extremism and Restoring Biological Truth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defending-women-from-gender-ideology-extremism-and-restoring-biological-truth-to-the-federal-government/>.

在性别、反堕胎等议题上与宗教保守主义高度一致的立场。

第二，从个体利益转向公共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优先。传统常识以个体利益、自然权利以及服务于它们的法治与正义为核心，特朗普常识则以公共利益、公共安全与本土安全为最高准则，呈现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特征，以及上述两种面目之下的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优越论。公共政策出发点的转向意味着政策的执行有可能需要打破常规，特朗普在谈及可能动用国民警卫队甚至美国军队打击城市犯罪时称，对城市进行清理整治的目的是避免每个周末都会发生人员死亡的惨剧，“这并非战争，这是常识问题”。^[1]在特朗普的逻辑链条中，城市治安的恶化与非法移民对美国的“入侵”紧密关联。特朗普在宣布南部边境进入紧急状态时称，“南部边境被贩毒集团、犯罪团伙、已知的恐怖分子、人口贩子、走私犯、来自敌对国家未经审查的适龄男性以及危害美国人的非法毒品所侵占”，“这场入侵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广泛的混乱和痛苦”。^[2]

第三，从共识追求转向身份对抗。传统常识致力于弥合社会分歧、构建政治共识，特朗普常识则刻意强化民众与精英、本土与外来、传统与进步、美国与全球的对立，以二元对抗结构实现高强度政治动员。特朗普在谈及其政府与拜登政府的区别时称，拜登身边聚集着一群“激进的左翼狂热分子，他们都是聪明人，但在政策和常识方面却极其愚钝”^[3]。有无常识在此显然是特朗普用来区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身份标签。在被问及依据什么公式计算全球“对等关税”时，特朗普称“计算公式是基于常识，基于赤字，基于我

[1] Danielle Kurtzleben, “Trump Uses ‘Common Sense’ to Make a Political Point. It Has Populist Appeal,” NPR, October 22, 2025, <https://www.npr.org/2025/10/22/nx-s1-5581554/trump-common-sense>.

[2] The White House, “Declaring a National Emergency at the Southern Border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declaring-a-national-emergency-at-the-southern-border-of-the-united-states/>.

[3] Danielle Kurtzleben, “Trump Uses ‘Common Sense’ to Make a Political Point. It Has Populist Appeal.”

们多年来的待遇，基于原始数据”^[1]。在此，特朗普的常识显然就是只要存在贸易赤字就意味着美国受到了不公平贸易待遇，只要对美存在贸易顺差，就站到了美国利益的对立面。

第四，从程序规范转向结果实用主义。传统常识尊重法治、程序正义、专业判断与制衡机制，特朗普常识则以“效率”“结果”“见效快”为标准，对制度程序、专业知识、制衡约束与长期规划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甚至排斥。特朗普在宣布改革《联邦采购条例》时称，联邦采购系统所遵循的理念本是“及时为客户提供最具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同时维护公众的信任并实现公共政策目标”，“但自其颁布以来，《联邦采购条例》已膨胀至2000多页，演变成一个过于繁琐复杂的监管框架，并导致官僚机构臃肿不堪”。^[2]继“解放日”关税被美最高法院宣布违宪，而后其取消“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也受到最高法院的挑战，特朗普为此攻击最高法院称，“他们应当运用自己的常识为国家谋福祉。他们在关税问题上表现得极为糟糕，无端地让美国损失了数百亿美元本可获得的退税，只为讨好那些仇恨者和骗子”。^[3]国土安全部在其扩大非法移民搜查权的声明中称：“犯罪分子将再也无法在美国学校和教堂里藏匿起来逃避抓捕。特朗普政府不会束缚我们英勇执法人员的行动自由，而是相信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常识来处理问题。”^[4]

通过这四重范式转向，“常识”从一种普遍性公共理性符号，转变为民粹动员工具、反建制意识形态与利益分配准则，它们构成了“常识革命”的

[1] Jeff Mordock, “Trump Says Tariffs Based on ‘Common Sense’, ‘Deficits’ and ‘Very Substantial Facts,’” The Washington Times, July 10, 2025, <https://www.wmal.com/2025/07/10/trump-says-tariffs-based-on-common-sense-2/>.

[2] The White House, “Restoring Common Sense to Federal Procurement,” April 15,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4/restoring-common-sense-to-federal-procurement/>.

[3] Donald J. Trump, “Trump’s Truth,” April 6, 2026, <https://www.trumpstruth.org/status-es/37608>.

[4]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Statement from a DHS Spokesperson on Directives Expanding Law Enforcement and Ending the Abuse of Humanitarian Parole,” January 21, 2025, <https://www.dhs.gov/news/2025/01/21/statement-dhs-spokesperson-directives-expanding-law-enforcement-and-ending-abuse>.

观念基础与合法性来源。

二、“常识革命”的内政实践

“常识革命”范式的系统建构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施政提供了政治哲学理据，成为特朗普用以统摄行政革命、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一条意识形态主线。

（一）行政革命：统一行政权

特朗普将联邦官僚体系视为阻碍民意、维护精英利益的“深层政府”核心载体，因此把行政革命作为“常识革命”的重要环节。

首先，复兴并强化“单一行政官”^[1]理论，主张总统对全部行政部门拥有绝对控制权，所有行政官员必须服从总统政治意志，削弱文官制度的独立性、中立性与专业性。特朗普政府发布《确保所有机构实行问责制》行政令，称宪法赋予总统所有行政权力，要求“行政部门的政策应确保总统对整个行政部门的监督和控制”，“所有行政部门和机构，包括所谓的独立机构，应将所有拟议的和最终的重大监管行动提交给总统行政办公室下属的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OIRA）进行审查后，方可在《联邦公报》上发布”。^[2]白宫在随后的政策说明中更加明确强调，因为所有行政权力都归总统所有，因此所有机构都必须：“将拟议的法规提交给白宫审查，对于所谓的独立机构（除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职能外）没有例外情况；行政令还要求所有机构都必须就其优先事项和战略计划与白宫进行沟通，而白宫将设定其绩效标准。”^[3]

[1] Cass R. Sunstein and Adrian Vermeule, “The Unitary Executive: Past, Present, Future,” *The Supreme Court Review*, Vol.2020, No.1, 2020, pp.83-117.

[2] The White House, “Ensuring Accountability for All Agencies,” February 18,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ensuring-accountability-for-all-agencies/>.

[3]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Reins in Independent Agencies to Restore a Government that Answer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February 18,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2/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reins-in-independent-agencies-to-restore-a-government-that-answers-to-the-american-people/>.

美国法学界学者就此评论称，实际上特朗普所表达的意思是“我就是法律，我的意志就是法律”。^[1]

其次，推行联邦公务员 F 岗（Schedule F）改革。早在 2020 年 10 月第一任期后期，特朗普即发布第 13957 号行政令^[2]，准备实行联邦公务员岗位任职改革，但未及实施即被后任拜登政府废除。2025 年第二任期开始后，特朗普再度发布行政令，宣布“恢复联邦政府部门中对政策制定有影响职位的问责机制”^[3]，在联邦公务员“例外服务”体系中，新增 F 类职位分类，专门针对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机密事务、高层管理等岗位，取消这些岗位的终身 / 长期就业保护、竞争性招聘、解雇申诉权、绩效保护，转为总统可自由任免、随时解雇且无需理由、无上诉渠道的政治任命类职位，其目的是为大规模清洗异见官僚、重塑联邦官僚体系、贯彻总统意志提供关键制度工具，为落实“排干沼泽”^[4]政策提供合法依据。为推进 F 岗改革落地，特朗普政府成立由埃隆·马斯克牵头的政府效率部（DOGE），在其核心运作的五个月时间内，重点推进机构裁员、削减预算、去监管等行动。联邦人事管理局（OPM）数据显示，2025 年联邦政府范围内超过 31.7 万名联邦雇员离职，裁员规模最大的三个部门分别是国防部、农业部和财政部，其中国防部裁员超过 61600 人，约占其员工总数的 8%；财政部裁员超过 31600 人，裁减比例接近 28%；农业部裁员超过 21600 人，裁减比例约为 22%。^[5]另外，美国国际

[1] Jacob Knutson, “What is Unitary Executive Theory? How is Trump Using It to Push His Agenda?” February 20, 2025, <https://www.democracydocket.com/analysis/what-is-unitary-executive-theory-how-is-trump-using-it-to-push-his-agenda/>.

[2]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Creating Schedule F in the Excepted Service,” October 21, 2020,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presidential-actions/executive-order-creating-schedule-f-excepted-service/>.

[3] The White House, “Restoring Accountability to Policy-Influencing Positions within the Federal Workforce,”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restoring-accountability-to-policy-influencing-positions-within-the-federal-workforce/>.

[4] Tim Donner, “Schedule F—Trump’s Plan A for Emptying the Swamp,” Liberty Nation News, November 29, 2024, https://www.libertynation.com/schedule-f-trumps-plan-a-for-emptying-the-swamp/?utm_source=partner&utm_campaign=ZeroHedge.

[5] Drew Friedman, “How Staffing Cuts in 2025 Transformed the Federal Workforce,” January 1, 2026, <https://federalnewsnetwork.com/workforce/2026/01/how-staffing-cuts-in-2025-transformed-the-federal-workforce/>.

开发署被正式关闭，教育部仍在按照特朗普的指令走在将被解散的路上。^[1]

最后，高度依赖行政令治国的模式，大量使用总统行政命令与总统备忘录绕过国会立法程序，体现结果导向的实用主义理念。历史数据显示，自1969年以来，美国完成完整任期的10位总统平均签署270项行政命令；完成两届任期的总统平均签署332项，而完成一届任期的总统平均签署207项。^[2]相较而言，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一年左右时间内已签署了252项行政命令（截至2026年3月26日），其行政命令发布密度、频率明显超过历届总统。^[3]上述行政命令涵盖联邦行政改革、移民与边境、能源与环境、贸易与经济、外交与国际、社会文化与教育等领域，可谓全政府行政命令治理。传统上，当国会的一院或两院都被反对党掌控时，总统就会倾向于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应对，但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密集发布行政命令恰恰是在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也说明特朗普有意通过扩大总统权的方式来推进治理。特朗普大肆扩张总统权力的做法引发大量指控联邦政府违宪的行政诉讼。比如，特朗普发布的涉及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受到22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违宪诉讼；有关加征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的行政令遭到12个州的联合诉讼。^[4]

特朗普行政革命的本质，是以总统集权打破建制官僚壁垒，使其个人及政党政治意志直接穿透治理体系，实现“常识”议程的快速推进和有效落地。

（二）经济革命：产业民族主义与“公平贸易”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经济政策既有“减税去监管”的新自由主义工具，亦

[1] The White House, “Improving Education Outcomes by Empowering Parents, States, and Communities,” March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3/improving-education-outcomes-by-empowering-parents-states-and-communities/>.

[2] The USAFacts Team, “How Many Executive Orders Has Each President Signed?” April 1, 2026, <https://usafacts.org/articles/how-many-executive-orders-has-each-president-signed/>.

[3] *Ibid.*

[4] United States Democracy Center, “Executive (Dis)Order: Trump’s Unprecedented Use of Executive Orders and How States Are Fighting Back,” January 15, 2026, <https://statesunited.org/resources/executive-order-report/>.

有“关税保护、政府入股”的国家干预主义。如果说从政府干预程度上看，特朗普对内经济政策并没有跳出伴随两党政权轮替所带来的政策摇摆轨迹，但全面提高关税则是对美国二战结束以来长期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贸易政策的背离，因而特朗普的经济革命可以说是反自由国际主义的“混合经济革命”，其核心逻辑是：以直观经济利益替代抽象自由贸易理论，以本土产业振兴与就业增长替代全球分工效率目标。

第一，推行“公平贸易”原则，对贸易顺差国家加征关税，重新谈判各类多边及双边贸易协定，以减少贸易逆差、保护本土制造业与就业岗位。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宣称美国迎来“解放日”，宣布以美国长期货物贸易逆差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实施所谓“对等关税”：一方面自4月5日起对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基准关税，另一方面自4月9日起对部分贸易伙伴加征更高的国别关税。此举在世界范围内挑起关税大战，相较于以前，特朗普此轮关税政策有以下特点。一是波及范围广。几乎所有美国贸易伙伴，不论是盟友还是非盟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一幸免地受到了特朗普关税的波及。二是力度大。据耶鲁大学的跟踪研究，特朗普加征“对等关税”前美国平均关税率为2.3%（2025年1月），一年后（2026年1月）该数据升至10.6%。^[1]三是名目繁多。已推出的关税政策包括“对等关税”、钢铝关税、芬太尼关税、涉俄石油关税，甚至还准备推出格陵兰岛关税。事实上，加征关税已成为特朗普推行胁迫外交随时可以挥舞的大棒。四是加减关税决策随意性强。韩国、印度等都经历了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剧烈摇摆。五是没有遭遇大规模关税反击。除中国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选择对美妥协。特朗普以高关税为胁迫手段迫使世界各国分别与美国达成关税水平不等的多个双边贸易协定，试图推动世界贸易体系从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多边框架转变成以美国为轴心、以众多双边贸易协定为支撑的“伞状”

[1] The Budget Club, “Tracking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ariffs,” April 1, 2026, <https://budgetlab.yale.edu/research/tracking-economic-effects-tariffs>.

贸易结构,核心目的是以美国市场为筹码重构美国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同时通过高筑关税壁垒推动产业回流,重振美国制造业。

第二,实施大规模减税与放松监管政策,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鼓励企业回流与本土投资,刺激能源、基建与制造业扩张。2025 年 7 月,《大而美法案》签署生效,该法案在减税、去监管、削减福利、传统能源优先等议题上坚持“里根经济学”要义,因而一定意义上仍是“华盛顿共识”的延续。具体政策包括:减税,包括永久延长 2017 年《减税与就业法案》(TCJA)中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条款,将企业税率锁定在 21%,取消小费与加班工资税,汽车贷款利息扣除;削减社会福利,包括削减医疗补助、收紧食品援助、减少联邦学生贷款援助额度等;取消清洁能源补贴,终止电动汽车 7500 美元税收抵免,解除海上钻探限制,扩大石油、天然气开采;取消 800 美元以下包裹免税政策(小额豁免规则)。^[1]

第三,战略性产业和市场干预。特朗普的大规模减税、放松监管政策,符合新自由主义的“最小政府”和“自由市场”主张,但其对外高筑关税壁垒显然又是反市场原则的。在产业政策方面,他强烈反对拜登政府的产业补贴政策,但另一方面又以行政干预方式更加直接地卷入特定企业运营,尤其是以政府强制入股方式干预企业生产。截至 2026 年 1 月,也就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首年内,美国政府投入超过 100 亿美元,获得 11 家公司的股权。^[2] 这些公司涵盖半导体、核能和稀土矿产等领域,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战略性关键产业的高度重视,并展现了一种以更大力度介入战略性行业企业并直接干预生产的强硬姿态。

[1]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Trump’s One Big Beautiful Bill Is Now the Law,” July 4,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2025/07/president-trumps-one-big-beautiful-bill-is-now-the-law/>.

[2] Jeff Rumage, “Trump Is Using Your Taxes to Boost Chipmaking and Rare Earths — But He Also Wants His Cut,” January 28, 2026, <https://builtin.com/articles/companies-trump-administration-is-investing-in>.

特朗普的市场干预行为更多从选举政治角度考量。特朗普政府与谷歌、微软、Meta、甲骨文、xAI、OpenAI 和亚马逊等七家大型科技公司达成协议，上述公司将通过签署“纳税人权益保护承诺书”方式，承诺建设或购买为数据中心提供所需大量电力的设施、电网接入的基础设施并支付与普通消费者不同的电价。^[1] 特朗普称，这些措施将确保美国民众免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并从电网升级和增强电网抗灾能力中获益，^[2] 但从政府、企业、市场三者关系看，此举不仅直接介入了企业的经营生产，而且限制了市场的价格调节作用，实质上与“拜登经济学”^[3] 有异曲同工之意。

特朗普经济革命以贸易赤字、减税、去监管、制造业回流、物价水平等与普通民众直观感受密切关联的“常识”性经济指标作为推进政策杠杆，呈现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与实用主义导向。

（三）社会革命：反觉醒主义与传统价值复位

近年来，觉醒主义（wokeism）已成为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辩论中的核心主题。这一概念起源于非裔美国人社社区，最初是呼吁对宗族歧视和社会不公现象“保持警觉”，后来含义进一步扩展，成为涵盖性别平等、LGBTQ+ 权利、环境正义和经济平等广泛内容的社会导向性概念，并成为奥巴马、拜登等民主党政府系统性推动制定支持边缘化群体、促进包容性政策、工作场所准则和教育课程。明显具有左翼进步主义色彩的“觉醒主义”思潮和运动对美国社会传统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形成强烈冲击并激起后者强烈反弹，这正是 MAGA 运动兴起的社会动因。从这一意义上讲，特朗普的“常识革命”正

[1] The White House, “Ratepayer Protection Pledge,” March 4,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2026/03/ratepayer-protection-pledge/>.

[2] The White House, “Ratepayer Protection Pledge Proclamation,” March 4,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6/03/ratepayer-protection-pledge-proclamation/>.

[3] The White House, “Bidenomics is Working: The President’s Plan Grows the Economy from the Middle Out and Bottom Up—Not the Top Down,” June 28, 2023,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6/28/bidenomics-is-working-the-presidents-plan-grows-the-economy-from-the-middle-out-and-bottom-up-not-the-top-down/>.

是对觉醒主义运动、多元文化主义与身份激进主义的反向矫正。

在教育领域，批判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历史与西方文明的解构，强调爱国主义教育与传统价值回归，推动课程内容向历史常识与国民认同方向调整。特朗普在教育领域的“整肃”行动从打击高校所谓反犹太主义开启，矛头直指进步主义精英。2024年美国高校普遍爆发针对巴以冲突的反战示威活动，共和党指责拜登政府打击反犹太主义不力。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发布“打击反犹太主义补充措施”行政命令，^[1]宣布恢复其第一任期发布的“打击反犹太主义行政令”，宣称“致力于打击美国及全球范围内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事件的上升势头”^[2]，并由美国司法部牵头成立包括教育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机构人员的打击反犹太主义特别工作组，重点清除校园里的反犹太骚乱。^[3]特朗普政府通过威胁取消科研资助、停止国际招生以及税收罚款等手段先后迫使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接受联邦政府条件，其后又系统性推出“高等教育卓越学术契约”，要求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多所重点高校承诺“必要时动用合法武力来阻止违法行为”。^[4]“高等教育卓越学术契约”还明确提出：“在作出任何有关本科生或研究生招生及经济资助的决定时，不得明示或暗示地考虑性别、族裔、种族、国籍、政治观点、性取向、性别认同、宗教归属，或任何可替代上述因素的

[1] The White House, “Additional Measures to Combat Anti-Semitism,” January 29,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additional-measures-to-combat-anti-semitism/>.

[2]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Combating Anti-Semitism,” December 11, 2019,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presidential-actions/executive-order-combating-anti-semitism/>.

[3]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Justice Department Announces Formation of Task Force to Combat Anti-Semitism,” February 3, 2025, <https://www.justice.gov/opa/pr/justice-department-announces-formation-task-force-combat-anti-semitism>.

[4] Mark Barnes et al., “White House Invites Nine Universities to Enter ‘Compact’ in Exchange for Access to Federal Funds and Other Benefits,” October 8, 2025, <https://www.ropesgray.com/en/insights/alerts/2025/10/white-house-invites-nine-universities-to-enter-compact-in-exchange-for-access-to-federal-funds>.

指标；但对于完全或主要由特定性别或特定宗教教派学生组成的机构，可作适当例外。”^[1]

特朗普在教育领域的另一重大行动是推行历史“正统”主义，倡导“爱国主义教育”。通过文宣导向和文化符号的变更，重塑美国社会历史记忆，为复兴以“民族主义”“白人至上”等为核心信条的右翼保守主义提供政治文化土壤。特朗普发布“终结 K-12 学校教育中的激进灌输”行政令，重建 2020 年 11 月设立的“1776 总统顾问委员会”，致力于终结否定美国、反对美国的“激进美国历史观”。^[2]2025 年 3 月，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指责美国流行的历史修正主义把美国历史“重新解读为本质上带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压迫性，或者存在其他无可救药缺陷的历史”，要求史密森学会（含 14 所博物馆）移除“分裂的、以种族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誓言要“让史密森学会重新回到其应有位置，成为激励人心和展现美国伟大精神的象征”。^[3]在重塑美国历史文化符号方面，特朗普提议将阿拉斯加的丹奈利山改回其旧称麦金利山，并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借美国建国 250 周年来临之际，设立“自由 250”工作组，希望通过举办各种庆祝活动以“加强国家团结和对历史的尊重，展现美国之美，并激励美国领导力和创新精神开启下一个篇章”。^[4]

在移民领域，以国家安全、公民身份门槛、文化同化与社会秩序为核心常识原则，收紧非法移民管控、强化边境墙建设、提高入籍标准、缩减难民接收规模。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已推出以建墙、驱逐非法移民和择优吸纳移民

[1] Jessica Corbett, “Trump Pressures Top Universities to Sign ‘Extortion Agreement’ for Federal Funds,” October 2, 2025, <https://www.commondreams.org/news/trump-university>.

[2] The White House, “Ending Radical Indoctrination in K-12 Schooling,” January 29,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ending-radical-indoctrination-in-k-12-schooling/>.

[3] The White House, “Restoring Truth and Sanity to American History,” March 27,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3/restoring-truth-and-sanity-to-american-history/>.

[4] “President Trump Launches Freedom 250 to Lead America’s 250th Birthday Celebration,” December 18, 2025, <https://freedom250.org/news/president-trump-launches-freedom-250>.

等为主要内容的“常识性移民政策”，^[1]但未及全面铺开。2025 年特朗普之所以能够重返白宫，其移民政策主张是重要加分项，这也为其在更大力度、更大规模上推进移民政策改革提供了民意基础。特朗普的具体行动之一是扩张移民执法机构的权力并强化其执法能力。特朗普发布“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入侵之害”行政令，宣布“美国的政策是严格执行移民法，反对所有不被接纳和应被驱逐的外国人，尤其是那些威胁到美国人民安全或稳定的外国人”。^[2]同时，国土安全部宣布废除拜登政府时期设定的移民执法“敏感地区”，授权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可以在学校、教会、医院和公共集会场所进行抓捕，宣称“特朗普政府不会困住执法人员的双手，而是相信他们会凭借常识行事”。^[3]ICE 与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发布备忘录规定，允许拘留在美国居住至少一年但仍未获得绿卡的合法难民，推翻了 ICE 长期以来的一项政策，即不得以入境一年但仍未获得绿卡为由对难民实施拘留。^[4]二是强化边境封控，重点拦截非法越境。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即宣布全国边境进入紧急状态，恢复并扩大了边境墙的建设工作，在埃尔帕索和里奥格兰德河谷等关键地区新增了数十英里的建设工程，部署国民警卫队和现役军人到边境。三是扩大移民拘留规模并开展大规模驱逐行动。2025 年，美国境内羁押

[1]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Common Sense Immigration Policies: Protecting American Security, Sovereignty & Prosperity,” September 16, 2020, <https://www.dhs.gov/publication/common-sense-immigration-policies-protecting-american-security-sovereignty-prosperity>.

[2] The White House, “Protecting the American People Against Invasion,”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protecting-the-american-people-against-invasion/>.

[3]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Statement from a DHS Spokesperson on Directives Expanding Law Enforcement and Ending the Abuse of Humanitarian Parole,” January 21, 2025, <https://www.dhs.gov/news/2025/01/21/statement-dhs-spokesperson-directives-expanding-law-enforcement-and-ending-abuse>.

[4]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Memorandum for: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USCIS) and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ICE),” February 18, 2026, https://assets1.cbsnewsstatic.com/hub/cms/prod_cms_alt/file/2026/02/19/07a4154f-13b7-4167-8022-0e0a6c6eaf3e/uscis_memo_1.pdf?ftag=MSF0951a18.

被捕人员的拘留床位数量从 2024 年下半年的日均约 1.4 万张增至 2026 年 1 月的约 5.7 万张。^[1] 同期,国土安全部宣称,有将近 300 万非法移民离开美国。^[2] 四是全面收紧移民准入政策,包括严格限定并重新解释美国宪法赋予在美国出生者的公民权、^[3] 加强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审查、对申请进入美国的外国人实施最大程度的审查和筛选等举措;^[4] 大幅度扩大旅行禁令适用国家范围,把适用禁令的发展中国家从最初 19 个扩大至 40 个;确立基于财富标准的工作签证和移民接纳门槛。总之,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通过边境封锁、非法移民拘留和大规模移民驱逐以及选择性接纳部分高价值移民,事实上已经完全重塑了美国的传统移民政策。

在性别与家庭议题上,反对激进性别观念与性别意识形态扩张,回归传统家庭伦理与社会普遍直觉,以社会常识对抗进步精英价值主导。特朗普政府是以“反觉醒文化”为旗号推动传统保守主义社会价值回归的,尤其是回归基督教传统家庭价值。在堕胎和生育权利问题上,联邦层面不推全国堕胎禁令,支持红州全面限制、蓝州保留权利的分裂格局,限制联邦资金流向支持堕胎的政策或机构。在性别和性少数群体权利方面,禁止跨性别者参军,取消医保覆盖跨性别医疗费用,推动立法将性别定义为出生时的生理性别,

[1] Graeme Blair and David Hausman, “One Year of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Under the Second Trump Administration,” April 7, 2026, <https://deportationdata.org/analysis/immigration-enforcement-first-year.html>.

[2]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 Sets the Stage for Another Historic, Record-Breaking Year Under President Trump,” January 20, 2026, <https://www.dhs.gov/news/2026/01/20/dhs-sets-stage-another-historic-record-breaking-year-under-president-trump>.

[3] The White House, “Protecting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American Citizenship,”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protecting-the-meaning-and-value-of-american-citizenship/>.

[4] The White House, “Protecting the United States from Foreign Terrorists and Other National Security and Public Safety Threats,”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protecting-the-united-states-from-foreign-terrorists-and-othenational-security-and-public-safety-threats/>.

否定性别多元。^[1] 在宗教自由与传统家庭价值方面，扩大“宗教自由豁免”，允许企业或机构以宗教信仰为由，拒绝服务性少数群体、堕胎相关需求。

特朗普社会革命试图通过政治手段重塑主流文化认同，修复被多元文化与左翼激进主义撕裂的社会共识。

三、“常识革命”的影响

特朗普通过对“常识革命”范式的建构，使得民粹保守主义运动得以在更大社会范围内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展开，给美国带来了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社会冲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场剧烈的政治矫正、秩序颠覆和价值重建。特朗普“常识革命”揭示的是当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核心难题，即如何平衡大众意愿与专业治理、国家利益与全球责任、文化团结与多元包容，但从“常识革命”的初步结果及影响看，它非但没有找到上述问题的破解之道，反而进一步加剧和深化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矛盾。

（一）行政权扩张导致三权分立更加失衡

“常识革命”高度依赖总统行政权力的单边运作，导致美国三权分立结构出现明显失衡。国会立法功能被持续边缘化，大量核心公共政策通过行政令实施，国会立法监督、财政约束与调查能力显著下降。司法与行政频繁出现高强度对抗，总统对司法判决的质疑、拖延甚至不执行倾向增强，司法权威与法治统一性受到冲击。总统权力边界不断外移，形成强行政、弱立法、弱制衡的新格局。这种趋势引发关于美国宪政体制稳定性、民主规范性与权

[1] The White House, “Defending Women from Gender Ideology Extremism and Restoring Biological Truth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defending-women-from-gender-ideology-extremism-and-restoring-biological-truth-to-the-federal-government/>.

力约束有效性的深刻担忧，也埋下未来制度冲突与宪政危机的隐患。^[1]

（二）政党极化导致政治生态更加零和化

树立常识旗号是民粹主义的一种运动策略，旨在制造“我们与他们”的身份对立。^[2]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身份政治势必进一步强化共和党内部民粹化转向，推动共和党从传统古典保守主义向民粹保守主义全面转型。民主党则走向更激进的进步主义立场，对立对抗成为应对特朗普“常识革命”的核心政治议程。两党政策妥协空间急剧萎缩，政治议题高度情感化、身份化、对抗化，中间选民群体持续萎缩，政治温和力量不断被边缘化。美国政党政治进入高度极化的零和博弈状态，跨党派治理妥协机制基本失效，政治对抗、政府停摆、制度僵局成为常态。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大规模移民拘留和强制遣返政策，在加利福尼亚州和明尼苏达州等民主党主政地区引发大规模示威抗议甚至是暴力抵制，美国国土安全部被迫多次调整执法节奏与部署，并因国会停止拨款而部分陷入停摆。^[3]

（三）精英合法性危机导致反智主义泛滥

“常识革命”对专业知识体系与精英权威的系统性解构，引发美国社会深刻的合法性冲突。一方面，大众对建制派精英长期治理失信、利益俘获、脱离民众的不满具有现实社会基础，“常识革命”代表了民众对政治代表性危机的正当性反弹。另一方面，过度否定专业判断、科学权威、学术共识与媒体事实核查，容易导致决策短期化、情绪化与非理性化，形成治理专业性与大众代表性之间的尖锐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将长期困扰美国政治运行，成为美国政治体制应对复杂治理挑战的深层障碍。哈佛大学一位青年学生就

[1] 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 *How Democracies Die*, New York: Crown Publishing, 2018.

[2] Rylie Jones, “Polarization and Anti-Intellectual Senti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 2025, <https://www.colorado.edu/polisci/2025/12/02/polarization-and-anti-intellectual-sentiment-united-states>.

[3] Nicole Sganga, “‘A Breaking Point’: Inside the 68-day DHS Shutdown,” CBS News, April 23, 2026, <https://www.cbsnews.com/news/dhs-shutdown-breaking-point/>.

此撰文称：“反智主义，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都对我们的民主制度构成了潜在但严重的威胁。当我们任由宗教极端主义凌驾于科学之上，任由民粹主义的愤怒掩盖专业知识，任由教育沦为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时，这个国家就会丧失批判性思考、质疑权力以及展望进步的能力。”^[1] 该评论充分体现了美国青年知识精英对于反智主义泛滥的沮丧和担忧。

（四）“常识革命”导致“美国优先”原则极端化

由于零和博弈思维占据主导，美国不惜摒弃西方长期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成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者。特朗普以交易型外交取代价值观同盟，重塑美国同盟外交的底层逻辑，传统同盟体系凝聚力下降，盟友普遍寻求战略自主，地缘竞争与区域冲突风险上升。特朗普政府“退群毁约”的种种行为也显示，常识现实主义者对国际组织、气候协定、跨国人权机制持高度怀疑的态度，拒绝承担超出美国直接利益的国际责任与公共产品供给。这种发展必将持续削弱多边国际机制权威，加剧全球治理碎片化趋势，令全球治理步履维艰。“常识革命”还具有极强的国际示范效应，其反精英、反移民、反全球化、强调民族优先与强力领导人风格为全球右翼民粹势力扩张提供了模板和路径指引，欧洲多国右翼政党、拉美本土主义势力、亚洲保守派政治力量均不同程度受到鼓舞与示范，全球主权民族主义思潮持续回潮。“常识革命”还推动了美国民族主义、宗教和暴力的融合，致使特朗普政府倾向于把赤裸裸的对外侵略，如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描绘成“上帝神圣计划的一部分”，^[2] 加剧了战争对抗的烈度和双方寻求妥协的难度。总之，特朗普“常识革命”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美国国内政治，成为影响 21 世纪世界政治走向、意识形态格局与国际秩序变迁的重要因素。

[1] Shloka Bhattacharyya, “The Rise of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Society,” October 10, 2025, <https://wesleyanargus.com/2025/10/10/the-rise-of-anti-intellectualism-in-american-society/>.

[2] David Wippman and Glenn C. Altschuler, “Trump’s Profane Crusade is Taking America down a Dark Path,” April 19, 2026, <https://thehill.com/opinion/white-house/5836320-trump-war-rhetoric-danger/>.

四、结语

特朗普“常识革命”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时代美国社会危机、阶层危机、文化危机与政治代表性危机集中爆发的政治产物，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在 21 世纪的融合形态。它既是对建制派精英长期失信的强烈反弹，也是对自由国际主义与多元文化秩序的系统性否定。尽管“常识革命”在形式上轰轰烈烈，但其内在张力和结构性矛盾亦十分突出。一是常识简化性与治理复杂性冲突。现代社会经济、公共卫生、科技发展、气候变迁、国家安全等议题高度复杂，无法仅依靠直观常识决策，过度简化易导致短期行为、政策失衡与长期风险累积。二是行政激进主义与宪政秩序冲突。总统权力持续扩张将引发国会、司法与社会反弹，可能诱发制度对抗、法律僵局甚至宪政危机。三是本土利益与全球责任冲突。过度强调“美国优先”将削弱美国国际影响力，破坏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加剧地区动荡，最终反噬美国自身安全与经济利益。四是动员性与制度化冲突。“常识革命”高度依赖个人魅力与情感动员，缺乏稳定的组织基础、制度根基与跨阶层社会共识，难以转化为长效、稳定、可持续的政治秩序。

正是由于其内在结构性矛盾的制约，可以说特朗普“常识革命”不是一场致力于完成制度重建的真正革命，从运行规律上没有摆脱美国政治左右摇摆的传统轨道。因此，短期来看，“常识革命”仍具有强大动员能力与政策执行力，能够快速兑现部分选民利益，维持选民基本盘支持。中期来看，制度制约、司法对抗、社会分裂与国际反弹将不断加剧，执政成本持续上升，政策落地难度加大，接下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将是对“常识革命”成色的一次全面测试。长期来看，若无法实现阶层和解、制度重建与社会共识修复，“常识革命”难以形成稳定、可持续的政治秩序，其历史遗产更可能是持续的政治动荡与制度极化，并将随着美国政治运行逻辑或沉或浮。美国历史上民粹

主义的兴衰周期短则 3-5 年，长则 15-20 年，特朗普的保守民粹主义大概率不会突破上述历史时限。2026 年 2 月美国最高法院明确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大规模全球关税超越权限，属于违宪行为。此举可谓是“常识革命”在经贸领域遭受的重大挫折，考虑到特朗普的移民和行政改革也日益受到阻滞，这似乎也预示着特朗普引领的保守民粹主义潮流将迎来由盛转衰的重要节点。

质言之，“常识革命”既不是美国民主的自我救赎，也不是简单的民主倒退，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全球化、技术变革与阶层撕裂下的必然政治反应，它试图用激进的手段来捍卫保守的理念，用回到过去的方式为美国寻找未来，因而“常识革命”并非真正意义的革命，而是美国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次历史反动。不过需要看到的是，它所提出的问题——精英与民众的鸿沟、专业治理与大众意愿的平衡、国家利益与全球责任的协调——无疑揭示了西方国家的现代发展困境，也将深刻影响 21 世纪世界政治的走向。

【责任编辑：宁团辉】

技术右翼介入美国政治：影响及挑战^{*}

□ 赵明昊 姜星宇

〔提 要〕 技术右翼兴起是近年美国政治变迁的重要现象。技术右翼秉持技术至上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技术民族主义等观念，主张依靠技术手段重塑政府治理模式，巩固美国技术领导地位并为自身谋利。美国政府与科技企业的利益博弈、美国政治极化、两党政策的差异，是技术右翼谋求更多介入政治的关键因素。通过助力政党竞选、担任政府要职、运用新兴技术和传播手段等多种方式，技术右翼日益渗入美国政治深层运作，冲击政党选民联盟，加剧美国政治极化，影响美国政治议程，并塑造美国科技战略与政策。技术右翼对政治的介入面临诸多制约，包括精英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分歧、商业逻辑与安全逻辑的错位、改革倾向与体制惯性的冲突，技术右翼的政治介入成效及其与共和党的联盟前景面临挑战。技术右翼兴起标志着美国政党、政府与科技精英互动模式的深刻变化，其影响和走向值得持续关注。

〔关 键 词〕 技术右翼、美国政治、右翼民粹主义、特朗普政府

〔作者简介〕 赵明昊，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姜星宇，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D771.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 (2026) 3 期 0063-29

^{*} 本研究得到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课题研究项目资助。

近年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共和党与美国内技术右翼（tech right）之间日益密切的互动受到广泛关注。技术右翼指秉持右翼意识形态、介入美国政治且彼此拥有社会网络联系的科技精英群体，其崛起反映了美国科技精英与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引发学界的研究与思考。既有研究从“技术鹰派”“硅谷右转”“硅谷军事化”等视角出发，探讨技术右翼兴起这一美国政治中的新现象及其成因，并分析其对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和科技政策的影响。^[1]但是，有关技术右翼对美国政治生态影响的研究仍很不足。本文力图厘清技术右翼的政治理念，梳理其形塑美国政治的手段与策略，探析其介入美国政治带来的影响与面临的挑战，有助于更好理解美国“技术—政治复合体”现象以及美国内部的深层变局。

一、美国技术右翼的政治理念及其行为动因

鉴于美国政治的“旋转门”机制，技术右翼既包含制定和实施科技政策的官僚，也涵盖投身科技研发、运营创新产业的企业家、风险投资者群体。美国技术右翼代表人物包括曾执掌“政府效率部”（DOGE）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参与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的印度裔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帕兰蒂尔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风险投资企业安德里森·霍罗威茨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简称a16z）创始人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曾任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

[1] 相关研究参见赵明昊：《技术鹰派、国家安全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国际安全研究》2025年第1期，第115-132页；蔡翠红、李煜华：《科技右翼与美国科技安全战略转型》，《国际安全研究》2025年第3期，第3-34页；韩召颖、刘锦：《特朗普2.0时代硅谷右转的动机与限度》，《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第75-86页；史泽华：《技术右翼及其与特朗普2.0政府的互动》，《当代美国评论》2025年第3期，第25-44页；汪伟民：《美国科技右翼崛起与硅谷军事化——基于技术政治学的视角》，《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6年第2期，第18-35页。

政策主管的硅谷风险投资人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以及曾长期活跃于硅谷投资圈、深受蒂尔等硅谷科技精英支持的现任副总统万斯。综合以上代表人物的著述与观点，技术右翼普遍希望基于自身意识形态理念及其掌握的经济和技术势力，影响乃至塑造美国政府的相关内外政策，从而增进商业利益，实现政治抱负。其主要观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具有技术至上主义理念，将技术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技术至上主义（technological supremacism）将技术视作解决人类社会所有挑战的核心手段。技术右翼势力秉持这种理念，致力于推动技术加速发展，认为这将大幅提升人类社会的发展效率。安德里森在其撰写的《技术乐观主义宣言》中称，人口、自然资源和技术可以促进增长，带来更高的活力和福祉；由于全球人口的萎缩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技术成为唯一能够实现永恒增长的引擎。^[1] 在技术右翼势力看来，技术的发展将带来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实现更理想的社会形态；确保技术的快速演进是最重要的，人文关怀和科技伦理底线应让位于技术发展。其认为，伦理要求会阻碍技术创新，是“技术的敌人”；科技伦理的产生源自对技术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刻板印象，技术发展必须走出所谓“自我施加的痛苦迷宫”，摆脱僵化的伦理束缚。^[2]

技术右翼势力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应服务于技术发展的需要，对政府的低效治理多有不满。马斯克等人激烈批评美国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存在大量无益于创新的监管措施。因此，技术右翼主张废除或削弱政府监管，以促进技术创新和人工智能等产业的发展。技术右翼并不将垄断视作阻碍创新的因素，反而认为技术实力和资本力量雄厚的企业应制造垄断，从而在谋求盈利之余聚焦创新。^[3] 他们还主张，美国政府应与企业合作，共同助推科

[1] Marc Andreessen, “The Techno-Optimist Manifesto,” Andreessen Horowitz, October 16, 2023, <https://a16z.com/the-techno-optimist-manifesto/>.

[2] *Ibid.*

[3] Peter Thiel and Blake Masters, *Zero to One: Notes on Startups, or How to Build the Future*,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14, p.39.

技创新。相较于倾向远离政治的传统硅谷科技公司，技术右翼认为，企业应积极介入政治，利用政策扶持、政企利益关联促进科技企业的迅猛发展，实现先进技术研发的跃升。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高美国政府治理效能也是技术右翼的关切。马斯克主张由具有小政府理念和先进技术应用能力的小规模团队负责政府体制改革，而不是指望传统官僚去冲击“深层政府”（deep state）。例如，执政者可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筛查海量政府数据，识别存在欺诈和浪费的项目，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以精简机构、削减开支。2024年11月，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发布《DOGE 改革政府计划》，宣称借助先进技术审查政府机构颁布的联邦法规，在联邦官僚体系中进行大规模裁员，从而为美国纳税人节省成本。^[1]

第二，具有自由意志主义理念，反对左翼进步主义文化。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认为个人自由至高无上，反对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行为，主张依靠市场力量进行资源配置。从维护个人自由这一基础出发，自由意志主义在经济层面反对监管企业，在政治层面批判保障公平的民主制度。技术右翼势力认为，民主制度意味着治理代表权的扩展、权力制衡和监督、收入再分配，这些制度设计损害自由市场体制对创新的激励。

事实上，很多技术右翼人士建立或持股的企业展现出漠视民主制度约束的特征。2021年11月，蒂尔在推广自由意志主义价值观的阿特拉斯学会演讲中称：“美国是一个被庸众占据关键机构的失败国家，这些机构束缚了人的自由，而自由意志主义的使命是找到‘摆脱所有政治形式’的途径。”^[2]蒂尔创立的数据分析公司帕兰蒂尔，也被指责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审查联邦政府掌握的美国公民数据，对个体之间的信息进行社会网络分析，侵犯个人

[1] Elon Musk and Vivek Ramaswamy, “The DOGE Plan to Reform Governmen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0, 2024, <https://www.wsj.com/opinion/musk-and-ramaswamy-the-doge-plan-to-reform-government-supreme-court-guidance-end-executive-power-grab-fa51c020>.

[2] Peter Thiel, “2021 Atlas Society Gala Honoree,” Atlas Society, November 4, 2021, <https://www.atlassociety.org/video/the-2021-atlas-society-gala-peter-thiels-speech>.

隐私。尽管帕兰蒂尔公司宣称秉持中立，但其相关业务的不透明性仍遭到批评。^[1] 技术右翼坚持“破中有立”，认为美国的治理模式需建立在精英主导基础上，体现出“首席执行官治国”的倾向。例如，技术右翼的重要思想旗手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自视为君主主义者，宣扬“暗黑启蒙”（Dark Enlightenment）论，认为应建立一种类似于企业运营的、由首席执行官统治的治理模式。^[2]

此外，技术右翼反对维护“多元、平等、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简称 DEI）原则的左翼进步主义文化，认为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需要依靠“优绩主义”思想，而不应被 DEI 原则这类“觉醒自由主义”（woke liberalism）理念束缚。他们指责 DEI 政策增加美国政府和企业的运营成本，造成“新种族主义”不平等现象。^[3] 马斯克多次公开将进步主义文化称为“觉醒思维病毒”（woke mind virus），认为进步主义文化反对精英主义、言论自由等美国传统价值观。^[4]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除技术右翼主导的企业外，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等硅谷科技巨头的意识形态立场也出现右转，以迎合特朗普打击自由派的倾向。例如，2025 年 2 月，谷歌宣布放弃其长期以来“从代表性不足的群体中招聘更多员工”的多元化目标，^[5]

[1] Lena Ulbricht and Simon Egbert, “In Palantir We Trust? Regulation of Data Analysis Platforms in Public Security,” *Big Data & Society*, Vol.11, No.3, 2024.

[2] David Marchese, “Curtis Yarvin Says Democracy Is Done, Powerful Conservatives Are Listening,”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18/magazine/curtis-yarvin-interview.html>.

[3] Steven Overly, “What the DEI Backlash Means for Tech’s Next Generation,” *Politico*, August 12, 2025, <https://www.politico.com/newsletters/digital-future-daily/2024/08/12/what-the-dei-backlash-means-for-techs-next-generation-00173686>.

[4] Jon Levine, “Elon Musk and Bill Maher Criticize ‘Woke Mind Virus’ on ‘Real Time,’” *California Post*, April 29, 2023, <https://nypost.com/2023/04/29/elon-musk-bill-maher-slam-woke-mind-virus-on-real-time/>.

[5] Miles Kruppa, “Google Kills Diversity Hiring Targe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5, 2025, <https://www.wsj.com/tech/google-kills-diversity-hiring-targets-04433d7c>.

亚马逊则在同月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删除“包容与多样性”等表述。^[1]

第三，具有技术民族主义理念，坚定维护美国在技术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是美国推进大国竞争战略的产物，体现了美国精英对中国等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赶超美国的深刻焦虑感。这一理念主张美国政府通过更有力的政策限制他国技术崛起，增进美国“技术—产业”联动，强化国防创新生态，以不断提升美国技术优势。^[2]为维护自身技术垄断地位、获取更大商业利益，技术右翼主张摒弃以往硅谷企业的“政治中立”倾向，强调科技公司应与美国政府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以帮助国家赢得技术竞争；批评硅谷企业与国家政治“疏离”的心态和做法，认为这不利于关键技术创新和国家发展。对中国等“追赶者”，他们展现鹰派姿态，认为美国需强化“全政府”“全社会”模式，加大技术遏制，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主导地位。例如，帕兰蒂尔公司高管亚历山大·卡普（Alexander Karp）和尼古拉斯·扎米斯卡（Nicholas Zamiska）在《技术共和国》一书中指责硅谷向消费资本主义妥协，将企业目标聚焦于刺激消费和赚取利润，背弃为国家、为国防建设服务的使命。^[3]

在技术右翼看来，传统军工企业已经落伍，甚至阻碍军事技术变革，侵蚀美国国防创新生态。例如，马斯克长期批评国防部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1] Arriana McLymore, “Amazon Cuts Reference to Diversity from Annual Report,” Reuters, February 8, 2025,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amazon-cuts-reference-diversity-annual-report-2025-02-07/>.

[2] 相关研究参见 James L. Schoff, “U.S.-Japan Technology Policy Coordination: Balancing Techno-Nationalism with a Globalized World,” Working Paper fo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ne 29, 2020,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0/06/us-japan-technology-policy-coordination-balancing-technonationalism-with-a-globalized-world>; Laura D’Andrea Tyson, *Who’s Bashing Whom? Trade Conflict 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2, p.154; 孙海泳：《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与美国对华科技战》，《国际展望》2020年第5期，第46-64页。

[3] Alexander C. Karp and Nicholas W. Zamiska, *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New York: Crown Currency, 2025, pp.14-15.

合作的 F-35 项目过时且充斥浪费。^[1] 他们认为人工智能、云计算、无人机等技术已成为现代战争的关键支撑，帕兰蒂尔、SpaceX 等“新贵”企业应获得美国政府更多支持，力图在与传统军工复合体的竞争中攫取更大商业利益。^[2] 在外交政策上，技术右翼展现鹰派特征，主张加强遏压对手国家。^[3]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担任副国务卿、负责经济和技术相关对外政策制定的雅各布·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曾供职于谷歌公司，是蒂尔小圈子成员，在 2023 年创立了旨在促进美国国会议员和硅谷科技精英沟通合作的“山谷论坛”（Hill and Valley Forum），并宣称硅谷在“中美科技冷战”中保持中立的时代已经结束，^[4] 试图围绕人工智能、半导体、关键技术供应链及对华战略竞争等议题凝聚政策共识，推动科技界与共和党决策层之间的互动。^[5] 曾任蒂尔资本公司（Thiel Capital）负责人的迈克尔·克拉齐奥斯（Michael Kratsios）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出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2025 年 7 月，在回应外界对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允许英伟达 H20 芯片恢复对华出口、另一方面又提出加强 AI 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是否自相矛盾的质疑时，他明确主张继续限制美国尖端半导体流入中国。^[6]

[1] “F-35: Why Elon Musk Is No Fan of the Stealth Fighter Jet,” The Economic Times, February 14, 2025,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f-35-why-elon-musk-is-no-fan-of-the-stealth-fighter-jet/articleshow/118253969.cms>.

[2] Joey Roulette and Marisa Taylor, “SpaceX, ULA, Blue Origin Clinch \$13.5 Billion-Dollar Pentagon Launch Contracts,” Reuters, April 4, 2025,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spacex-ula-expected-clinch-multibillion-dollar-contract-key-pentagon-launch-2025-04-04/>.

[3] 赵明昊：《技术鹰派、国家安全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第 115-132 页。

[4] Jacob Helberg, “Jacob Helberg @jacobhelberg,” X, May 10, 2024, <https://x.com/jacobhelberg/status/1788928150233121074>.

[5] Eric Bazail-Eimil, “Trump Picks China Hawk to Be Top State Department Economic Policy Official,” Politico, December 10, 2024, <https://www.politico.com/live-updates/2024/12/10/congress/trump-picks-china-hawk-helberg-to-be-top-state-department-economic-policy-official-00193683>.

[6] “Unpacking the White House AI Action Plan with OSTP Director Michael Kratsio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ly 30,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npacking-white-house-ai-action-plan-ostp-director-michael-kratsios>.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右翼这一群体并非在近年凭空产生，其思想理念基础早已存在，并构成社会关系网络。蒂尔在1987年创办保守派刊物《斯坦福评论》（The Stanford Review），抨击美国校园中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思想。萨克斯以及后来担任数字移动支付企业贝宝公司（PayPal）高管的诺曼·布克（Norman Book）等人都曾在该刊物撰文。蒂尔和萨克斯曾合著《多样性神话》一书，批判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正确”现象。^[1]近年来，大国科技竞争加剧、美国政党政治极化、两党政策偏好差异等因素，加速技术企业的右转趋势及技术右翼政策影响力的上升。

第一，大国科技竞争推动美国政府加强与企业互动。长期以来，硅谷技术企业秉持“加州意识形态”（California Ideology）思想，保持政治中立，推崇技术解放和自由市场，反对权威和政府干预。^[2]然而，随着大国科技竞争趋势愈演愈烈，政府需要掌握关键和新兴技术的企业助力本国赢得科技竞争，技术企业则需要政府放松监管并帮助其扩张业务。美国为维护其技术主导地位，以国家安全为由强化出口管制和供应链重组，要求技术企业配合政府。^[3]在此过程中，美国国家安全部门与高技术企业的联系日益紧密，形成技术—安全复合体。^[4]面对母国出口管制和东道国监管政策等内外挑战，技术企业需影响和塑造美国政府相关决策，寻求政府税收减免、长期合同等政策支持，以减轻政策性冲击，避免商业利益受损。技术企业与美国政府互动的加强，打破以往硅谷企业对所谓“政治中立”的坚持，为其更大程度介入美国政治奠定了基础。

[1] David O. Sacks and Peter A. Thiel, “The Diversity Myth: Multiculturalism and Political Intolerance on Campus,” 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 January 1, 1998, <https://www.independent.org/store/book/the-diversity-myth/>.

[2] Richard Barbrook and Andy Cameron,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Science as Culture*, Vol.6, No.1, 1996, pp.44-72.

[3] 韩召颖、刘锦：《特朗普2.0时代硅谷右转的动机与限度》，第75-86页。

[4] 赵明昊：《技术—安全复合体与美国对华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5期，第59-78页。

第二，政党政治极化促使技术企业主动塑造政治。近年来，美国两党意识形态立场差异愈发扩大，政治报复和政治不妥协现象加剧，秉持自由意志主义理念的科技精英对民主党的极端政策取向愈发不满。在与特朗普政府官员的私人信件中，安德里森批评 DEI 运动维护种族平等的激进诉求引发新的针对白人的歧视，并在“过去十年加速发展”，导致“我这一类人愤怒不已，不会再忍受了”。^[1] 在这种政策压力下，科技精英放弃在两党之间保持平衡的传统策略，试图主动塑造政策走向，以更好维护自身理念和利益。2024 年总统大选的选情变化推动科技精英主动支持共和党。在特朗普和拜登第一次辩论以及特朗普遇刺后，共和党民调数据迅速上升，民主党则陷入更换总统候选人的危机。在利益算计下，技术右翼在大选尚未结束时就公开支持特朗普及共和党，马斯克、萨克斯等科技精英利用自身影响力和媒体声量直接参与竞选活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美国政治。

第三，两党政策偏好和承诺差异促使科技精英右转。出于获得竞选资金和网络宣传平台的考量，特朗普及共和党在竞选期间作出迎合技术右翼的政策承诺。特朗普本人转变对加密货币的消极态度，宣布其胜选后将大力支持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行业的发展。^[2] 共和党放松企业监管、降低企业税率的政策偏好，也迎合很多技术企业的诉求。相反，拜登政府对技术巨头展开反垄断调查，出台多项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监管举措，推动对未实现资本利得征税，缩小了科技企业的盈利空间，与技术右翼秉持的技术至上主义理念相悖。他们对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极为不满，担心民主党继续执政将损害风险投资和初创企业的发展，^[3] 因此选择靠近特朗普和共和党。

[1] Christiaan Hetzner, “Leaked Message Show Marc Andreessen Blasting Elite Colleges over DEI: ‘My People Are Furious and Not Going to Take It Anymore,’” *Fortune*, July 16, 2025, <https://fortune.com/2025/07/16/marc-andreessen-leaked-messages-dei-stanford-university-mit/>.

[2] “2024 Republican Party Platform,”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July 8, 2024,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2024-republican-party-platform>.

[3] Ben Horowitz and Marc Andreessen, “The Little Tech Agenda: Biden vs. Trump,” *Simplecast*, July 17, 2024, <https://the-ben-marc-show.simplecast.com/episodes/the-little-tech-agenda-biden-vs-trump>.

二、技术右翼介入美国政治的手段

技术右翼在美国科技圈内并不占据多数。硅谷联合风险投资中心（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2025 年调查显示，55% 的硅谷民众在 2024 年大选中投票给民主党，仅 23% 的民众投票给共和党。^[1]从政治捐款上看，以互联网行业为例，非营利组织 OpenSecrets 的调查显示，2024 年政治捐款排名前九的企业均倾向民主党，共和党获得的捐款仅为民主党的十分之一。^[2]尽管人数有限，但由一小群科技精英组成的技术右翼借助庞大的金融实力、密切的私人网络关系和高新技术优势，成为美国政治中新兴的重要力量。

第一，技术右翼通过为特朗普选举筹集竞选资金、实施精准选举动员等方式助力共和党竞选。由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在竞选活动中的支出不受限制，美国大选的竞选资金规模逐届攀高，对赢得选举的作用愈发显著。因此，筹集资金用于发布竞选宣传广告、维持竞选团队运作、搜集分析民调数据等，成为两党候选人的关键较量。技术右翼助选资金庞大，并利用私人关系网络为共和党募捐，是其影响共和党领导人的重要手段之一。在 2024 年大选中，马斯克向特朗普及其他共和党候选人捐献约 2.88 亿美元，成为该次大选最大的政治捐款人。^[3]蒂尔则从 2016 年大选开始向特朗普及其他共和党候选人提供政治献金。2016 年大选期间，蒂尔向特朗普捐款 150 万美元；在 2022 年中期选举中，蒂尔为万斯竞选参议员捐款 1500 万美元，是美国有史

[1] “2025 Silicon Valley Poll,” 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 October 6, 2025, <https://jointventure.org/publications/institute-publications/2770-2025-silicon-valley-poll>.

[2] “Interest Groups: Internet Summary,” OpenSecrets, <https://www.opensecrets.org/industries/indus?ind=B13>.

[3] Trisha Thadani, Clara Ence Morse, and Maeve Reston, “Elon Musk Donated \$288 Million in 2024 Election, Final Tally Shows,”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1, 202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5/01/31/elon-musk-trump-donor-2024-election/>.

以来向单个参议员捐款的最大金额。^[1] 政治献金还从联邦选举延伸至地方层面。2025年4月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席位选举期间，马斯克向候选人布拉德·施梅尔（Brad Schimel）捐献超过2000万美元，以助力保守派法官控制该机构，创造地方选举政治献金新的记录。^[2]

此外，技术右翼作为共和党向其他企业家募集政治献金的重要渠道，为共和党政治人士与科技精英、商业大鳄之间的沟通提供平台。2024年6月，萨克斯与知名风险投资人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Chamath Palihapitiya）在硅谷举办筹款活动，为特朗普竞选筹集1200万美元资金。^[3] 这一筹款活动吸引了加密货币交易机构双子座公司（Gemini Space Station）创始人泰勒·文克莱沃斯（Tyler Winklevoss）和卡梅隆·文克莱沃斯（Cameron Winklevoss）、时任参议员万斯、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古姆（Doug Burgum）等具有科技行业背景的政商界人士参加。^[4] 万斯和伯古姆在特朗普重新执政后分别出任副总统和内政部长。不难看出，技术右翼致力于营造特定社交空间，推动政治人士和科技精英相互接触。

技术右翼还通过多种手段动员共和党潜在选民。^[5] 阿米什人（Amish）是主要聚居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新教群体，其政治参与度长期较低，希望与现代

[1] “Billionaires and the Trump Admin: Peter Thiel,” Revolving Door Project, April 8, 2025, <https://therevolvingdoorproject.org/billionaires-and-the-trump-admin-peter-thiel/>.

[2] Savannah Kuchar, “Musk Spent \$20 Million on Wisconsin Supreme Court Race He Says He ‘Expected to Lose,’” USA Today, April 2, 2025,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25/04/02/musk-wisconsin-supreme-court-race-lose/82773557007/>.

[3] William Gavin, “Donald Trump Raked in Millions at a Silicon Valley Fundraiser Hosted by David Sacks,” Quartz, August 7, 2024, <https://qz.com/david-sacks-donald-trump-fundraiser-silicon-valley-tech-1851525573>.

[4] Alexandra Ulmer, “Trump Rakes in \$12 Million at Tech Fundraiser in Liberal San Francisco,” Reuters, June 7,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trump-liberal-san-francisco-high-dollar-tech-fundraiser-2024-06-06/>.

[5] Lora Kolodny, “Elon Musk’s Pro-Trump PAC Failed to Pay Swing State Petition Signers, New Suit Alleges,” CNBC News, May 14, 2025, <https://www.cnbc.com/2025/05/14/elon-musk-america-pac-didnt-pay-voters-who-signed-petition-lawsuit-.html>.

生活保持距离。马斯克主导的机构针对阿米什人建立地址数据库，向该群体发送竞选传单、广告牌和选民登记表。马斯克还资助阿米什人从交通不便的乡村地区前往投票站投票。^[1] 阿米什人在 2024 年大选中的投票率显著上升，体现马斯克帮助共和党进行选举动员的成效。^[2] 在 2026 年中期选举逐步展开的背景下，技术右翼也试图影响选情。安德里森与帕兰蒂尔公司联合创始人乔·朗斯代尔（Joe Lonsdale）等共同建立名为“引领未来”（Leading the Future）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筹资超 1 亿美元，资助反对建立州级人工智能监管框架的议员候选人。^[3]

第二，技术右翼人士通过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直接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相较以往的科技精英，技术右翼对参与政治并不抵触，反而认为介入政治有利于塑造服务其利益的政策，促进美国科技和政治生态变革。万斯的经历集中体现了技术右翼从政治边缘步入白宫核心决策层的历程。万斯踏入科技投资领域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蒂尔旗下风险投资机构米特里尔资本公司（Mithril Capital）的负责人，后与科林·格林斯庞（Colin Greenspon）共同创立纳里亚资本公司（Narya Capital）。^[4] 2022 年，万斯在蒂尔、萨克斯等人大力支持下当选联邦参议员。2024 年大选期间，特朗普接受蒂尔的推荐，提名万斯为副总统候选人。万斯担任副总统后展现了对技术加速主义的推崇。2025 年 2 月，万斯在巴黎举行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发

[1] Tom Newton Dunn, “How Elon Musk Secured the Amish Vote for Trump,” The Times, November 18, 2024, <https://www.thetimes.com/world/us-world/article/amish-vote-elon-musk-trump-us-election-8lqx8t72v>.

[2] Daniele Curci, “Amish Voters for Trump? The Amish and the Religion Factor in Republican Electoral Politics,” The Conversation, November 5, 2024,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mish-voters-for-trump-the-amish-and-the-religion-factor-in-republican-electoral-politics-247869>.

[3] Nancy Scola, “The Campaign to Take Down Alex Bores Is Just the Beginning,” Politico, March 6, 2026,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6/03/06/alex-bores-ai-leading-the-future-anthropic-00797055>.

[4] Elizabeth Dwoskin et al., “Inside the Powerful Peter Thiel Network that Anointed JD Vance,”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8, 202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4/07/28/jd-vance-peter-thiel-donors-big-tech-trump-vp/>.

表演讲，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敦促欧洲国家避免对人工智能进行过度监管。^[1] 在萨克斯等技术右翼人士的推动下，特朗普上任后迅速废除拜登政府对人工智能实施严格监管的行政命令，^[2] 宣布启动 5000 亿美元投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星际之门”计划（Project Stargate），全面放宽技术管制措施。^[3]

马斯克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中引人注目的技术右翼人士，他在特朗普支持下以“特殊政府雇员”身份主导“政府效率部”。该机构推动联邦部门数据整合，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评测相关部门绩效、追踪联邦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揭示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存在的“欺诈”“浪费”等问题。“政府效率部”推动裁减大量联邦政府雇员，在联邦部门加快部署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项目以执行结构化、重复性的业务流程，减少冗员并提升行政效率。马斯克的很多行动带有显著政治性，“政府效率部”推动终止很多与 DEI、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成为特朗普改造联邦官僚体系、打击民主党和左翼意识形态的工具。2025 年 4 月，萨克斯与特朗普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成立会员制俱乐部“高管部门”（Executive Branch），邀请科技企业家与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和顾问接触，强化科技精英对政治的干涉。^[4] 同年 6 月，赫尔伯格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称，技术供应链的脆弱性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严重风险，维持美国技术主导地位、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将是其作为副国务卿的

[1] J.D. Vance, “Remarks by the Vice President a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ion Summit in Paris, France,”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February 11, 2025,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the-vice-president-the-artificial-intelligence-action-summit-paris-france>.

[2] “Removing Barriers to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removing-barriers-to-american-leadership-in-artificial-intelligence/>.

[3] “More Investment, More Jobs, and More Money in Americans’ Pockets,” The White House, March 24,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2025/03/more-investment-more-jobs-and-more-money-in-americans-pockets/>.

[4] Mike Allen, “MAGA’s Coming Clubhouse: Executive Branch,” Axios, April 28, 2025, <https://www.axios.com/2025/04/28/magas-coming-clubhouse-executive-branch>.

最高优先事项。^[1] 在2026年2月印度人工智能影响力峰会的演讲中，克拉齐奥斯强调美国应培养更多本土科技人才，通过向全球派遣美国“科技繁荣军团”（Tech Prosperity Corps），引导更多国家采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以赢得对华竞争。^[2]

第三，技术右翼运用人工智能、播客等深度影响美国政治，展现科技精英区别于其他政治力量的独特性。技术右翼倾向通过新兴技术开展政治活动，利用人工智能为共和党进行政治宣传，帮助特朗普政府达成相关政策目标。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帮助政党分析海量数据，捕捉选民的突出关切和政策偏好，构建定制化的选举宣传叙事以赢得选民支持。^[3] 技术在竞选过程中对选民观念的塑造作用日益增强，技术手段深入影响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突破传统科技企业秉持技术价值中立的路径。^[4] 马斯克拥有的、原名推特（Twitter）的社交媒体平台X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制造虚假信息，引导用户支持共和党的政策主张或对民主党展开污名化攻击。例如，在2024年10月美国东南部多州遭受飓风袭击后，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受灾图片在X上得到数百万浏览量，共和党人以此批评拜登政府应对灾害不力。^[5] 马斯克本人亦频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虚假信息传播，其在2024年8月将民主党总统候

[1] “Statement of Jacob S. Helberg: Nominee for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conomic Growth,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June 10, 2025,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2b6dc080-c286-1b13-84e5-3c2b80b7457a/061025_Helberg_Testimony.pdf.

[2] “U.S. Promotes AI Adoption, Sovereignty, and Exports at India AI Impact Summit,”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0,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6/02/u-s-promotes-ai-adoption-sovereignty-and-exports-at-india-ai-impact-summit/>.

[3] Sarah Hubbard, “The Role of AI in the 2024 Elections,” ASH Center of Harvard Kennedy School, December 5, 2024, <https://ash.harvard.edu/resources/the-role-of-ai-in-the-2024-elections/>.

[4] Boaz Miller, “Is Technology Value-Neutral?”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Vol.46, No.1, 2021, pp.53-80.

[5] Huo Jingnan, “AI-Generated Images Have Become a New Form of Propaganda This Election Season,” National Public Radio, October 18, 2024, <https://www.npr.org/2024/10/18/nx-s1-5153741/ai-images-hurricanes-disasters-propaganda>.

选人哈里斯身穿带有苏联标志服装的图片上传到 X，用这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暗示哈里斯为社会主义者。^[1] 在特朗普再次执政后，技术右翼进一步借助人工智能等手段改造政府。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除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削减政府部门开支、裁减员工乃至废除政府部门外，还以自动化执行系统代替人力办公，减少冗杂办公流程。例如，为精简美国总务管理局（GSA）的员工规模并提高工作效率，“政府效率部”团队开发部署名为 GSAi 的聊天机器人（chatbot），通过该软件分析合同和采购数据，执行以往由人力完成的任务。^[2] 技术右翼还通过所掌握的技术手段推进特朗普政府政策议程。2025 年 4 月，帕兰蒂尔公司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签署合同，构建实时追踪移民流动的平台。^[3]

在技术右翼和共和党看来，美国媒体和学术界长期持有偏左翼立场，使其难以通过主流媒体开展政治宣传。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曾以“防止煽动风险”为由封禁特朗普的私人和官方账号。在此背景下，二者携手创建和扩展自己的发声渠道，以放大保守主义政策话语的影响力。特朗普在 2022 年 2 月创办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Truth Social）。万斯和蒂尔在 2021 年 5 月投资保守派视频网站 Rumble。^[4] 技术右翼还通过收购大型社交媒体平台，调整算法推荐以拓展保守主义理念的宣传渠道。2022 年 4 月，马斯克收购推特，裁减包括内容审核团队在内的约 75% 员工，取消禁止仇恨言论和虚假信

[1] Sarah Fortinsky, “Musk Posts Fake Image of Harris in Communist Garb,” The Hill, September 3, 2024, <https://thehill.com/policy/technology/4859664-clon-musk-fake-image-kamala-harris/>.

[2] Makena Kelly and Zoe Schiffer, “DOGE Has Deployed Its GSAi Custom Chatbot for 1,500 Federal Workers,” Wired, March 7, 2025, <https://www.wired.com/story/gsai-chatbot-1500-federal-workers/>.

[3] Sheera Frenkel and Aaron Krolik, “Trump Taps Palantir to Compile Data on American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0,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5/30/technology/trump-palantir-data-americans.html>.

[4] Keach Hagey, “Peter Thiel, J.D. Vance Invest in Rumble Video Platform Popular on Political Righ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9, 2021, <https://www.wsj.com/tech/peter-thiel-j-d-vance-invest-in-rumble-video-platform-popular-on-political-right-11621447661>.

息等规定，并解禁特朗普的账号。^[1] 技术右翼非常善于借助播客采访方式宣传其政策理念，利用这种新兴传播手段争取年轻选民支持。例如，赫尔伯格在担任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期间，多次与播客主播对谈，炒作中国科技公司的“安全威胁”，为国会推动禁用 TikTok 法案造势。^[2] 萨克斯长期主持播客节目，并在担任总统高级顾问后继续借此宣传特朗普政府政策。^[3] 由乔·罗根（Joe Rogan）主持的播客节目在美国拥有广泛影响力，约 81% 听众为男性，56% 听众在 35 岁以下。^[4] 马斯克多次在该节目宣传自己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阐述削减政府开支、消除监管等工作的重要性。^[5] 这类基于播客的政策传播对共和党巩固基本盘、赢得年轻选民具有关键作用。

三、技术右翼介入美国政治的影响

通过助力政党竞选、担任政府职位、利用新兴技术宣传政策理念等多种路径，技术右翼势力深度介入美国政治，助推特朗普和共和党赢得 2024 年大选，在政党选民联盟、政党政治格局、政治议程设置等层面对美国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直接推动了美国科技战略和政策的调整。

第一，技术右翼冲击美国政党选民联盟，技术力量成为嵌入联盟内部的

[1] Kate Conger, “How Elon Musk Changed the Meaning of Twitter for User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7,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10/27/technology/elon-musk-twitter-year.html>.

[2] “Interview with Jacob Helberg on US National Concerns over TikTok and Chinese Technology Companies,” YouTube, April 3, 202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8MoQ15ASlg>.

[3] Chamath Palihapitiya et al., “All-In with Chamath, Jason, Sacks & Friedberg,” Apple Podcasts, <https://podcasts.apple.com/cn/podcast/all-in-with-chamath-jason-sacks-friedberg/id1502871393>.

[4] Christien Pheby, “Who’s Listening to the Joe Rogan Experience? Men, Mostly,” YouGov, October 4, 2023, <https://yougov.com/en-gb/articles/47483-whos-listening-to-the-joe-rogan-experience-men-mostly>.

[5] Joe Rogan and Elon Musk, “Joe Rogan Experience #2281 - Elon Musk,” YouTube, March 1, 2025, <https://www.youtube.com/live/sSOxPJD-VNo>.

重要支点。在传统美国政党政治中，两党在保有自身选民基本盘的同时，都尽可能寻求扩大支持群体，构建更大的选举联盟。政党选民联盟的转变成为左右美国选举走向和政党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技术右翼对政党政治的深刻介入，使技术力量在重塑和扩大政党选民联盟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传统上，硅谷科技精英更偏向支持民主党，认同民主党在环保、DEI 等方面的进步主义思想，并获民主党政策扶持。而技术右翼在 2024 年大选中发挥关键作用，在特朗普政府中的角色日益高调，成为共和党选民联盟中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OpenSecrets 等调查机构数据显示，科技巨头在 2024 年大选期间向特朗普捐赠 2.73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马斯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仅获得 1.21 亿美元捐款，双方差距明显。^[1]

技术右翼对共和党的竞选影响，体现在其推动构建拥有多元支持群体的“特朗普联盟”，^[2]促使部分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倒向共和党，冲击民主党原有选民联盟。技术右翼掌控庞大资本和重要技术手段，政党需要依靠技术右翼支持应对选举竞争，政党与科技精英之间形成新的权力互动模式。^[3]凭借对社交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掌控，技术右翼在竞选过程中为政党放大声量，巩固共和党选民基本盘并拓展潜在支持群体。X 在马斯克接手后日益成为右翼群体表达观点的重要平台，通过投放支持特朗普和共和党的宣传广告，更加精准地影响共和党选民群体。此外，技术右翼的助选使共和党在 2024 年大选中获得少数族裔选民支持，帮助特朗普最终赢得七个摇摆州的选举人票。传统上拉丁裔选民倾向支持民主党，但皮尤研究中心（Pew

[1] “Who Are the Biggest Donors?” OpenSecrets, <https://www.opensecrets.org/elections-overview/biggest-donors>; Raphael Hernandez, Lauren Aratani, and Will Craft, “Revealed: The Tech Bosses Who Poured \$394.1M into US Election - and How They Compared to Elon Musk,” The Guardian, December 7,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4/dec/07/campaign-spending-crypto-tech-influence>.

[2] 王浩：《“特朗普联盟”的挑战与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25 年第 8 期，第 27-45 页。

[3] 周冉：《美国科技公司崛起的数字地缘变局：一种权力嵌合的分析》，《国际安全研究》2025 年第 4 期，第 126-156 页。

Research Center) 民调数据显示, 特朗普在 2024 年大选中获得 48% 的拉丁裔选票, 较 2020 年 (36%) 显著提升; 哈里斯仅获 51% 的拉丁裔选票, 较 2020 年拜登的得票率 (61%) 明显下降。^[1]

第二, 技术右翼助推政治极化, 导致两党选民政治立场愈发对立。技术右翼在支持共和党过程中加剧政治极化, 增大两党选民对立程度。技术右翼的媒体传播手段制造信息茧房和政策“回音壁”, 推动意识形态立场相近的选民聚集, 固化两党选民群体间对立。例如, X 放宽虚假信息监管、传播右翼保守言论等做法对保守派选民影响明显。马斯克掌握该公司所有权 12 小时后, 平台上含有冒犯黑人词汇的帖文激增近 500%,^[2] 其用户主体和舆论导向出现“右转”。平台用户对事实核查账户的兴趣大为降低, 与事实核查员和客观媒体账户的互动量分别减少 52% 和 27%, 可信度较低媒体账户的受关注度则上涨 22%。用户对《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中左翼媒体的关注度下降 16%, 对《国会山报》(The Hill) 等较为中立媒体的关注度下降 27%。^[3] 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数据显示, 51% 的共和党用户认为在 X 上体验良好, 仅有 20% 的民主党用户持有相同看法; 31% 的用户认为该平台更倾向支持保守派观点, 仅有 5% 的用户认为平台更支持自由派观点。^[4]

[1] Hannah Hartig et al., “Behind Trump’s 2024 Victory, a More Racially and Ethnically Diverse Voter Coalition,”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26, 2025,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5/06/26/behind-trumps-2024-victory-a-more-racially-and-ethnically-diverse-voter-coalition/>.

[2] Rashawn Ray and Joy Anyanwu, “Why Is Elon Musk’s Twitter Takeover Increasing Hate Speech?”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ovember 23, 2022,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why-is-elon-musks-twitter-takeover-increasing-hate-speech/>.

[3] Gita Johar, “Elon Musk and Twitter: How He’s Turned X into a Free-for-All—and Here’s the Proof,”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February 13, 2024, <https://business.columbia.edu/insights/digital-future/elon-musk-and-twitter-how-hes-turned-x-free-all-and-heres-proof>.

[4] Michelle Faverio and Monica Anderson,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on X Differ over the Site’s Politics and Their Experiences,”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5, 2025,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5/06/05/republicans-and-democrats-on-x-differ-over-the-sites-politics-and-their-experiences/>.

技术右翼助推政治极化和选民对立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引发民主党强烈反击和社会公众批评。技术右翼在资本、游说等手段外，运用社交媒体技术塑造民众政治观念和政治议程走向，形成新的政治介入手段。技术右翼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不仅未能发挥民主制衡与调和作用，反而加剧政治极化和权力膨胀，侵蚀美国政治制度。技术右翼对政治的干预成为两党斗争新议题，技术右翼也成为民主党攻击共和党的重要靶标。民主党抨击技术右翼与共和党的联盟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甚至指责技术右翼帮助特朗普和共和党建立“专制政权”，呼吁美国民众反对技术右翼的政治介入。^[1]

第三，技术右翼改变政治议程设置，其理念偏好和利益关切日益嵌入美国国家治理体系。技术右翼在介入政治的过程中塑造政治议程，将自身关心的议题置于政党内和政党间辩论中。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使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瓦斯普”共识遭到冲击，文化一身份议题逐步成为美国政治发展和政党重组的核心解释变量。^[2] 技术右翼在美国“文化战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兴起。在蒂尔、万斯、马斯克等人的影响和支持下，特朗普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打击左翼推崇的“觉醒自由主义”。此外，技术右翼与共和党合力推广带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宣扬的白人至上主义思想有诸多契合之处。2025年2月，特朗普政府签署行政令，以南非政府对该国白人民众构成“种族歧视”为由削减对南非援助。^[3] 这一政策与马斯克指责南非政府对白人农

[1] Zephyr Teachout, “When Will Democrats Finally Realize that Big Tech Is Not an Ally?” *The Guardian*, November 27,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4/nov/27/democrats-tech-google-apple-musk-trump>.

[2] “瓦斯普”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简称（WASP），代表白人精英主义文化和美国白人新教徒在政治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参见王浩：《从周期到认同：美国政党政治研究的范式创新与议程重置》，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36页。

[3] “Addressing Egregious Ac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7,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addressing-egregious-actions-of-the-republic-of-south-africa/>.

民实施“种族灭绝”相呼应。^[1]作为白人，马斯克、蒂尔、萨克斯三位技术右翼的代表性人物都有在南非生活的经历，他们认为白人力量被削弱是南非经济竞争力下滑的重要原因。南非白人民权组织“非洲论坛”也大力寻求美国右翼支持。“南非叙事”成为美国政治的某种隐喻，技术右翼希望美国避免重蹈南非覆辙。

技术右翼在文化身份议题、意识形态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构建微妙联系，将对民主党和左翼的批评投射到政府治理缺陷议题上。与萨克斯共同主持播客节目的风险投资人戴维·弗里德伯格（David Friedberg）称，提高能源产量是降低美国民众生活成本、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拜登政府的监管制度限制了美国的能源生产。^[2]技术右翼人士普遍反对民主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安德里森认为，左派的气候政策是“去增长”（degrowth）和“反增长”（anti-growth）的，美国具有能源独立的能力，技术可以在应对能源挑战中发挥关键作用。^[3]在人工智能发展需要巨量能源的背景下，技术右翼支持放宽对传统能源的开采。特朗普与共和党将能源价格视为美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并以之作为攻击民主党的议题。^[4]由此，技术右翼与共和党建构了左翼意识形态破坏美国增长、损害民众福祉、削弱美国竞争力的叙事。此外，技术右翼将美国的技术主导地位与国家安全挂钩，构建政府和企业深度合作以应对大国技术竞争的叙事逻辑，宣扬放松对科技企业监管等理念。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很多政策举措都体现了这种诉求。

[1] Mithil Aggarwal, “How a Land Law Sparked Elon Musk’s Accusations of ‘Genocide’ Against His Home Country,” NBC News, February 10, 2025,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south-africa-racist-white-farmers-trump-musk-genocide-ramaphosa-rcna190749>.

[2] Derek Robertson, “How the Tech Right Wants to Run America,” Politico, December 10, 2024, <https://www.politico.com/newsletters/digital-future-daily/2024/12/10/how-the-tech-right-wants-to-run-america-00193596>.

[3] Marc Andreessen, “Marc Andreessen: It’s Morning Again in America,” Hoover Institution, January 14, 2025, <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marc-andreessen-its-morning-again-america>.

[4] 宋国友、肖方昕：《经济依然优先：摇摆州经济与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美国研究》2025年第1期，第38-63页。

第四，技术右翼深度参与美国科技政策制定与执行，使其“安全化”取向更为显著。塑造有利于科技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是技术右翼介入美国政治的重要目标。与拜登政府的科技政策理念不同，技术右翼主张大幅放松政府监管，为科技企业减税。技术右翼推动特朗普第二任期大规模废除拜登政府制定的技术监管措施，将“去监管化”作为美国科技政策的导向。2025年7月，克拉齐奥斯和萨克斯共同主导制定《赢得人工智能竞赛：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这是特朗普政府提升美国科技和产业优势的核心战略文件，放松监管以加速人工智能创新是该计划三大核心支柱之一。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向企业和公众征集阻碍人工智能创新和应用的联邦法规信息，配合相关联邦部门放松监管措施。^[1]技术右翼还推动美国政府利用在区块链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加快布局加密货币和数字资产，确保美国金融科技霸权。2025年2月，萨克斯与美国国会两院涉及加密货币政策的委员会共同成立工作组，聚焦稳定币（Stablecoin）等数字资产的相关立法问题。^[2]3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财政部负责推进建立“比特币战略储备”和“数字资产储备库”。

技术右翼势力渲染大国科技竞争的激烈性，进一步推动美国科技政策的“安全化”趋势。^[3]卡普等人将美国技术优势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石，主张美国科技企业应主动配合政府，以更深入的官民力量融合压制“敌对国家”的技术崛起。^[4]2025年2月，万斯在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称，一些“专

[1] “Winning the AI Race: America’s AI Action Plan,” The White House, July 2025, p.3,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07/Americas-AI-Action-Plan.pdf>.

[2] “House Announces Week of July 14th as ‘Crypto Week,’” The Hou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 July 3, 2025, <https://financialservices.house.gov/news/documentsingle.aspx?DocumentID=410793>.

[3] 王帆：《基于优势理念的美国霸权战略及其局限》，《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6期，第35-50页。

[4] 赵明昊：《保守民粹主义崛起：特朗普冲击与中美长期战略博弈》，《外交评论》2025年第1期，第66-91页。

制国家”正将人工智能技术武器化以破坏他国国家安全，警告那些欲与“专制国家”合作的国家不会获得长远收益。^[1]在技术民族主义理念和“安全化”叙事影响下，特朗普第二任期出台多项政策，以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加剧大国科技竞争。^[2]2025年12月，赫尔伯格主导提出“硅和平”（Pax Silica）倡议，邀请英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参加，试图在关键矿产与能源、先进制造、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领域打造一体化的科技—产业联盟，抗衡中国影响力。^[3]2026年2月，万斯在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上主导推出“关键矿产价格底线”等安排，力图构建更有韧性的关键矿产供应链。^[4]上述举措体现出技术右翼以“安全化”逻辑干预市场，加速推进大国科技竞争的理念与策略。

四、技术右翼介入美国政治的挑战

技术右翼对美国选举政治、政府政策制定、选民观念塑造的影响力明显增强，已成为塑造美国政治的新兴力量。然而，技术右翼对政治的介入也面临不少局限性因素，如精英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分歧、商业逻辑与安全逻辑的错位，以及改革倾向与体制惯性的冲突等。技术右翼介入美国政治的实际效果和未来走向仍有不确定性。

（一）精英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分歧

特朗普重返白宫得益于其利用“让美国再次伟大”旗号，统合中西部选

[1] J.D. Vance, “Remarks by the Vice President a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ion Summit in Paris, France.”

[2] “Winning the AI Race: America’s AI Action Plan,” The White House, p.21.

[3] Tripti Lahiri and Shan Li, “U.S. Builds Tech Bloc to Counter China, Adds India as Newest Memb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0, 2026, <https://www.wsj.com/world/india/u-s-builds-tech-bloc-to-counter-china-adds-india-as-newest-member-44afdc60>.

[4] “Vice President JD Vance Delivers Remarks at the Critical Minerals Ministerial,”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4,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videos/vice-president-jd-vance-delivers-remarks-at-the-critical-minerals-ministerial/>.

民基本盘、摇摆州选民和技术右翼等群体，建立起庞大的政治联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联盟内部各群体的利益取向和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不同群体在政策偏好、利益分配等方面存在不少矛盾。技术右翼作为由科技精英群体组成的利益集团，在促进科技创新、提高经济效率等方面拥有共同目标。而右翼民粹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建制派政客、跨国企业长期损害普通民众利益，主张清除“深层政府”、维护本土工作岗位并加大对跨国企业的监管和制约。因此，技术右翼与民粹主义基本盘之间具有重大利益分歧，技术右翼在介入美国政治过程中受到精英利益凌驾民众利益的质疑。

技术右翼与民粹主义群体之间的利益分歧，决定了二者的政策主张难以兼容。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移民、税收、企业监管、关税等政策议程面临内部阻力。以移民政策为例，技术右翼背后的科技企业利益集团需要从全球获取研发人才和高技能劳工，因而支持特朗普政府的 H-1B 工作签证政策；然而，民粹主义群体普遍持反移民立场，认为特朗普政府应优先保护本土劳工的就业机会。特朗普任命持有 H-1B 签证的风险投资人斯里拉姆·克里希南（Sriram Krishnan）为白宫人工智能政策高级顾问，引发右翼民粹主义人士批评。右翼民粹主义旗手人物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抨击 H-1B 签证以牺牲美国人工作为代价，主张废除该签证类别，马斯克则针锋相对指出 H-1B 签证对美国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两人一度爆发充满火药味的争论。^[1]此外，技术右翼与民粹主义群体在税收、企业监管等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右翼民粹主义人士指责美国的科技企业利益集团并不真心支持“美国优先”议程，担心科技精英借助政策影响力谋求私利，主张对工薪阶层减税并对富人增税；

[1] “Steve Bannon Says H1-B Visa Program Is a Scam of the Highest Order, Asks Donald Trump to Revisit the Law that Was Enacted in 1990,” The Economic Times, January 1, 2025,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ternational/us/steve-bannon-says-h1-b-visa-program-is-a-scam-of-the-highest-order-asks-donald-trump-to-revisit-the-law-that-was-enacted-in-1990/articleshow/116834257.cms>.

而技术右翼希望特朗普政府延续对企业的减税政策。^[1] 特朗普政府宣称通过“关税战”促进制造业回流、增加工作岗位，最终惠及美国劳工阶层，但关税政策对美国科技企业利益造成直接损害，苹果、亚马逊、特斯拉等公司的供应链成本上升。^[2] 马斯克与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围绕关税政策爆发激烈争吵，^[3] 暴露特朗普政治联盟的内部矛盾。

技术右翼的精英属性及其凌驾民众利益的诉求，也引发民主党抨击。民主党将技术右翼与共和党的联盟视作对美国民主制度的重大威胁，指责技术右翼借其掌握的社交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帮助特朗普“集权”并规避民主监督，损害美国民众利益。^[4] 2025年3月，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举行选举，马斯克及其关联政治团体投入2100多万美元支持保守派法官候选人施梅尔，自由派候选人苏珊·克劳福德（Susan Crawford）称之为“针对民主前所未有的攻击”，指责马斯克“试图购买州最高法院席位”。^[5] 最终克劳福德胜选，保住自由派法官在该机构的多数地位，反映美国民众对技术右翼、亿万富翁干预政治的不满。

（二）商业逻辑与安全逻辑的错位

作为由科技行业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人组成的利益集团，技术右翼倾向

[1] Steve Inskeep, “Steve Bannon Says MAGA Populism Will Win—as Trump Is Surrounded by Billionaires,” National Public Radio, January 19, 2025, <https://www.npr.org/2025/01/19/nx-s1-5254112/donald-trump-elon-musk-steve-bannon-inauguration-day-2025-billionaires>.

[2] Ari Levy, “The Biggest Questions Facing Big Tech Ahead of Earnings,” CNBC News, April 21, 2025, <https://www.cnbc.com/2025/04/21/tech-earnings-trump-tariffs-tesla-apple-alphabet-meta-microsoft-amazon-nvidia.html>.

[3] Sophia Cai, “Musk Berates Trump Trade Guru Navarro as a ‘Moron’ amid Tariff Turmoil,” Politico, April 8, 2025,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5/04/08/musk-navarro-fighting-00277994>.

[4] Suyash Pasi, “Big Tech’s Shift to the Right,” Human Rights Research Center, March 28, 2025, <https://www.humanrightsresearch.org/post/big-tech-s-shift-to-the-right>.

[5] Nicholas Riccardi, “Democrats’ Win in Wisconsin Court Race Also Is a Big Loss for Elon Musk,” AP News, April 3,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wisconsin-supreme-court-elon-musk-81f71cdda271827ae281a77072a26bad>.

将商业管理的逻辑引入国家治理，以提升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为导向。然而，企业经营的商业逻辑追求利益最大化，难以满足分配正义、权力制衡、维护国家安全等国家治理的需求，必然与政府运作的安全逻辑产生龃龉。即便在技术右翼内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科技精英也有不同利益考量。技术右翼人士大多主张政府减轻对企业的监管和反垄断压力，蒂尔甚至将企业创新等同于走向垄断的过程，认为垄断才是生产力。^[1]然而，放宽反垄断监管或不利于中小型技术的发展，甚至可能产生技术创新停滞、安全风险扩散等负面效应。因此，一些技术右翼人士倾向保持反垄断压力以维护经济安全。例如，万斯曾支持拜登政府时期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汗（Lina Khan）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垄断调查，并主张拆分谷歌等科技巨头。^[2]安德里森提出“小科技”（Little Tech）议程，力图为初创企业争取更多空间。马斯克则以 Open AI 公司存在反竞争行为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3]此外，技术右翼人士在技术风险管控、技术伦理等方面也存在分歧。蒂尔、雅文等认为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发展将提高社会生产力，使所有人受益并一劳永逸地解决诸多社会弊端；而马斯克称，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伴随巨大风险，甚至可能导致“文明的毁灭”（civilization destruction）。^[4]

技术右翼对政治的干预还引发外界对其商业利益损害国家安全的质疑。

[1] Peter Thiel and Blake Masters, *Zero to One: Notes on Startups, or How to Build the Future*, p.39.

[2] Ethan Dodd, “JD Vance Hints Elon Musk, FTC Chair Lina Khan Could Be in Trump Admin: ‘I Agree with Them Both on Some Issues,’” California Post, October 15, 2024, <https://nypost.com/2024/10/15/us-news/j-d-vance-hints-elon-musk-and-lina-khan-could-be-in-trump-admin-i-agree-with-them-both-on-some-issues/>.

[3] “Elon Musk et al. v. Samuel Altman et al.,”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January 10, 2025, <https://www.ftc.gov/legal-library/browse/amicus-briefs/elon-musk-et-al-v-samuel-altman-et-al>.

[4] Clare Duffy and Ramishah Maruf, “Elon Musk Warns AI Could Cause ‘Civilization Destruction’ Even as He Invests in It,” CNN, April 17,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4/17/tech/elon-musk-ai-warning-tucker-carlson>.

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并非完全一致，技术右翼与公权力的深度结合难免出现利益冲突，损害权力制衡原则，并引发国家安全风险。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尽管以削减联邦政府开支为目标，但其聚焦政府发包合规机制的改革被外界质疑是为了维护马斯克名下企业私利。《纽约时报》记者调查发现，“政府效率部”相关行动使针对马斯克旗下企业的32项联邦调查陷入停滞。^[1]此外，还有声音批评“政府效率部”派到联邦机构执行调查工作的年轻工程师获取大量敏感数据，不仅有损公民个人隐私，还可能造成国家秘密泄露。由于技术右翼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商业利益，他们在政府中的职位会否威胁国家安全引发关注。2025年5月，马斯克等科技精英随特朗普访问中东地区。期间，美国科技企业与中东国家签署高达6000亿美元的协议，包括向中东国家出售数十万枚美国先进芯片、与中东国家合作建立人工智能基础设施。^[2]国会议员质疑，这种合作尽管基于商业利益考量，但可能造成美国先进技术和产品经由中东国家流向中国、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风险”。^[3]

（三）改革倾向与体制惯性的冲突

技术右翼势力秉持技术至上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理念，主张运用人工智能等高技术手段大幅改造政府体制。然而，美国的三权分立传统对行政部门具有诸多制约，联邦政府官僚体系也力图抵制技术右翼的行动。在制度惯性束缚下，技术右翼难以达成改造政府的目标。^[4]在特朗普支持下，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提出到2026年削减1万亿美元政府开支的计划，试图整

[1] Algernon Austin, “DOGE Is Helping Musk’s Businesses While Hurting the American Peopl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March 18, 2025, <https://cepr.net/publications/doge-helping-musk-hurting-people/>.

[2] Juliana Liu, “On Middle East Tour, Trump Touts US Tech to Power Post-Oil Future,” CNN, May 14, 2025, <https://www.cnn.com/2025/05/14/tech/us-ai-chips-trump-saudi-arabia-visit-intl-hnk>.

[3] “Letter to Rubio and Lutnick on UAE Chips and AI_5.19,” Senate Democrats, May 19, 2025, https://www.democrats.senate.gov/imo/media/doc/letter_to_rubio_and_lutnick_on_uae_chips_and_ai_519.pdf.

[4] 韩召颖、刘锦：《特朗普2.0时代硅谷右转的动机与限度》，第75-86页。

治联邦政府内部的欺诈、浪费等弊病。“政府效率部”在未经安全许可的情况下访问美国国际开发署、财政部支付系统等政府机构的机密信息，通过解雇或延期辞职计划裁减国税局、国防部等机构的大量员工。外界质疑，“政府效率部”并不具有裁减联邦政府员工的合法权力。2025年2月，14个州的检察长起诉马斯克、“政府效率部”和特朗普政府，指控对马斯克的任命和“政府效率部”运作违反宪法有关权力制衡和重要官员须经总统提名及参议院批准的条款。^[1]在“政府效率部”要求联邦政府雇员提交工作进展报告后，国防部、国务院、联邦调查局等政府机构均指示部门员工暂停回应此要求，体现“政府效率部”和既有联邦机构之间的矛盾。

技术右翼改造美国政府治理模式和内外政策的雄心，也面临美国联邦制和政党政治的束缚。一方面，一些共和党政客不满技术右翼的做法。众议长约翰逊等人批评马斯克对《大而美法案》的反对态度，^[2]不希望技术右翼完全控制共和党的政策议程。不少共和党议员也抱怨，“政府效率部”削减福利等行动使其在地方选区面临压力。^[3]另一方面，技术右翼成为民主党攻击对象，其倡导的科技政策遭到民主党主导州的反对。民主党人士指责技术右翼削减政府开支、重组政府机构的行动违反美国宪法及《隐私法》等法律，并提起诉讼。部分州还通过州层面立法抵制技术右翼的政策主张，监管其企业经营活动。例如，纽约州通过《停止隐藏仇恨法》，要求社交媒体公司每年向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提交两次报告，说明平台现行服务条款是否对仇恨与

[1] “Attorney General Bonta Sues Trump Administration, Challenging Elon Musk’s Unconstitutional Exercise of Power,” State of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Justice, February 13, 2025, <https://oag.ca.gov/news/press-releases/attorney-general-bonta-sues-trump-administration-challenging-elon-musk%E2%80%99s>.

[2] Mychael Schnell, “Speaker Johnson Calls Musk Criticism of Trump Agenda Bill ‘Terribly Wrong,’” The Hill, June 3, 2025, <https://thehill.com/homenews/house/5330887-speaker-johnson-elon-musk-trump-agenda-bill/>.

[3] Alexander Bolton, “GOP Senators Vent Musk Frustrations at Closed-Door Meeting,” The Hill, February 27, 2025, <https://thehill.com/homenews/senate/5166003-tech-billionaire-elon-musk-government-jobs/>.

极端主义言论、虚假信息进行审核；^[1] 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等州立法要求大型人工智能企业披露其开发实践中的安全风险，并评估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算法歧视情况。此外，民主党将反制马斯克等技术右翼的相关做法与制衡特朗普和共和党的行动联系起来，借此凝聚党内共识并明确政治议程。例如，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等民主党议员聚焦立法限制“政府效率部”对政府机构的访问权限、阻止特朗普政府削减关键政府开支等。^[2] 民主党进步派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人将全面暂停建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视作“捍卫民主制度”的重要举措，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部署缺乏有效监管并可能造成大规模失业，需要“所有人而不只是亿万富翁来决定人工智能的未来”。^[3] 左翼力量在全美发起的反马斯克、反特斯拉示威活动得到民主党组织的协调和资金支持。^[4]

五、结语

近年来，技术右翼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其秉持技术至上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技术民族主义等理念，谋求以右翼保守意识形态塑造美国政治，主要手段包括助力共和党竞选、担任政府重要职位，以及运用新兴

[1] “Stop Hiding Hate Act,” Office of the New York State Attorney General, December 23, 2024, <https://ag.ny.gov/resources/organizations/social-media-tos-reporting/stop-hiding-hate-act>.

[2] “Dear Colleague re: Ongoing House Democratic Caucus Activity,” Democratic Leader Hakeem Jeffries, February 3, 2025, <https://jeffries.house.gov/2025/02/03/dear-colleague-re-ongoing-house-democratic-caucus-activity/>.

[3] Bernie Sanders, “Sen. Bernie Sanders @SenSanders,” X, December 16, 2025, <https://x.com/SenSanders/status/2001057004370948131>; Kevin Robillard, “The Coming War over AI Will Define the 2026 Midterms,” Huff post, December 31, 2025,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uk/entry/the-coming-war-over-ai-will-define-the-2026-midterms_n_6953f7fbc4b06a970133dfb7.

[4] “Exposed: The \$124 Million Democrat Machine Behind Anti-Tesla ‘Grassroots’ Protests,” Fairfax Republicans, April 1, 2025, <https://fairfaxgop.org/exposed-the-124-million-democrat-machine-behind-anti-tesla-grassroots-protests/>.

技术和传播手段宣扬政策理念。技术右翼对政治的干预冲击美国政党选民联盟，加剧政治极化，深刻影响美国科技战略与政策。然而，技术右翼归根结底是一种精英利益集团，其与右翼民粹主义群体存在分歧，这股势力推崇的商业逻辑与国家治理之间也并不完全适配，其政治介入面临不少挑战。

技术右翼崛起反映美国国内极化加剧和保守主义政治周期回归的趋势。科技精英从美国政治幕后走向台前，标志着传统的政府—企业互动模式发生深刻转变。如何与技术企业、科技精英开展互动，已成为美国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的关键议题。短期看，技术右翼深度嵌入特朗普政府政治活动，能够影响美国科技、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政策。长期看，技术右翼能否延续其政治影响力，将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共和党能否维系包含技术右翼和民粹主义群体等利益集团的“特朗普联盟”，使技术右翼继续依托共和党参与政治活动；共和党能否在未来选举中维持本党优势，使技术右翼继续塑造美国内外政策；美国政府与持技术右翼立场的高技术企业互动会否受到有效制衡。

【责任编辑：吴劲杰】

从秩序到权力：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 外交的演进^{*}

□ 王 浩

〔提 要〕 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国际秩序的冲击打破了国际关系理论关于霸权国维持现状偏好的假设，修正主义成为美国外交研究的一种新范式。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的修正主义外交出现一系列重大新变化：对多边机制与国际组织的规范性不满加深，给现行国际秩序造成更大冲击；对全球权力格局和均势的分配性不满，试图通过构建势力范围、对他国极限施压、武力干预以及进行领土扩张等方式谋求更大的现实利益、强化美国的硬实力优势。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从秩序到权力的演进植根于保守民粹主义持续兴起、总统威权化执政模式形成和大国竞争日趋复杂的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双重逻辑。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进一步削弱了国际体系的稳定和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但也面临国际体系规范、全球权力结构以及美国政治制度等内外因素的多重制约。

〔关 键 词〕 特朗普政府、美国外交、修正主义、国际秩序、大国竞争

〔作者简介〕 王 浩，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D87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 (2026) 3 期 0092-22

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以霸权稳定论和权力转移理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研

^{*} 本文是复旦—金光思想库 2025 年度课题（项目批准号：JGSXK2509）的阶段性成果。

究范式认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守成国存在“维持现状”(status-quo)偏好、崛起国/新兴大国则是“修正主义”(revisionism)国家，原因在于前者往往是既存国际秩序的创立者、主导者和受益者，后者则不满足于现状、试图分享主导权甚至颠覆既存秩序。^[1]然而，自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开始，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却表现出日益显著的修正主义倾向，不仅公开表达对现有多边机制与国际组织的严重不满，而且在实践中通过大规模贸易战、一系列单边“退群”行为和对盟友关系的重新定义，对二战后由其主导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修正主义霸权”随之成为美国外交研究的一种新范式。^[2]第二任期开启后，美国外交出现新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延续并进一步强化了对多边机制与国际组织的不满、抵触甚至破坏，另一方面则将其修正主义倾向拓展至全球权力结构和均势领域，试图谋求更大的现实利益并强化美国的硬实力优势。如果说特朗普第一任期外交以对国际秩序的修正为主、包含少量的权力修正成分，那么其第二任期外交则显著增加了对全球权力结构和均势的修正。从学理和实践两个维度剖析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演进，评估其对国际体系和美国领导地位造成的重大影响，分析其面临的制约，有助于加深对美国外交转型趋势的理解与把握。

一、修正主义的类型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外交实践

国际关系中的修正主义源自国家对世界事务状况的不满。^[3]按照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兰德·施韦勒的观点，国家为改变与维持现状所分别愿意付出

[1] A. F. K. Organsky,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p.123;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2] G. John Ikenberry,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96, No.3, 2017, pp.2-9; Doug Stokes, “Trump,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No.1, 2018, p.133.

[3] Alexander Cooley, Daniel Nexon and Steven Ward, “Revising Order or Challenging the 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 An Alternative Typology of Revisionist and Status-quo Stat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5, No.4, 2019, pp.689-708.

的成本的比值是衡量其修正主义程度的标准，比值越高则修正主义偏好越显著。^[1]从具体来源看，修正主义偏好的形成与国家对国际体系中的既存规则、制度安排、领土资源分配、军事力量格局及自身声望等现状的不满紧密相关。^[2]以此为基础，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史蒂文·沃德将修正主义的衡量标准与产生来源纳入不同维度的变量中，运用类型学方法在理论和政策两个层面进一步赋予其可操作性和应用空间，使之发展为一个逻辑更为严密的学术概念和一项可供检验的外交政策分析框架。

沃德认为，修正主义是一个双维概念，主要由建立在“规范性不满”（normative dissatisfaction）和“分配性不满”（distributive dissatisfaction）基础上试图改变现状的战略意图及其相应外交政策构成。^[3]前者指对现有国际制度和规则的不满，后者则强调对更强的军事力量、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更多的领土资源等的野心和追求。依据这一划分标准，国际体系中的修正主义国家主要有三个类别：一是“激进型修正主义”（revolutionary revisionism）国家，它们对现状兼具规范性不满与分配性不满，如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都试图彻底颠覆当时的国际秩序和权力格局；二是“改革型修正主义”（reformist revisionism）国家，表现为对现状的规范性不满，如20世纪初的美国试图以一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为契机，通过“十四点计划”改革由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三是“地位型修正主义”（positionalist revisionism）国家，表现为对现状的分配性不满，如冷战后的俄罗斯一方面试图融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另一

[1]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1994, pp.88-100.

[2] Jason Davidson, “The Roots of Revisionism: Fascist Italy, 1922-39,” *Security Studies*, Vol.11, No.4, 2002, pp.125-159; Sten Rynning and Jens Ringsmose, “Why Are Revisionist States Revisionist? Reviving Classical Realism a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hang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5, No.1, 2008, p.19.

[3]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Steven Ward, “Race, Status, and Japanese Revisionism in the Early 1930s,” *Security Studies*, Vol.22, No.4, 2013, pp.608-609.

方面对北约东扩蚕食其安全利益与削弱其国际地位强烈不满。与上述三类相对应的是维持现状国家，即在规范和分配两个层面均对现状感到满意的国家，典型代表为冷战后的美国。^[1]

上述概念界定和类型划分厘清了修正主义的不同类型及其背后逻辑。然而，既有研究也存在明显局限，集中表现为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学术话语体系惯于将自己划归为维持现状国家，这就导致这一分析框架和路径大体遵循了传统的“守成国 / 维持现状 vs 崛起国 / 修正主义”的二元假定，无法将近年来日益凸显的作为“修正主义霸权”的美国及其外交转型趋势和逻辑纳入其中进行系统审视。本文尝试打破上述二元假定并借鉴既有研究框架，将其转化、扩展和运用到对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探讨之中。所述修正主义主体是对国际秩序演变具有显著冲击力和破坏性，并且处于全球权力格局顶端、不存在对自身地位不满的霸权国。本文将美国分别基于对国际秩序的规范性不满和对全球权力格局 / 均势的分配性不满而形成的修正主义外交界定为“秩序型修正主义”和“权力型修正主义”。

特朗普第一任期外交主要是规范性不满催生的秩序型修正主义，其中也包含少量的权力型修正主义成分。早在 2016 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便提出“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外交理念，多次表达对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并长期维护的多边机制与国际组织的不满。执政后，特朗普通过三方面行动不断推进修正主义外交并对国际秩序发起冲击。一是对世界贸易秩序的“修正”。在第一任期内，特朗普针对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发动多轮关税战并推动国会通过贸易保护主义相关法案，严重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破坏了全球贸易秩序甚至逆转了冷战后不断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2]二是对美国全球联盟体系尤其是跨大西洋关系的“修正”。联盟责任分摊成为特朗普政府对盟友施压的主题，双方围绕防务开支问题等展开了激烈博弈。

[1]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2] 吴心伯：《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走向》，《国际问题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19 页。

其中，要求北约成员国大幅增加军费以及重新评估北约集体防御条款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核心诉求。在美国持续施压下，北约盟友同意大幅增加军费、更快兑现军费开支占各自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目标。^[1]三是对既有多边机制、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模式的“修正”。美国开始拒绝承担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义务，大幅削减国际组织经费预算并从一系列多边协定和国际组织中退出，对既有多边机制的有效运转形成冲击，并导致多个领域的全球治理（如气候变化）出现倒退。^[2]

特朗普第一任期外交实践表明，霸权 / 守成国基于规范性不满而推行的秩序型修正主义外交政策与西方既有现实主义理论视阈下的崛起国 / 新兴大国的改革型修正主义外交政策存在两方面根本区别。一是对国际秩序造成的冲击更大。作为现存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美国的修正主义行为带来的冲击远非其他国家所能比拟。特朗普政府在国际经贸、联盟体系和多边合作的政策转型，给经济全球化、美国同盟友的关系以及全球治理都带来了重大甚至不可逆的冲击。二是几乎不具备任何建设性，以破坏性为主。新兴大国对国际秩序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具有建设性，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多元和开放的国际经贸体系、多边合作机制和全球治理模式，以更好应对全球性挑战。然而，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对多边合作和全球治理的影响则是破坏性的，不仅没有提出替代方案，反而基于私利大搞“退群”和单边主义外交，造成了国际秩序的倒退。

特朗普第一任期外交也存在一定的权力型修正主义。无论是对中国的竞争性战略和全政府式打压、以关税和产业政策力推制造业回流美国，还是试图通过重新分配联盟责任与经贸收益来强化美国相对优势，其背后都包含获取更多物质利益和增进美国权力的意图。总体而言，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修正

[1] 王浩、叶成城：《后自由国际主义时代美国对外战略转型的两种路径》，《太平洋学报》2025 年第 3 期，第 35 页。

[2] 温尧：《退出的政治：美国制度收缩的逻辑》，《当代亚太》2019 年第 1 期，第 4-37 页。

主义外交主要指向对既有国际规则、制度和责任安排的不满，其修正重点尚未达到第二任期公开转向领土扩张、势力范围构建和关键资源攫取的程度。

二、从秩序到权力：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新变化

特朗普再度执政后对美国内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其中，其修正主义外交变化成为理解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关键。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试图更为全面、激进地重塑国际体系，其核心特征有两点：一是基于规范性不满的对既有国际秩序的冲击进一步增强，秩序型修正主义色彩愈发浓厚；二是基于分配性不满的权力型修正主义开始系统显现，试图通过强化势力范围、进行资源掠夺甚至发动军事冒险重塑全球权力结构和均势，强化美国硬实力优势。两相叠加的结果是，美国正朝着一个对现有国际体系更具破坏力的激进型修正主义国家方向转型。^[1]

（一）特朗普政府秩序型修正主义外交的强化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后，在经贸、联盟以及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等问题上延续并强化了“美国优先”理念，秩序型修正主义外交进一步升级。

在经贸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较第一任期范围更广、力度更大，呈现为更加直接地服务于美国再工业化和实现供应链重组的特征。早在 2024 年大选期间，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活动以及共和党发布的最新版党纲即反复强调，“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经济目标在于实现贸易平衡、重振美国本土制造业从而重建“制造业超级大国”，以及增强供应链韧性。^[2] 在实践中，为追求贸易平衡，特朗普政府于 2025 年 4 月以外国的贸易和经济做法造成美国出现“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启动“全球对等关税”政策，

[1] 当然，同为激进型修正主义国家，美国作为霸权国对国际体系造成的破坏与历史上德日等崛起国有何差异，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限于篇幅、主题以及美国仍处于动态转型阶段，对此不作展开。

[2] “The 2024 Republican Platform,” <https://prod-static.gop.com/media/RNC2024-Platform.pdf>.

同时推出针对所有贸易伙伴的 10% 的基准关税与针对主要逆差经济体的更高关税。^[1]2026 年 2 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并不授权总统以相关紧急状态为由征收此类关税。白宫随即依据《1974 年贸易法》第 122 条宣布征收为期 150 天的 10% 临时进口附加税。^[2]为重振本土制造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先后启动围绕制造业结构性产能等的 301 调查、以国家安全为由调整药品以及钢铝的进口措施。同时,特朗普政府还以税收优惠和投资便利化措施等方式吸引大型跨国公司和产业资本在美国投资设厂。^[3]为增强供应链韧性,特朗普政府将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战略资源在美生产和进口替代直接纳入国家安全框架,2026 年 1 月就加工关键矿产发起进口调整谈判,同年 4 月依据《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款对专利药及其原材料采取上限为 100% 的进口关税税率措施。^[4]以上政策动向表明,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经贸领域的秩序型修正主义政策进一步强化,不仅在于全球关税战规模和力度的升级,也在于一系列产业政策的跟进和配套使用。

在联盟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秩序型修正主义外交的强化,则表现为从其第一任期围绕盟友“搭便车”问题的交易式施压,升级为对美国联盟体系在责任分配和利益回报等方面的系统性重估和全方位重塑。在跨大西洋联盟问题上,一方面,在 2025 年北约海牙峰会期间,特朗普政府要求盟友将军费开支从国内生产总值的 2% 提高到 5% 并写入峰会宣言,进而在 2025 年《国家安

[1]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Declares National Emergency to Increase our Competitive Edge,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and Strengthen our Nation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April 2,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4/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declares-national-emergency-to-increase-our-competitive-edge-protect-our-sovereignty-and-strengthen-our-national-and-economic-security/>.

[2] Supreme Court of the US, “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 February 20, 2026,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25pdf/24-1287_4gcj.pdf.

[3] The White House, “50 Wins in 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 June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5/06/50-wins-in-the-one-big-beautiful-bill/>.

[4] The White House, “Adjusting Imports of Processed Critical Minerals and Their Derivative Produc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6/01/adjusting-imports-of-processed-critical-minerals-and-their-derivative-products-into-the-united-states/>.

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由美国长期承担安全供给的模式难以为继。^[1] 另一方面，在 2026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进一步要求欧洲成为“更自立”的大陆，将对盟友的施压从单纯的军费分担扩大到战略与安全结构的重大调整。^[2] 在亚太联盟方面，特朗普政府同样以“美国优先”为原则，在 2025 年 9 月生效的美日框架协议中对日本输美商品设定 15% 的基准关税，以服务贸易平衡和产业回流的目标，还在 2026 年 3 月举行的美日首脑会晤中明确要求日本加快提升自身防务能力和增加防务预算。^[3] 伊朗危机爆发后，特朗普政府并未通过协商争取盟友支持，而是对包括盟友在内的任何直接或间接获取伊朗货物和服务的国家加征关税，同时以所谓“保护美国公民、盟友和利益”为名采取对伊军事行动，后又在伊方持续反击的背景下施压盟友配合对伊打击，再一次反映出其“美国优先”理念下的单边主义逻辑。^[4]

在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秩序型修正主义外交的强化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延续和强化第一任期的“退群”外交。执政伊始，特朗普政府便先后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协定》，停止对包括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内的联合国组织和项目的资助。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对联合国等多边机制的冲击已不仅是消极抽离，而是具有进攻性的主动

[1]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Vision Drives NATO Breakthrough,” June 26,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5/06/president-trumps-leadership-vision-drives-nato-breakthrough/>.

[2] The White House, “In Munich, Secretary Rubio Calls on Allies to Embrace Shared Heritage, Meet Challenges of New Era,” February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6/02/in-munich-secretary-rubio-calls-on-allies-to-embrace-shared-heritage-meet-challenges-of-new-era/>.

[3]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mplements A Historic US-Japan Framework Agreement,” September 5,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9/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implements-a-historic-u-s-japan-framework-agreement/>;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Strengthens US-Japan Alliance for the Benefit of All Americans,” March 19,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6/03/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strengthens-u-s-japan-alliance-for-the-benefit-of-all-americans/>.

[4]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Strengthens US-Japan Alliance for the Benefit of All Americans,” March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6/03/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strengthens-u-s-japan-alliance-for-the-benefit-of-all-americans/>.

削弱。^[1]2026年1月，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宣布启动退出多达66个国际组织，这对既有多边机制造成的冲击在力度和范围上都已远超其第一任期。^[2]二是在“退群”基础上，以“美国优先”理念为原则“另起炉灶”，绕开联合国等权威机构搭建新的机制平台，从而对其形成架空。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对不符合自身利益和主导权要求的既有机制减少参与、削弱支持甚至直接退出的行为，是对第一任期秩序型修正主义外交的延续，那么其试图构建服务于自身议程的新的机制平台，则是第二任期秩序型修正主义外交的新形态。2026年1月16日，特朗普政府在公布加沙冲突的全面解决方案时，公然绕开联合国推动的停火治理模式，将“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设定为关键机制，并迅速于1月22日正式批准其宪章、确立其为正式国际组织。^[3]三是对美国国内与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相关的行政部门和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包括大幅削弱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大力重振传统能源，要求对美国参与的所有国际组织展开全面审查。^[4]2025年12月，美国国际开发署监察长办公室的年

[1] The White House, “Withdrawing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nd Ending Funding to Certain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s and Reviewing United States Support to Al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ebruary 4,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withdrawing-the-united-states-from-and-ending-funding-to-certain-united-nations-organizations-and-reviewing-united-states-support-to-all-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Withdraws the United States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Are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7,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6/01/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withdraws-the-united-states-from-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that-are-contrary-to-the-interests-of-the-united-states/>.

[2]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ial Memoranda: Withdrawing the United States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ventions, and Treaties that Are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7,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6/01/withdrawing-the-united-states-from-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conventions-and-treaties-that-are-contrary-to-the-interests-of-the-united-states/>.

[3]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Trump Ratifies Board of Peace in Historic Ceremony, Opening Path to Hope and Dignity for Gazans,” January 22,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6/01/president-trump-ratifies-board-of-peace-in-historic-ceremony-opening-path-to-hope-and-dignity-for-gazans/>.

[4] The White House, “Reevaluating and Realigning United States Foreign Aid,”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reevaluating-and-realigning-united-states-foreign-aid/>.

度报告指出，随着大量项目资金和职能转入国务院以及人员大幅缩减，该部门原有的独立运作能力已遭到严重削弱。^[1]

（二）特朗普政府权力型修正主义外交的系统展开

如果说秩序型修正主义及其破坏性的增强是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在程度上的变化，那么权力型修正主义的系统展开则是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更具实质性的新变化。它表现在对国际体系的规范性不满加剧的同时，大幅强化了对全球权力格局和均势的分配性不满，开始试图通过多种手段挑战现状、更为赤裸裸地追求美国的现实利益和硬实力优势，对国际体系造成的冲击更加强烈。

在实践中，特朗普第二任期基于分配性不满的权力型修正主义外交主要表现为四类相互关联的政策：一是围绕运河、海湾和关键航道等战略空间提出更直接的主权性主张；二是在西半球通过军事行动、资源控制和排他性安全安排强化自身势力范围；三是在涉及盟友领土及其周边地区安全的问题上持续施压并试图松动既有主权边界；四是在地区冲突中更突出交易、强制甚至冒险手段，以此推动美国对地区权力格局的塑造。

首先，特朗普第二任期权力型修正主义外交最直接地体现为将重要国际战略空间和关键地缘节点视为掠夺对象并推到政策前台。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公开表示美国“将收回巴拿马运河”，并将其直接同美国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提出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2]在2026年2月发布的《美国海事行动计划》中，特朗普政府不仅将包括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在内的国际水道的自由通行界定为美国必须直接维护的核心利益，还把北极水道安全、港口和造船能力、关键海上通道控制等纳入国家安全框

[1] USAID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Top Management Challenges Facing US Foreign Assistance in Fiscal Year 2026,” December 16, 2025, <https://oig.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2026-01/Top%20Management%20Challenges%20Facing%20U.S.%20Foreign%20Assistance%20in%20Fiscal%20Year%202026.pdf>.

[2] The White House, “The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remarks/2025/01/the-inaugural-address/>.

架。^[1]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此举意在使上述空间和节点成为美国安全、经济和地缘优势的关键支点。^[2]

其次，特朗普政府在西半球通过军事行动、资源控制和排他性安全安排强化势力范围的做法，构成其权力型修正主义外交的内核。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门罗主义“特朗普推论（the Trump corollary）”，并将其置于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位置，主张在西半球恢复美国优先地位，阻止域外竞争者控制战略性资产，并对该地区相关国家推行拉拢与扩展政策。^[3] 以此为背景，2026年1月3日，美军对委内瑞拉悍然发动空袭并实施突入行动，三角洲特种部队在目标点控制并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4] 在这场代号为“绝对决心行动”的抓捕实施后，特朗普宣称将“让美国大型油企进入并主导委内瑞拉石油的修复与运营”^[5]。1月4日，鲁比奥公开强调不能允许竞争者将西半球作为行动基地，表示“这是我们的半球”。^[6] 1月9日，白宫通过行政令将委内瑞拉石油收益纳入美方主导的金融

[1]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Trump Is Standing Up to Terrorism and Protecting International Commerce,” March 15,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5/03/president-trump-is-standing-up-to-terrorism-and-protecting-international-commerce/>; The White House, “America’s Maritime Action Plan,” February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6/02/Restoring-Americas-Maritime-Dominance.pdf>.

[2] Joseph M. Sweeney, “What 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eans for Naval Forc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18,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hat-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means-naval-forces>.

[3]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4] “Mock House, CIA Source and Special Forces: The US Operation to Capture Maduro,” Reuters, January 4, 2026,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mock-house-cia-source-special-forces-us-operation-capture-maduro-2026-01-03/>.

[5] “Trump Says US Oil Companies Will Spend the Billions Needed to Restore Venezuela’s Crude Output,” Reuters, January 3, 2026,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trump-says-us-oil-companies-will-spend-billions-venezuela-2026-01-03/>.

[6] The White House, “RUBIO: This Is Our Hemisphere —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Not Allow Our Security to Be Threatened,” January 4,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6/01/rubio-this-is-our-hemisphere-and-president-trump-will-not-allow-our-security-to-be-threatened/>.

体系监管和处置框架中。^[1]由此可见，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地区安全、政权更迭与资源控制被结合起来加以推进，表明其势力范围构建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进攻性。

再次，特朗普政府权力型修正主义外交还体现在其针对其盟友的掠夺性霸权政策中，尤其是围绕格陵兰岛和加拿大等涉及盟友领土主权及其周边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持续施压。2025年2月，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加拿大作为美国第51州会更好”，并以羞辱方式把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作“加拿大州州长”、把加拿大称作“伟大的加拿大州”，试图在政治话语上将加拿大降格为美国的附庸。^[2]在格陵兰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更是不顾丹麦和欧洲反对，将北约盟友这一领土当成可强买强取的标的。就任后，特朗普反复宣称出于美国国家安全与北极战略需要，美国“必须得到格陵兰”，并以“我们会拿下”的强硬姿态向丹麦持续施压，甚至在公开表态中暗示不排除采用强硬手段；在行动上，特朗普安排副总统万斯、国务卿鲁比奥与丹麦、格陵兰方面官员会谈，形成“先极限施压、再谈判逼迫对方让步”的霸凌模式。^[3]

最后，特朗普政府权力型修正主义外交在应对乌克兰危机和美以伊战争等地区安全危机时，表现为更强调交易、强制甚至高风险军事冒险，试图在短时间内获取现实利益并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一方面以推动停火和结束战争为名对乌克兰持续施压，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所谓“美乌重建投资基金”谋求攫取乌克兰自然资源。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明确提出，该基金将取得乌克兰自然资源项目相关特许权

[1] The White House, “Safeguarding Venezuelan Oil Revenue for the Good of the American and Venezuelan People,” January 9,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6/01/safeguarding-venezuelan-oil-revenue-for-the-good-of-the-american-and-venezuelan-people/>.

[2] “Pres. Trump Says He’d Like for Canada to Become the 51st State,” C-SPAN, February 3, 2025, <https://www.c-span.org/clip/white-house-event/pres-trump-says-hed-like-for-canada-to-become-the-51st-state/5152113>.

[3] CNN Transcripts, “White House: Trump Acquiring Greenland is a ‘National Security Priority,’” January 6, 2026, <https://transcripts.cnn.com/show/acd/date/2026-01-06/segment/01>.

使用费等收入的50%。^[1]在伊朗问题上,这一权力型修正主义外交的强制性和冒险性体现得尤为明显。2026年2月,特朗普政府在同伊朗进行核问题谈判期间悍然发动军事打击,对伊朗最高领导层实施“斩首行动”。在遭到伊方持续反击并逐步陷入冲突泥潭后,特朗普一方面反复宣称赢得胜利、分别摧毁和重创伊朗海军和空军,另一方面则要求那些未卷入战争但面临燃料短缺的国家向美国购买石油并自行保护海上运输线。^[2]

以上政策演变表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秩序型修正主义外交政策强化与权力型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的系统展开,使美国朝着更为极端的激进型修正主义霸权国家方向发展,持续从秩序与权力两个维度对国际体系造成冲击破坏。

三、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演进逻辑及其影响

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不断演进,既有国内政治根源,也与国际环境相关,是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双重逻辑作用的产物。在实践中,尽管上述修正主义外交短期内可能为特朗普政府带来某些额外收益,但在中长期意义上将大幅削弱国际体系运转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和美国自身全球领导地位。

(一) 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演进的双重逻辑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外交政策的修正主义转向便与保守民粹主义兴起的国内政治逻辑紧密相关。一方面,特朗普的执政基础建立在共和党传统保守派的内外政策利益诉求之上,其外交政策带有鲜明保守主义色彩,

[1]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Secures Agreement to Establish United States-Ukraine Reconstruction Investment Fund,” May 1,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5/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secures-agreement-to-establish-united-states-ukraine-reconstruction-investment-fund/>.

[2]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Trump Delivers Powerful Primetime Address on Operation Epic Fury,” April 1,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6/04/president-trump-delivers-powerful-primetime-address-on-operation-epic-fury/>.

如信奉单边主义和实力地位、排斥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1] 另一方面，特朗普在 2016 年美国大选中“胜选联盟”的构建，离不开以白人劳工为代表的右翼民粹派选民群体支持，因此其外交政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浓厚的右翼民粹主义烙印，而后者恰恰是对现状感到不满的产物。^[2] 这种不满投射到外交政策领域，首先表现为一系列强烈的“纠偏”诉求，包括“美国优先”理念下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对美国与其盟友在防务安全责任方面的“不对等”关系，以及反对国际制度与多边合作给美国造成的“不公正”后果。以此为基础，由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叠加产生的保守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便构成特朗普政府秩序型修正主义外交政策形成的国内政治逻辑。

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修正主义外交演进的国内政治逻辑在于，肇始于 2016 年的美国保守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政治运动在 2024 年大选中进一步壮大，特朗普以此宣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意授权”。统计数据显示，特朗普在此次大选中不仅赢得了全部七个摇摆州和普选票的多数、取得比 2016 年大选更为强势的胜利；更重要的是，保守派和民粹派两大核心选民群体对他的支持率分别高达 90% 和 67%、显著高于 2016 年和 2020 年的水平，为其大幅胜选立下了汗马功劳。^[3] 在所谓“民意授权”逻辑驱动下，特朗普组建起较其第一任期更强调政治忠诚度和行动一致性的执政团队，为其内政、外交决策的集权化、个人化甚至带有进攻性的独断专行提供了便利。其结果是，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更趋极端化，不仅表现在对国际秩序的不满程度和破坏性增大，而且其修正目标进一步升级，开始试图重塑全球权力结构，

[1] Robert C. Smith, “Ronald Reagan, Donald Trump,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Conservatism in America,”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Vol.10, No.2, 2021, pp.283-289.

[2] 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3] “Election 2024: Exit Polls,” CNN, December 13, 2024, <https://www.cnn.com/election/2024/exit-polls/national-results/general/president/0>; “Exit Polls,” CNN, <https://www.cnn.com/election/2020/exit-polls/president/national-results/0>; “2024 Time Series Studies,” ANES, <https://electionstudies.org/data-center/2024-time-series-study/>; “2020 Time Series Studies,” ANES, <https://electionstudies.org/data-center/2020-time-series-study/>.

通过领土扩张和强化势力范围等方式服务于“让美国再次伟大”议程。很明显，后者已经超过了保守民粹主义理念界定的外交政策目标，尤其是“权力修正”逻辑意味着美国将可能卷入更多海外事务甚至地区冲突。因此，尽管保守民粹群体对特朗普政府秩序型修正主义外交政策仍持积极态度，但却围绕其权力型修正主义的一系列具体政策产生了内部分裂。例如，在对伊朗动武问题上，包括前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乔·肯特、前国会众议员乔玛丽·格林和知名保守派评论家塔克·卡尔森在内的原特朗普阵营得力干将纷纷倒戈，批评其扩张和干预政策背离了保守民粹主义原则和“让美国再次伟大”议程的初衷。^[1]然而，执政联盟内部的分裂态势并未使特朗普改弦更张，反而促使其对内部异见人士展开猛烈政治打压。这就表明，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演化甚至异化趋势，不仅建立在既有的保守民粹主义传统基础之上，更离不开特朗普第二任期由更强政治基础、更忠诚执政团队带来的强势个人化、集权化以及进攻性执政理念和风格。在此背景下，反对海外军事干预的保守民粹派新生代领袖、副总统万斯只能被迫为特朗普背书，而鲁比奥、库什纳等共和党内鹰派和亲以色列势力则成为站在前台进行配合的积极角色。^[2]简言之，保守民粹主义的理念根基，连同建立在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和高度忠诚的执政团队基础上更具个人化的决策模式，共同构成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拓展出更为系统的权力型修正主义的国内政治逻辑。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深化和拓展，植根于大国战略博弈背景下美国对竞争抓手、竞争空间和竞争方式的三重认知变化。首先是竞争抓手的变化。特朗普第二任期国际竞争的重点并非是国际秩序和制度规则的主导权，而是对战略空间、关键资源、海上通道和地缘节点的控

[1] “Top US Security Official Quits, Says Iran did not Pose Immediate Threat,” Reuters, March 17, 202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us-national-counterterrorism-center-director-resigns-over-war-iran-2026-03-17/>.

[2] “Vance Says He Trusts Trump on Iran War, Plays down Differences,” Reuters, March 16, 202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vance-says-he-trusts-trump-iran-war-plays-down-differences-2026-03-16/>.

制。2025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 2026 年《美国海事行动计划》都表明了这一战略认知转向。二是对竞争空间的重新分层。西半球被特朗普政府视为至关重要的本土安全外延空间，印太地区和海上通道被视为维系工业基础和全球竞争力的功能性战略空间，中东则被界定为在防止敌对力量主导的同时避免陷入“无尽战争”的高风险战略空间。^[1] 上述空间认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特朗普第二任期权力型修正主义外交的地缘逻辑。三是在竞争方式上，现实主义强调的硬实力优势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尤其是进行大国博弈的主要手段，这就解释了为何美国正在从“仁慈盟主”转型为“掠夺霸权”^[2]。

（二）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影响

在上述双重逻辑作用下，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的演进、特别是其第二任期以来在地缘政治上强化扩张性叙事与构建势力范围的做法，公开挑战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规范，使之日益具备激进型修正主义国家特征。在实践中，这一外交转向已对国际体系造成了两方面显著冲击，未来中长期负面影响尚难以充分预估。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动摇了国际体系稳定。二战结束以来，有赖于对主权边界与领土完整原则的普遍承认，以及对国际规则及其可预期性的共同信念，国际体系维持相对稳定。特朗普政府在涉及他国领土主权议题上的掠夺性姿态和行为，使得上述两项条件同时受损。即便相关行动未必立即转化为事实占领，也足以改变各国对美国的风险评估，系统性放大了安全困境，使世界重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及从“洛克式无政府文化”到“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的退化。^[3]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显著削弱了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规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2] 刘丰：《从仁慈盟主到掠夺霸权：“特朗普 2.0”时代的美国联盟战略》，《外交评论》2026 年第 1 期，第 42-68 页。

[3] Brookings, “Breaking Down Trump’s 202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cember 8, 2025,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breaking-down-trumps-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范性权威”，进一步侵蚀其联盟体系的凝聚力。冷战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仅建立在军事与经济等硬实力之上，更依赖其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叙事供给与制度承诺。当特朗普政府试图削弱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与国际组织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的权威，同时对国际法与规则表现出漠视，甚至习惯于以“胁迫+交易”的方式处理领土扩张、地区冲突与势力范围等议题时，美国事实上消耗了自身最关键的无形资产——信誉与合法性。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回应美国削减相关国际援助时明确指出，这些做法将使世界“更不健康、更不安全，也更不繁荣”。^[1]在政策实践中，围绕格陵兰岛的争议集中体现了美国“规范性权威”的式微。在此过程中，欧洲多国公开批评特朗普政府做法、强调主权与国际法原则，并在政治与安全层面表达对丹麦和格陵兰的支持，反映出传统盟友对美国战略意图的深层疑虑正在上升。^[2]从联盟政治视角观察，这种疑虑将带来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促使盟友加速“去风险化”与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国安全承诺依赖，从而削弱美国在盟友体系中的议程设置能力与战略政策号召力。^[3]更重要的是，一旦美国将规则视为工具而非约束，其对外倡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就会出现内在悖论：美国要求他国遵守国际规范，自己却在关键议题上进行例外化处理，最终导致其国际动员能力和国际信誉的下降。

从安全层面延伸至更宏观战略层面，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把美国推向“以胁迫获取利益”的路径依赖模式，背离了作为全球领导国的根本行为逻辑。领导国地位的本质是让他国愿意跟随，而非不得不服从。当美国日益依赖关税、制裁、军事威慑与领土施压等强制手段时，其外交政策的边陲成

[1]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s Remarks to the Press,” February 28, 2025,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press-events/2025-02-28/secretary-generals-remarks-the-press-please-scroll-down-for-arabic>.

[2] CSIS, “Trump’s Greenland Ambition Is About US Power, Not Alliances,” January 2026,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rumps-greenland-ambition-about-us-power-not-alliances>.

[3] Alberto Alemanno, “Greenland and US Annexation Threats: Mapping the Legal Questions,” Verfassungs Blog, January 13, 2026, <https://verfassungsblog.de/greenland-and-us-annexation-threats/>.

本必然上升；同时，他国的合作将更趋交易化与短期化，使得美国在危机管理、规则谈判与制度建设中的协调能力下降。更现实的风险在于，这种强权化姿态削弱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价值吸引力。由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将呈现一种悖论式下滑，即硬实力虽未下降、但合法性却被持续透支。

四、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面临的内外制约

尽管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外交政策的修正主义色彩显著加深并带来一系列冲击，但并不意味其可以不受约束地实现极端战略诉求。相反，特朗普政府越是以胁迫、交易和强制为主要手段推进外交政策目标，其面临的外部反弹与内部阻力就越可能对其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总的来看，这种制约主要体现为国际体系规范的软制约、全球权力再平衡的结构制约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制度制约。

（一）国际体系规范的软制约：主权原则与合法性成本

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在国际体系层面面临规范制约，根源在于触碰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原则，即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及禁止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改变边界。《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明确规定，会员国不得以威胁或使用武力的方式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1]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尽管国际规范无法对其修正主义外交构成硬约束，但会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行为的定性，进而对其构成道义压力。

更重要的是，规范制约不仅表现为道义压力，还会通过合法性成本的提高增加美国推进修正主义外交的难度。以特朗普觊觎格陵兰岛为例，欧洲多国对主权与国际法原则的公开表态，意味着美国盟友开始将规范边界置于联盟关系之上，从而形成对特朗普政府的软制约。法国外交部发布的七国联合声明指出，格陵兰的未来“仅能由丹麦与格陵兰决定”，并以“格陵兰属于

[1] United Nations,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Full Text),” Article 2(4), <https://www.un.org/en/about-us/un-charter/full-text>.

其人民”的表述强化自决与主权逻辑。^[1]这一联合声明也通过法国总统府等官方渠道同步发布,进一步显示其政治分量。^[2]不仅如此,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于2026年1月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完全支持丹麦和格陵兰。欧洲议会党团领导人也公开呼吁欧盟机构向格陵兰与丹麦提供“具体可及的支持”。^[3]尽管这类表态无法直接逆转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但却使之在国际社会处于道义和法律的双重下风,从而构成对美国霸权的软性约束。

(二) 全球权力再平衡的结构制约:政策对冲与战略自主

如果说国际规范抬升了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政治成本,全球权力再平衡趋势则限制了其行动空间。当美国试图以势力范围与强制胁迫重塑权力分配格局时,难免触发其他国际行为体的政策对冲,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加速崛起和美国盟友战略自主加速推进背景下,美国难以凭一己之力实现修正主义政策目标。在实践中,美国同伊朗的军事冲突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尽管华盛顿可以凭借军事优势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但由此引发的反击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造成的全球能源安全危机,对美国在中东的冒进政策构成强有力的制约甚至惩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战争爆发三周后评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行为切断了全球约20%的石油和海运液化天然气供应,无疑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显著负面冲击,其中总体通胀水平预计将被抬升40个基点。^[4]

[1]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Greenland Belongs to Its People’ – Seven European Countries Issue Joint Statement,” January 6, 2026, <https://uk.diplomatie.gouv.fr/en/greenland-belongs-its-people-seven-european-countries-issue-joint-statement>.

[2] Élysée, “Joint Statement on Greenland,” January 6, 2026, <https://www.elysee.fr/en/emmanuel-macron/2026/01/06/joint-statement-on-greenland>.

[3] European Parliament, “EP Group Leaders Express Unequivocal Support to Greenland and Denmark,” January 14, 2026,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260113IPR32390/ep-group-leaders-unequivocally-support-greenland-and-denmark>.

[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ress Briefing Transcript: Julie Kozack, Director of the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IMF,” March 19, 2026,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6/03/20/tr-03192026-imf-regular-press-briefing-march-19-2026>.

从更长期视角看，欧洲战略自主的政策辩论在当前背景下进一步升温，也将形成对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战略牵制。英国《金融时报》明确提出，欧洲应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推进“更强的自主性”，其论述虽属观点性文本，但反映了欧洲政策圈对美国不确定性的认知转向：从“通过让步维持关系”逐步转向“通过自主减少脆弱性”。^[1]这种倾向若与欧盟产业政策、安全政策相结合，将在更广泛层面削弱美国对盟友体系的议程设置能力。在此背景下，当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与盟友安全利益发生冲突时，北约内部的协商机制会成为欧洲盟友拖住美国的工具。美联社关于北约如何运作的解释性报道指出，北约机制并不会自动为美国在与丹麦相关的冲突中提供支持，反而可能在欧洲日益强调战略自主的逻辑下加剧联盟内部分歧并损害其凝聚力。^[2]

（三）美国国内政治的制度制约

除外部制约外，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也面临国内政治制约。尽管总统在外交政策领域的自由度和决策权远大于在国内政策领域，并且共和党同时掌控白宫和国会的政治结构会进一步放大特朗普高度个人化和集权化的决策模式，但美国政治以权力分立与制衡为原则的制度设计仍能围绕一些较具争议的外交政策议题对总统施加影响，弱化其极端色彩。概言之，来自美国国内政治的制度制约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国会虽然无法阻止总统发动有限军事行动，却能通过立法动议产生政治影响并通过宣战权约束其后续规模；其二，最高法院的司法裁决有能力削弱总统特定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基础，从而迫使其退而求其次、改变政策推行路径。

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针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美国国会民主党甚至少数共和党议员都迅速做出反应，尤其是援引《战争权力法》进行立法动议，以约束总统行为。2026年1月，由几位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联合推动战争权决议，目的是阻止美军在未经国会授权情况下继续在委内瑞拉境

[1] Financial Times, “Europe Should Embrace the Idea of Going It Alone,” January 12, 2026, <https://www.ft.com/content/1da08f67-c192-4fd6-b786-e88e1358e237>.

[2] Associated Press, “How NATO Works at a Time When Trump Is Threatening to Seize Greenland,” January 13, 2026, <https://apnews.com/article/4907c132b499531d8d5fe6cd549c0beb>.

内进行敌对行动。尽管在参议院后续投票中该决议没有通过，但表明了特朗普政府的极端外交政策并不具备完全稳定的国内政治制度基础。^[1]2026 年 3 月，几乎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对伊朗军事行动问题上。在国会民主党人援引《战争权力法》制约特朗普政府极端政策的投票过程中，参众两院分别呈现出 47 票赞成、53 票反对和 212 票赞成、219 票反对的高度接近的结果。^[2]上述事实表明，特朗普政府并未掌握足以保障其战争政策持续进行甚至扩大的国内政治优势。这也是其在军事行动中反复宣称取得胜利、施压对方谈判并追求尽早脱身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和裁决虽然无法直接逆转总统既有政策，但会在法律层面削弱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合法性基础，进而迫使其调整政策路径。例如在关税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发动全球关税战的极端政策遭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否定性裁决。尽管白宫随即依据《1974 年贸易法》第 122 条延续其关税政策，并通过新的 301 调查条款继续推行经济民族主义贸易政策，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由此开始不得不面临两项制度制约：一是其临时进口附加税最长只能维持 150 天、除非国会另行延长；二是关税税率上限为 15%。这表明国内政治制度制约并非无效，它至少压缩了总统可用工具的法律空间，也提高了其将临时性强制措施长期化、常态化的制度成本。^[3]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上述裁决是在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背景下出现的，这就表明即便特朗普第二任期拥有了更多的政治空间和更大的权力基础，国内政治制度仍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发挥制约作用。

[1] US Senate, “Roll Call Vote No. 00009,” January 14, 2026, https://www.senate.gov/legislative/LIS/roll_call_votes/vote1192/vote_119_2_00009.htm.

[2] US Senate, “Roll Call Vote 46, S.J.Res.104,” March 4, 2026, https://www.senate.gov/legislative/LIS/roll_call_votes/vote1192/vote_119_2_00046.htm; Clerk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oll Call 85, H.Con.Res.38,” March 5, 2026, <https://clerk.house.gov/Votes/202685>.

[3] Supreme Court of the US, “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 February 20, 2026,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25pdf/24-1287_4gcj.pdf; 19 US Code § 2132, “Temporary Import Surcharges,”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fice of the Law Revision Counsel, <https://uscode.house.gov/view.xhtml?edition=prelim&num=0&req=granuleid%3AUSC-prelim-title19-section2132>.

五、结语

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挑战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在两届任期内经历了逐步深化和拓展的过程，在实践中体现出“从秩序到权力”的演进轨迹。这一政策演进逻辑既植根于美国国内保守民粹主义的兴起和执政环境的变化，也与美国对自身相对优势下降的焦虑不断加剧密切相关。在由秩序型修正主义与权力型修正主义共同构成的激进型修正主义外交政策转型过程中，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已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性造成了更大冲击，也在更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展望未来，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走向存在进一步激进化的可能，也将受到来自国际体系规范、全球权力结构和国内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因此，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将在高烈度冲击与高成本回撤之间反复摆动，包括短期内以强硬姿态制造震荡、争取谈判筹码，中长期则在外部反制与内部掣肘下转向更为碎片化、交易化与机会主义式的推进方式。对国际社会而言，未来一段时期的国际秩序将更难回到稳定的制度预期之中，而应对特朗普第二任期修正主义外交的关键，则在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成员国形成更强的规范性反制与结构性对冲，从而将美国对秩序与权力的修正冲动锁定在有限范围之内。

【责任编辑：王玉莹】

美俄关系新调整：观念基础、 内外驱动与实践限度^{*}

□ 赵 隆

〔提 要〕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美俄关系出现调整迹象。两国在价值观、秩序观、利益观方面的对抗性减弱，成为此轮关系调整的观念基础。同时，特朗普塑造政治强人形象的执念，两国保守主义思潮和价值观的同步回归，美国民意变化与战略资源再配置的现实需要，以及美俄战略界对“大三角”框架的有限认同，叠加驱动双边关系调整演进。然而，安全战略的根本分歧，对抗思维的固化，多元利益纽带的缺失，以及内政外交双重掣肘带来的执行困境使两国关系难以取得根本性突破。美俄关系调整的本质仍是围绕特定议题的有限交易，尚难实现战略层面的全面和解，其对跨大西洋关系、欧洲安全架构和大国博弈格局的外溢影响，以及自身的脆弱性和波动性特征将逐步显现。

〔关 键 词〕美俄关系、大国竞争、欧洲安全、国际秩序

〔作者简介〕赵 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7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6) 3 期 0114-23

^{*}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项目批准号：23VMG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编辑部和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王振羽对此文亦有贡献。

2025年12月，美国白宫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下称“《国安战略报告》”），不再将俄罗斯列为直接威胁，把通过谈判迅速结束乌克兰危机称为“美国核心利益”，称美国需要“重建与俄罗斯的战略稳定”，“终结北约作为永久扩张联盟的认知”，还指责欧盟阻挠美国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努力。^[1]2026年1月，美国国防部（战争部）发布《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下称“《国防战略报告》”），将俄罗斯界定为“北约东部存在持续但可控的威胁”，称俄“没有能力争夺欧洲霸权”，显著淡化所谓的“俄罗斯威胁”。^[2]两份战略报告对俄罗斯定位的重大调整，以及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两国元首频繁的通话与互动，引发有关美俄关系进入缓和重构阶段的讨论。

目前，学界对于美俄关系的分析包括现实主义、保守主义、历史主义和工具主义四类视角。现实主义认为，特朗普政府不反对多极世界，^[3]而是在共和党现实主义外交理念的基础上，回归旧保守派的节制自利、拒绝干涉原则，^[4]因此寻求与俄罗斯“竞争共存”，以维持战略稳定和力量平衡。^[5]保守主义认为，“特朗普主义”和“普京主义”之间共享的保守主义价值观是这一演进态势的主要推手，双方共同将进步主义视为敌人。^[6]历史主义认为，特朗普对俄政策调整是对历史上欧洲“协调传统”的借鉴，^[7]其围绕乌克兰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2] US Department of War, “2026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anuary 23, 2026, <https://media.defense.gov/2026/Jan/23/2003864773/-1/-1/0/2026-NATIONAL-DEFENSE-STRATEGY.PDF>.

[3]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Многополярный Трамп,”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09 сентября 2025 года,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mnogopolyarnyj-tramp-lukyanov/>.

[4] 史泽华：《“特朗普主义”再兴起的政治逻辑及外交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25年第2期，第67-88页。

[5] Thomas Graham, “How America Can Tame the Russian Bear,” Engelsberg Ideas, October 16, 2025, <https://engelsbergideas.com/essays/how-america-can-tame-the-russian-bear>.

[6] 牛霞飞：《当前美俄关系解冻的价值观因素——基于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斗争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6年第1期，第90页。

[7] A. Wess Mitchell, “The Return of Great-Power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104, No.3, 2025, pp.24-39.

危机推动的美俄对话，与老布什时期促进两德统一的美苏“穿梭外交”存在可比性，^[1]甚至将此视为20世纪初美英防止德俄接近的政策传统回归。^[2]工具主义认为，特朗普的外交风格在于“连续不断的交易”，其期待通过交易促成俄乌达成停火协议，但未对长期解决乌克兰危机和构建新欧洲安全体系作出详细设想。^[3]该视角认为美俄关系缓和是特朗普“交易外交”的表征，目的是在能源、关键矿产等领域与俄罗斯进行利益交换，^[4]以经济合作代替美俄的敌对立场。俄罗斯则抓住特朗普对短期利益的偏好，试图促成对俄有利的协议。^[5]但也有悲观看法认为，俄美全面对抗将延续到2030年代上半期。^[6]

上述观点大多认同美国领导人的观念和利益衡量标准变化，是此轮美俄关系调整的主要驱动力，但差异在于部分观点强调这种调整背后存在推动美俄和解的战略考量，另一部分则认为其仍属于战术层面的调整和谋划。需要看到，美俄关系调整所带来的影响不仅关乎欧洲安全秩序，也可能对国际力量对比和秩序演进产生影响。相关调整是否会改变支撑跨大西洋关系尤其是北约凝聚力的基础，是否会导致世界重回大国构筑的“势力范围”，美俄对于国际秩序演进的愿景能否相互契合，均是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因此，需要从观念基础与内外驱动相结合的视角，深入分析此轮美俄关系调整的运行逻辑及其实践限度。

[1] Jack. F. Matlock Jr., “Trump and the Viable Road to Peace in Ukraine,” March 3, 2025, Responsible Statecraft,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trump-ukraine-zelensky>.

[2] 张文宗、任怡静：《从“联欧遏俄”到“美国优先”——美国调整对乌克兰危机政策的影响初探》，《和平与发展》2025年第2期，第71-89页。

[3]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ув,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горки,” Известия, 30 июня 2025, года, <https://iz.ru/1912734/andrei-kortunov/rossiisko-amerikanskie-gorki>.

[4] 刘祖龙、张建：《特朗普第二任期对俄“交易式外交”政策论析》，《东北亚学刊》2025年第4期，第58页。

[5] Alexander Gabuev, Alexandra Prokopenko and Tatiana Stanovaya, “Putin’s Theories of Victory,” Foreign Affairs, March 26,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ussia/putins-theories-victory>.

[6] 柳丰华：《新形势下的俄美关系走向》，《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3期，第38页。

一、美国对俄政策的演变

苏联解体后，美俄关系虽然失去阵营对抗的逻辑支撑，但在内外因素影响下反复和波动，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叶利钦—老布什时期”，以俄罗斯回归欧洲和融入西方体系的尝试为主线；二是“普京—小布什时期”，以共同反恐驱动并被北约东扩打断；三是“梅德韦杰夫—奥巴马时期”，以双边关系的象征性“重启”（reset）为特点；四是“普京—奥巴马时期”，表现为互为对手的战略博弈。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成为美俄关系发展的分水岭，美俄围绕黑海、波罗的海、中东地区的角力显著增强，而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升级使两国关系彻底陷入全面对抗和“制裁—反制”的恐怖螺旋。总体看，美国对俄政策主导着双边关系的走向，但俄的应对亦对双边关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政制约下的政策两难

改善美俄关系曾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重要议程之一。选举期间，特朗普频频发出“亲俄信号”，称“有意让俄罗斯变得友好”，“愿意与俄罗斯一起消灭‘伊斯兰国’”。^[1]当选后，特朗普第一时间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称期待与俄建立牢固而持久的关系，^[2]商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3]。面对特朗普对俄态度的转变，俄政府于2016年11月出台《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提出愿与美国建立互利关系，在平等基础上开展稳定且可预期的对话。^[4]然而，美国国会在共和党建制派控制下，极大限制了特朗普的对俄友好姿态从话语

[1] “Donald Trump: ‘I Don’t Know Who Putin Is,’” Politico, July 27, 2016,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donald-trump-i-dont-know-who-vladimir-putin-is>.

[2] “Trump and Putin ‘Will Try to Mend Ties,’ Kremlin Says,” BBC News, November 14, 2016,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37981770>.

[3] Lucian Kim, “Trump Speaks with Putin in Saturday Phone Call,” NPR, January 19, 2017, <https://www.npr.org/sections/parallels/2017/01/29/512268735/trump-speaks-with-putin-in-50-minute-phone-call>.

[4]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0.11.2016 г. № 640,”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1 декабря 2016 года, <http://kremlin.ru/acts/news/53384>.

转为行动，民主党还大力炒作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2017年1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表关于俄干涉美大选的报告，国会情报委员会随后联合联邦调查局对特朗普发起“通俄门”调查。面对党内建制派和调查的双重压力，特朗普的对俄政策被迫重回威慑的轨道。2017年4月，特朗普命令美军对位于叙利亚的俄军基地进行空袭，还签署《通过制裁应对美国对手法案》追加对俄制裁。俄罗斯随后称“改善与美国新政府关系的希望已经破灭”^[1]，并发起“外交战”驱逐美驻俄外交人员。

总体来看，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对俄政策存在两面性，包括其个人对俄友好认知驱动的叙事调整，以及“反俄共识”和党争驱动下的强硬行动，二者处于明显割裂状态。例如，特朗普表示希望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2]，在2018年7月的美俄元首峰会后表示“美俄最终会拥有非同寻常的关系”^[3]。但同年11月刻赤海峡事件发生后，特朗普、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莉（Nikki Haley）又先后谴责俄罗斯，并取消原定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上与普京的元首会晤。^[4]“正如部分俄战略界人士提出，不能低估‘特朗普陷阱’对俄罗斯的影响。”^[5]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无论是美俄赫尔辛基峰会、汉堡G20会晤还是大阪G20会晤等，都未能带来双方期待的实质性成果。俄罗斯关注的取消制裁、结束“外交战”、建立“反恐联盟”等问题也没有进展，两国未能跳出相互遏制的循环。2019年，

[1] Roberta Rampton and Patricia Zengerle, “Trump Signs Russia Sanctions Bill, Moscow Calls It ‘Trade War,’” Reuters, August 3,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world/trump-signs-russia-sanctions-bill-moscow-calls-it-trade-war-idUSKBN1A11VD>.

[2] Jennifer Hansler, “Trump Again Calls for Readmitting Russia to G7, Blames Obama for Crimea’s Annexation,” CNN, June 9, 2018, <https://www.cnn.com/2018/06/09/politics/trump-russia-g8-press-conference>.

[3] “Trump Questions US Intel, Not Putin, on Russia 2016 Meddling,” AP News, July 17, 2018, <https://apnews.com/article/north-america-donald-trump-ap-top-news-elections-moscow-c27b905bb58648a6b64d04d44dddec423>.

[4] Ashish Sen, “Trump Cancels Meeting with Putin,” Atlantic Council, November 29, 2018,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trump-cancels-meeting-with-putin>.

[5] “Ловушки Трампа: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о том, чего ждать России от «новой» Америки,” Газета.RU, 17 ноября 2016 года, <https://www.gazeta.press/comments/column/lukyanov/10338557.shtml>.

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制裁参与建设“北溪-2”天然气管道的俄公司，标志着此轮美俄关系调整的终结。

（二）拜登任期：意识形态主导的全面慑压

2021年拜登上台后，通过强化“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大力修复跨大西洋关系以及被称为“脑死亡”的北约。2021年1月，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中毒事件，导致美欧多国大规模驱逐俄外交官。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指责俄试图帮助特朗普连任、抹黑拜登，并在美国社会“制造分裂”^[1]后，俄驻美大使也被召回莫斯科进行磋商^[2]。在外交和舆论斗争之外，北约先后组织“欧洲捍卫者-2021”“海上微风-2021”等大规模演习，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也组织“西部-2021”联合演习作为回应。此后，美俄领导人曾在日内瓦举行会面，俄罗斯还向美国和北约方面提交《俄美关于安全保障的条约》和《关于俄罗斯和北约成员国安全保障措施的协议》两份文件草案，希望与美国在此基础上就维护和平与稳定进行认真谈判，并要求北约承诺不进行进一步扩张，不接受乌克兰和其他国家加入该组织。2022年1月10日至13日，俄罗斯还分别与美国、北约就安全保障建议开展对话，但未取得实质性成果，美国和北约此后递交的书面答复也未得到俄方认可。随着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危机的升级，这种避免双边关系失控的尝试彻底失败。

此后，确保俄罗斯在乌克兰遭受“战略失败”成为美国对俄政策重点。^[3]拜登将乌克兰危机作为提升跨大西洋关系凝聚力的契机，纠集盟友对俄发起全方位制裁，涵盖金融、贸易、科技等各个领域，冻结俄罗斯央行在欧洲清算银行（Euroclear）的2100亿欧元资产，大量西方企业撤出俄市场，相关

[1] “Foreign Threats to the 2020 US Federal Election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rch 10, 2021, <https://www.dni.gov/files/ODNI/documents/assessments/ICA-declass-16MAR21.pdf>.

[2] “Посла России в США пригласили на консультации в Москву,” РИА Новости, 17 марта 2021, годв, <https://ria.ru/20210317/ssh-1601715006.html>.

[3] “Full Transcript of President Biden’s Speech in Warsaw on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ABC News, March 26, 2022,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full-transcript-president-bidens-speech-warsaw-russias-invasion/story?id=83690301>.

制裁延续至特朗普第二任期。截至2025年8月15日，西方国家对俄实施23960项制裁，其中6441项来自美国。^[1]在此背景下，2024年美俄双边贸易额仅为35亿美元，相比2021年减少90%。^[2]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国会共通过并由总统签署5项对乌克兰安全补充拨款法案（Ukraine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s Acts），对乌承诺援助总额超过1750亿美元。^[3]自拜登政府上台至2025年1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达到659亿美元^[4]，美国还促使23个北约国家将防务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份额提升至2%以上^[5]。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美国对俄政策呈现全面慑压的特点，官方的各层级沟通完全停摆，双方进入互信“归零”状态。

（三）特朗普第二任期：议题驱动下的战略转向

2024年，随着特朗普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阻碍美俄关系调整的压力有所减弱。自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两国领导人进行至少12次电话沟通，并实现首次面对面会谈。2025年2月的首次通话中，双方同意进行密切合作并达成互访共识。^[6]此后不久，美俄在沙特利雅得举行双边会晤，^[7]标志着美俄官方层面的定期沟通得以恢复。2025年3月，美俄元首再次通话，表达双

[1] “Consolidated Russia Sanctions Data Dashboard,” Castellum.AI, August 15, 2025, <https://www.castellum.ai/russia-sanctions-dashboard>.

[2] “Russia Trade Summary,”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https://ustr.gov/countries-regions/europe-middle-east/russia-and-eurasia/russia>.

[3] Mark F. Cancian and Chris H. Park, “What Is in the Ukraine Aid Package, and What Does It Mean for the Future of the War?” CSIS, May 1,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hat-ukraine-aid-package-and-what-does-it-mean-future-war>.

[4] “U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Ukraine: Fact Shee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9, 2025, <https://2021-2025.state.gov/bureau-of-political-military-affairs/releases/2025/01/u-s-security-cooperation-with-ukraine?safe=1>.

[5] “Biden Underscores NATO’s Enduring Strength as Alliance Marks 75 Years,” US Department of War, July 10, 2024, <https://www.war.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833850/biden-underscores-natos-enduring-strength-as-alliance-marks-75-years>.

[6] Michael Birnbaum, Matt Viser, and Robyn Dixon, “Trump Has Call with Putin, Kick-Starting Bid to End Russia’s War in Ukraine,”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2, 202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5/02/12/trump-putin-talks-ukraine-war>.

[7] “Russia and US Agree to Work toward Ending Ukraine War in a Remarkable Diplomatic Shift,” AP News, February 19,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russia-ukraine-war-riyadh-talks-trump-putin-rubio-0c3beebfef5839e9d509ff58239a6bc5>.

边关系正常化的共同意愿，^[1]商谈在乌克兰实现停火等问题。5—7月，美俄元首先后4次通话，不仅探讨乌克兰局势与停火，还拓展至伊朗的“12日战争”等议题。8月15日，特朗普与普京在阿拉斯加举行会晤，成为2021年以来美俄元首的首次面对面会谈。^[2]10月，美俄元首通话除探讨停火与和平之外，还重申美俄双边经济合作存在巨大发展前景，商谈筹备元首峰会的相关事项。^[3]12月28—29日，特朗普和普京连续两日通话，介绍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会晤情况。与此同时，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和俄罗斯总统特使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Kirill Dmitriev）频繁穿梭开展特使外交，两国安全、外交和经贸团队举行多轮会谈。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俄拒绝无条件立即停火并围绕领土问题强化自身立场，特朗普也多次采用其惯用的策略对俄极限施压，表示如果俄不接受停火就追加制裁。^[4]2025年9月，特朗普要求北约国家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准备对俄追加“重大制裁”。^[5]特朗普虽然未签署追加对乌援助的行政令，但继续向乌克兰交付拜登时期批准的援助计划，还为乌克兰对俄远程无人机袭击提供情报支持^[6]。特朗普在向乌提供“战斧”巡航导弹问题上态度尤其值

[1] “Department Press Briefing – March 19, 202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19, 2025, <https://www.state.gov/briefings/departments-press-briefing-march-19-2025>.

[2] “Pool Reports of August 15, 2025,”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August 15, 2025,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pool-reports-august-15-2025>.

[3]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помощник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Юрия Ушакова по итогам телефонного разговора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США Дональдом Трампом,”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16 октября 2025 года,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8237>.

[4] Andrew E. Kramer, “Trump Says US Will Impose More Sanctions on Russia If It Does Not Agree to an Extended Truc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9,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5/09/world/europe/ukraine-russia-zelensky-trump-peace-talks.html>.

[5] “Trump Says Ready for ‘Major’ Moscow Sanctions If NATO Stops Buying Russian Oil,” Politico, September 13, 2025,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trump-urges-nato-members-to-stop-buying-russian-oil>.

[6] Christopher Miller, Max Seddon, and Amy Mackinnon, “US Intel Guided Ukraine’s Strikes on Russian Energy Sites,”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2, 2025, <https://www.ft.com/content/f9f42c10-3a30-4ee1-aff7-3368dd831c8c>.

得玩味，副总统万斯表示美政府正在作出对乌援助“战斧”的决策^[1]，但在美俄元首第四次通话后，特朗普又否认援助远程导弹的选项^[2]。可以看出，特朗普将制裁和援助作为控制俄乌会谈的工具，试图在不增加投入的同时操控和谈进程，使之服务于自身外交战略。

二、美俄关系调整的观念基础

对特朗普而言，在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共和党全面控制参众两院的背景下，缓和美俄关系可以打破拜登时期以强化意识形态对抗为主轴，以美国主动承担欧洲安全成本为特征的跨大西洋关系，通过大国间的“交易型外交”重建地缘势力范围，从而实现在低成本基础上护持霸权的战略目标。对俄罗斯而言，适度迎合特朗普缓和美俄关系的心态，有助于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进程中占据有利地位，按照重建势力范围的逻辑重构欧洲（欧亚）安全架构，巩固自身作为多极世界中重要一极的地位。美俄在价值观、秩序观、利益观方面的对抗性减弱，成为此轮调整的重要基础。

第一，从“民主对抗威权”到利益置换的价值观变化。自上台以来，特朗普推崇的“美国优先”政策导向演化为对自由制度主义、“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和价值观外交的抛弃。虽然《国安战略报告》表面上看具有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倾向，但特朗普先后抛出“控制巴拿马”“购买格陵兰”“吞并加拿大”等扩张性言论，表明这种“掠夺性霸权”（predatory hegemony）的核心是利用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领先地位，从盟友和对手身上榨取最大利益。^[3]2025 年 3 月，特朗普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抨击拜登政府在援

[1] Steve Holland, “Vance Says US Considering Tomahawk Missiles for Ukraine,” Reuters, October 12,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vance-says-us-considering-tomahawk-missiles-ukraine-2025-09-28>.

[2] Laura Sharman, “Trump Denies Ukraine Tomahawk Missiles, Urges Both Sides to ‘Stop the War Immediately,’” CNN, October 18, 2025, <https://www.cnn.com/2025/10/18/europe/trump-tomahawk-missiles-ukraine-white-house-intl-hnk>.

[3] Stephen M. Walt, “The Predatory Hegemon: How Trump Wields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3, 202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predatory-hegemon-walt>.

乌议程上花费数千亿美元，指责民主党议员“想让战争继续”，还批评拜登政府未能让欧洲的援乌支出与美国相当。^[1]此外，特朗普要求北约欧洲成员国购买美国武器用于援乌，将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特朗普在对乌安全保障上态度模糊，但却急于同乌克兰达成矿产协议，以确保美国“得到远远超过”援乌数额的财富^[2]。在商业交易逻辑下，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认为通过强势介入谈判快速终结危机，美俄关系的缓和能够为其提供可观的经济利益，服务于重振美国制造业、促进能源资本扩张的国内议程。

俄罗斯积极呼应特朗普的这种价值观变化，提出恢复美俄经贸往来，推动美国部分取消或放松对俄制裁，利用共同开发北极、矿产等议题吸引资金，争取俄能源、农业领域金融机构重新接入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等。俄罗斯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罗斯愿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3]；普京提及特朗普上台后俄美贸易额上升的回暖趋势，称俄美工商和投资合作拥有巨大潜力，两国在北极、远东、能源等方面合作也具有“现实意义”^[4]；特朗普则认为俄罗斯也想从美国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5]。2025年10月，德米特里耶夫在社交媒体上称，俄美应建设横跨白令海峡的“普京—特朗普隧道”，通过联合开发自然资源“展示和平”，还建议由马斯克控股的企业承办这一工程以降低成本。^[6]

[1] Rachel Wolf, “6 Times Trump Bashed Biden in Address to Congress,” Fox News, March 5, 2025,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6-times-trump-bashed-biden-address-congress>.

[2] Mark Burton and Kate Sullivan, “What the US and Ukraine Get With Trump’s Minerals Deal,” Bloomberg, May 1, 202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5-05-01/us-ukraine-minerals-deal-what-s-it-for-and-how-will-it-work>.

[3] “Putin’s Envoy Dmitriev Says Russia Ope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US,” Reuters, February 25,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putins-envoy-dmitriev-says-russia-open-economic-cooperation-with-us-2025-02-24>.

[4]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16 августа 2025 года,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7791>.

[5] “Pool Reports of August 15, 2025.”

[6] Andrew Osborn, “Kremlin Envoy Proposes ‘Putin-Trump Tunnel’ to Link Russia and US,” Reuters, October 18,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kremlin-envoy-proposes-putin-trump-tunnel-link-russia-us-2025-10-17>.

第二，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到重建“势力范围”的秩序观变化。相较于拜登时期，特朗普崇尚势力范围和大国间的利益置换，没有兴趣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维护西半球霸权的基础上强调“以实力促和平”的硬实力建构。同时，特朗普用更具对抗性和颠覆性的“政策宣告”来替代“历史十字路口”这类相对文雅的修辞，宣告了旧时代的终结和新竞争时代的开始。^[1] 美俄都对“多极化”的概念展现积极的兴趣或认可。2025年1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接受专访时提出：“世界由单极大国主导并不正常……那是一种异常，是冷战结束后的产物。最终世界必然会回到多极格局，在地球不同区域出现多个大国。我们现在就面临这样的局面。”^[2] 《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鲁比奥进一步将多极化总结为“以具体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方法，而非含糊的套话或空想意识形态”^[3]。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眼中的多极化本质上是霸权主导的“竞争多极”，核心目标是通过“总体收缩、局部扩张”的方式更好地调配战略资源，最终打造低成本、高收益的“有限霸权”，而不是认可“去霸权化”的多极世界。相对于此，俄罗斯更多使用“多中心世界秩序”的概念来回应多极化，强调从“中心—外围”的等级结构到“多中心多元化”的平等结构转变，^[4] 并将团结“世界多数”和促进建立更加公平的多极世界秩序作为优先方向，^[5] 探索基于不同力量中心的“并存多极”。这种秩序观念变化导致有关美国—西半球、俄罗斯—欧洲、中国—亚太“三分天下”的世界新格局讨论浮出水面。有观点认为，特朗普推动下的乌克兰

[1] 杨洁勉：《中俄美国国际战略互动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俄罗斯研究》2026年第2期，第13页。

[2] “Secretary Marco Rubio with Megyn Kelly of The Megyn Kelly Show,”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30, 2025,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marco-rubio-with-megyn-kelly-of-the-megyn-kelly-show>.

[3] Marco Rubio, “An Americas First Foreign Polic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30, 2025, <https://www.wsj.com/opinion/an-americas-first-foreign-policy-secretary-of-state-rubio-writes-western-hemisphere-too-long-neglected-a81707b0>.

[4] 阮建平、何诗雨：《俄罗斯多极世界秩序构想的探索及其实践初探》，《东北亚论坛》2025年第2期，第120页。

[5] “Встреча с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МИД России,”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14 июня 2024 года,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4285>.

和平协议，意味着 19 世纪风格的强权政治回归，美、俄等主要大国将周边国家划入自身的势力范围之中。^[1] 世界朝多个区域性文明并存的方向转型，特朗普可能以门罗主义方式整合西半球，在美俄中三方框架内解决战略稳定等问题，最终形成若干全球大国和围绕这些国家的“特殊联盟”并存的态势。^[2] 特朗普外交战略的核心是恢复 19 世纪的秩序观，保证美国在西半球的绝对主导地位，大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并且互不干涉。^[3] 可以看到，虽然美国以维护霸权为目标的“竞争多极”，与俄罗斯基于多力量中心的“并存多极”存在差异，但围绕多极化秩序愿景的对抗性相较此前大幅降低。受“重建势力范围”的观念影响，美俄关于欧洲安全架构的未来、重建战略稳定等问题的共识也逐渐积累。

第三，从“零和博弈”到“增量效应”的利益观变化。除了价值观和秩序观变化，美俄均重视围绕特定议题的潜在合作可能，试图发掘长远利益可能带来的增量效应为双边关系“破冰”。其一是尝试重建外交纽带。2025 年 2 月，美俄外交代表团在伊斯坦布尔开展关于恢复使领馆正常工作的谈判，并在 4 月举行第二轮会谈，^[4] 谈判内容主要包括保证使领馆运作的资金和人员流动不受阻碍等。虽然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双方过去数年不断加码的“外交战”实现暂停。

其二是尝试发掘经济纽带。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对俄制裁和西方公司从俄撤出，给美俄双方都造成巨大损失。根据基辅经济学院的统计，西方企业撤

[1] Monica Duffy Toft, “The Return of Spheres of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 March 13,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return-spheres-influence>.

[2] 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енко, “2025: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мира,” 14 мая 2025 года,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2025-transformatsiya-mira>.

[3] Stefan Wolff, “Trump’s Vision of a New US-China-Russia World Order,” *Asia Times*, February 25, 2025, <https://asiatimes.com/2025/02/trumps-vision-of-a-new-us-china-russia-world-order>.

[4] “US, Russia Discuss Embassy Staffing in Istanbul Talks,” *Kyiv Post*, April 10, 2025, <https://www.kyivpost.com/post/50570>.

出给俄罗斯造成接近 1300 亿美元的营收损失。^[1] 俄官方则认为，退出俄罗斯市场给美国企业带来 3240 亿美元的损失。^[2] 某种程度上讲，俄罗斯的经济结构曾依赖西方金融市场与美元体系，这种依赖为美国资本在管控下重回俄罗斯提供可能空间。从美国的角度看，支持特朗普的能源、金融利益集团在对俄制裁中受损最大，也希望通过重回俄市场和参与资源开发等方式获利。例如，埃克森美孚等大型能源公司自美俄利雅得会谈后就与俄企业进行秘密谈判，讨论共同开发俄境内油气资源，该决定甚至得到白宫的默许^[3]。近期，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因中东战事而事实中断，特朗普政府还放松对俄能源相关制裁以缓解全球能源市场波动，并通过特使渠道与俄方讨论能源与和平议题的联动安排，^[4] 显示出经济与安全议题之间的交易联动趋势。

其三是尝试构建信任纽带。2026 年 2 月，作为美俄两个核力量大国之间最后军控安排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美俄核军控监督和透明机制崩塌，加速脱离基于相互约束与保证的军控条约体系，全球战略稳定博弈态势、制度体系和军控进程呈现倒退迹象，“核共享”与“延伸威慑”的政策讨论凸显核安全风险，国际战略界围绕“第三核时代”的讨论不断升温。2025 年 10 月，特朗普宣称美国将重启核试验并已指示国防部“开始测试”，相关言论加剧大国战略互信裂痕。此外，美伊、俄乌、印巴等涉及核大国和事实拥核国的冲突外溢，进一步造成核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但不可否认，美俄在维护战略稳定、降低核风险、维持核军备优势地位等方面存在一定程

[1] Hnat Kulish, “77th Issue of the Regular Digest on Impact of Foreign Companies’ Exit on RF Economy,” Kyiv School of Economics, July 7, 2025, <https://kse.ua/about-the-school/news/77th-issue-of-the-regular-digest-on-impact-of-foreign-companies-exit-on-rf-economy>.

[2] Anton Troianovski, “Kremlin Message to Trump: There’s Money to Be Made in Russia,”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9,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2/19/world/europe/trump-russia-ukraine-putin-trump>.

[3] Joe Wallace, “Exclusive | Exxon Held Secret Talks With Rosneft About Going Back to Russi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6, 2025, <https://www.wsj.com/business/energy-oil/exxon-rosneft-russia-oil-talks-f524e81f>.

[4] “Russian Envoy Dmitriev in US Meeting Trump Administration Members,” Reuters, April 9, 202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russian-special-envoy-dmitriev-us-meeting-trump-administration-members-sources-2026-04-09/>.

度的共同关切。例如，特朗普曾提议举行所谓“三边军控对话”，推动讨论削减核武库等问题。在2025年3月俄美元首通话和8月阿拉斯加会晤期间，普京也多次提议与美国进行军控问题谈判，强调“就战略进攻性武器控制达成协议”以“保证欧洲与世界长期和平”。^[1]基于当前和长远共同利益的特定议题互动，成为美俄调整双边关系的重要抓手。

三、驱动美俄关系调整的多重因素

除了观念上的对抗降低之外，此轮美俄关系调整还具有复杂的内外驱动因素。特朗普对于打造政治强人形象的执念，与俄罗斯利用其对元首外交的偏好改善自身外部环境存在利益契合点。此外，美俄国内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和价值观同步回归，美国民意变化和战略转向的需求，以及两国战略界对“大三角”框架的路径依赖，也从不同层面对两国关系的调整产生推动作用。

第一，特朗普塑造政治强人形象的执念。特朗普大力宣传其“天选之子、拯救美国”^[2]的使命，尤其重视与外国领导人的私人关系，希望通过元首互动绕过国内政治掣肘。例如，特朗普多次称赞普京的“智慧”和“强势”，并在阿拉斯加元首峰会期间，邀请普京搭乘其总统专车进行私人会谈^[3]。此外，特朗普不断强化“和平缔造者和团结者”^[4]的定位。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声称“结束了七场无休止的战争”^[5]，派遣鲁比奥、威特科夫等人施压

[1] “Putin Suggests Russia and US Could Make a Deal on Nuclear Arms Control,” Reuters, August 14,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putin-suggests-russia-us-could-make-deal-nuclear-arms-control-2025-08-14>.

[2] “‘It Was God Alone’: Trump Gives Thanks to God for Protecting His Life from Assassin’s Bullets,” CBN, July 14, 2024, <https://cbn.com/news/us/it-was-god-alone-trump-gives-thanks-god-protecting-his-life-assassins-bullets>.

[3] “Putin Gets Warm Welcome from Trump at Alaska Summit, Including a Ride in ‘The Beast,’” NBC News, August 16, 2025,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trump-administration/putin-gets-warm-welcome-trump-ride-beast-alaska-summit-ukraine-rcna225310>.

[4] The White House, “The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remarks/2025/01/the-inaugural-address>.

[5] “At UN, Trump Renews His Case for Nobel Peace Prize,” Newsweek, September 23, 2025, <https://www.newsweek.com/at-un-trump-renews-his-case-for-nobel-peace-prize-10476586>.

游说挪威政府，争取获诺贝尔和平奖。^[1]2025年10月，特朗普在美俄元首通话时反复强调实现俄乌和平的必要性，并吹嘘“在中东取得伟大和平成就”。恢复美俄高层对话，将双边关系纳入正常轨道，成为特朗普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重要步骤。对此，俄罗斯公开称赞特朗普政府“将吸纳乌克兰加入北约视为错误”的表态，^[2]在形式上全力配合特朗普推动的多轮和平谈判。虽然2026年3月以来，受美以对伊朗军事打击等因素影响，特朗普主导下的美俄乌三方谈判一度暂停，俄罗斯还是对美国与伊朗达成的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表示欢迎，并希望美国能够有时间和空间恢复就乌克兰问题展开的三方和平谈判。^[3]俄罗斯还宣布在东正教复活节期间短暂停火，以增加特朗普对俄乌谈判的信心，增强俄美关系缓和的动力。2026年6月，普京再次与特朗普通话，双方围绕乌克兰危机、伊朗局势和俄美关系进行沟通，普京还借机向特朗普送上生日祝福，称其为“耀眼而杰出的政治家”，主动迎合其对政治强人形象的偏好。作为回应，特朗普表示愿意对乌克兰和欧盟施加影响，并计划借七国集团峰会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4]

第二，两国保守主义思潮和价值观回归。早在选举期间，特朗普就将右翼民粹主义与美式保守主义相结合，打造以文化保守、经济民粹、外交孤立为特征的政策框架，提出“常识革命”的口号抨击民主党等左派思潮代表及其控制的所谓“深层国家”，压制西方建制派宣扬的进步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和跨大西洋主义，以传统价值观抵抗外部价值观和文化的影响。2025年2

[1] “Donald Trump and the Aggressive Pursuit of a Nobel Peace Prize,” Bloomberg, October 3, 202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25-10-03/donald-trump-s-pursuit-of-nobel-peace-prize-rattles-norway>.

[2] “Интервью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В.Лаврова газете «Коммерсант»,” МИД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5 октября 2025 года,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2053699/.

[3] “Russia Says It Welcomes Iran Ceasefire, Hopes US Will Resume Ukraine Talks,” Reuters, April 8, 202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russia-says-it-welcomes-iran-ceasefire-hopes-us-will-now-resume-ukraine-talks-2026-04-08/>.

[4] “Путин позвонил Трампу: поздравление с юбилеем, обещание повлиять на Киев и сделка с Ираном,” Коммерсантъ, 14 июня 2026, <https://www.kommersant.ru/doc/8737719>.

月，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批评欧洲国家以自由主义、进步主义为准绳审查政治言论的行为是“干涉言论自由”，并支持“结束失控移民”的右翼政党进入欧洲国家政治生态。^[1] 特朗普反移民、贸易保护主义的执政纲领与欧洲激进右翼政党不谋而合。时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出席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时，称“特朗普旋风”（Trump tornado）是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回归”，强调欧洲必须摧毁所谓“欧美跨大西洋自由主义联盟”。^[2] 波兰右翼政治家卡罗尔·纳夫罗茨基（Karol Nawrocki）在选举中秉持亲特朗普的政治观点，坚守传统基督教价值观，最终成功当选波兰总统。^[3] 特朗普政府也对欧洲右翼改变态度，将其视为拥有共同基督教传统和主张维护国家主权的“文明盟友”，使用文明叙事替代价值观叙事重构跨大西洋纽带。^[4] 此外，万斯还在 2025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会见德国选择党主席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为这一极右翼政党的联邦选举背书。^[5]

保守主义价值观回归也是俄对外战略调整的特征之一。2021 年 10 月，普京曾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指出，俄罗斯追求“健康、温和、理性的保守主义”，将其视为最为合理的政治基础和行为准则。^[6] 《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将“捍卫传统精神、道德、价值观、文化和历史记忆”等国家

[1] “Remarks by the Vice President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February 14, 2025,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the-vice-president-the-munich-security-conference-0>.

[2] “CPAC Hungary 2025 Opens Its Doors with Viktor Orbán’s Fiery Speech,” Hungary Today, May 29, 2025, <https://hungarytoday.hu/cpac-hungary-2025-opens-its-doors-with-viktor-orbans-fiery-speech>.

[3] “Polish PiS Party Selects Historian Karol Nawrocki as Presidential Pick,” Euronews, November 24, 2024, <https://www.euronews.com/my-europe/2024/11/24/polish-opposition-party-chooses-historian-karol-nawrocki-as-presidential-candidate>.

[4] Samuel Samson, “The Need for Civilizational Allies in Europ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28, 2025, <https://statedept.substack.com/p/the-need-for-civilizational-allies-in-europe>.

[5] “Vance Meets with Leader of German Far-Right AfD Party,” Reuters, February 14,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vance-meets-with-leader-german-far-right-afd-party-2025-02-14>.

[6]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На Валдайском Форуме,”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1 октября 2021 года, <https://rg.ru/2021/10/21/reg-ufo/vladimir-putin-vystupil-na-valdajskom-forume.html>.

文明认同提升至国家安全的高度，并明确巩固文化根基的具体任务。^[1]这一价值观导向不仅包含对西方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批判性解构，还暗含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雄心。^[2]部分欧洲右翼视俄罗斯为基督教世界的重要一环，认同其对传统价值观、主权和历史地位的捍卫，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在右翼政党上台后纷纷采取亲美近俄政策，不仅拒绝追随欧盟对俄制裁步伐，而且选择深化与俄罗斯的联系。美俄的保守主义思潮和价值观的回归，也构成两国在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上开展合作的理念基础。

第三，美国民意变化与战略资源再配置的现实需要。一是民意基础的变化。皮尤研究中心 2025 年 4 月的民调显示，53% 的美国受访民众认为美国没有义务援助乌克兰，仅有 20% 受访的共和党人认为俄罗斯是主要安全威胁^[3]。国内厌战情绪的增加给美国政府的对俄乌政策造成压力。二是特朗普内阁的外交安全团队内部出现“反华鹰派”与“稳俄鸽派”合流的趋势，倾向于选择“拉俄制华”。以鲁比奥、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等为代表的对华鹰派，希望通过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停火达成交易，尽快从欧洲安全问题上抽身并重返印太，继续将遏压中国作为核心战略目标。科尔比主张“优先选择”策略，倡导将资源向亚太地区倾斜以开展对华战略竞争，拒绝就乌克兰安全保障问题承担过多责任，并推动削减对乌援助^[4]。

以商业精英关系为依托的特使外交，成为特朗普推动美俄接触的独特渠

[1]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2 июля 2021 года. № 400,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7046>.

[2] 赵隆：《俄罗斯“东转南进”外交的政策路径与局限》，《现代国际关系》2025 年第 9 期，第 75 页。

[3] “How Americans View the Russia-Ukraine War,”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17, 2025, <https://www.pewresearch.org/2025/04/17/how-americans-view-the-russia-ukraine-war/>.

[4] Michael R. Gordon and Lara Seligman, “Pentagon Official at Center of Weapons Pause on Ukraine Wants US to Focus on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3, 2025, <https://www.wsj.com/politics/national-security/pentagon-official-at-center-of-weapons-pause-on-ukraine-wants-u-s-to-focus-on-china-a0c90fda>.

道。美国方面，特朗普选择与俄商界长期保持密切关系的威特科夫作为特使，主导对俄接触和乌克兰和平进程，而主张对俄强硬的乌克兰问题特使、前美军上将基思·凯洛格（Keith Kellogg）被边缘化。在被任命为特使之前，威特科夫名下公司“威特科夫集团”与俄裔美国商人莱恩·布拉瓦特尼克（Len Blavatnik）长期保持合作关系，而后者曾因与俄政府的密切来往被乌克兰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制裁^[1]。俄罗斯方面，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实际主管对美接触和谈判工作，其本人曾在美苏关系缓和后前往美国接受教育，毕业于哈佛大学并就职于高盛、麦肯锡等美大型金融机构，还曾主导多项与西方机构的投资合作。美俄商业精英作为领导人代表建立的特殊沟通渠道，成为两国重建互信基础和关系调整的另一驱动力量。

第四，美俄战略界对“大三角”框架的有限认同。美国战略界受冷战思维桎梏，鼓励特朗普采取“反向尼克松”策略（Reverse-Nixon Strategy），希望通过有限让利改善与俄关系，确保俄在美国涉华议题，特别是关税战等博弈中保持“中立”。鲁比奥提出“美国需要与中俄等大国保持沟通并管控分歧，避免俄罗斯成为中国的‘永久初级伙伴’（permanent junior partner）、从而形成两个核大国共同制衡美国的不利战略格局”。^[2]同时，美尝试减少对跨大西洋关系框架下的安全投入，避免深度卷入欧俄之间的前沿威慑和战略攻防，以期将中美俄三边关系塑造为“等边三角形”，实现“欧俄相互牵制，中俄若即若离”的所谓三角平衡。对俄罗斯而言，借助“大三角”框架强化美国“拉住俄罗斯”的需求，扮演大国博弈的“关键第三方”符合自身战略目标，但并不认同任何“联美制华”的设想。俄罗斯战略界认为，俄应构建平衡的“俄中美”大三角关系，包括在经贸和投资领域，

[1] Yelyzaveta Tkachenko, “Scoop: Trump Envoy’s Conflict of Interest: A Russia-Linked Business Partner,” April 20, 2025, <https://www.counteroffensive.news/p/scoop-trump-envoys-conflict-of-interest>.

[2]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With Matthew Boyle for Breitbart News Network,”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24, 2025,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of-state-marco-rubio-with-matthew-boyle-for-breitbart-news-network>.

但在对美战略上不应有任何反华取向，强调俄美互动轨道不会导致俄中关系的紧张升级^[1]。

四、美俄关系调整的现实障碍

虽然具备观念基础和多重驱动因素，但美俄关系的调整因安全战略的底层逻辑矛盾，长期互信缺失造成的对抗思维惯性，缺乏多元利益互嵌的结构短板，以及内政外交约束造成的执行困境，将面临巨大波动和限制。

首先，安全战略的底层逻辑矛盾。特朗普政府在安全上寻求减少对欧洲的保障承诺，要求北约欧洲成员国将军费开支提高到本国 GDP 的 5%，尝试以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等为支柱，构建起基于主权优先和民族国家的替代性价值框架^[2]。在这一框架内，俄罗斯是欧洲国家主权和传统文化的“主要威胁”之一。欧洲国家普遍恐惧“俄罗斯威胁”，担忧与俄和解会造成下一个“慕尼黑时刻”，多次强调不能接受没有欧洲参与的乌克兰和平协议^[3]。尽管《国安战略报告》尖锐批评欧洲，并发出“文明消亡”警告，但依旧提出“欧洲在战略与文化上对美国仍具有重大意义”，强调“不能放弃欧洲”。^[4]因此，继续利用“俄罗斯威胁”制造欧洲的战略焦虑，使其依靠美国的同时分担防务责任，成为美国安全战略调整的重要一环。

但在俄罗斯看来，2014 年、2022 年两次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是北约东扩侵蚀俄罗斯的安全空间所致。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指出，俄罗斯的诉求是改变东欧的安全格局，为此要求北约放弃支

[1] Сергей Лузянин,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треугольник: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Китая и СШ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8 февраля .2025 года, <https://interaffairs.ru/news/show/50410>.

[2] 吴纪远：《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互动：驱动机制、特征和影响》，《德国研究》2025 年第 3 期，第 72 页。

[3] “US, Ukraine, Europe Allies to Meet Wednesday on Peace Plan,” Bloomberg, April 21, 202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5-04-21/us-may-meet-wednesday-with-ukraine-europe-allies-on-peace-plan>.

[4]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撑自身存在与运转的条款。^[1] 俄罗斯对安全空间的理解基于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希望通过重建战略缓冲地带来确保核心利益不受侵害。但是，特朗普为了施压欧洲分摊北约的安全成本，无法彻底放弃所谓“俄罗斯威胁”的叙事，从而强化俄罗斯与北约的对抗性认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如果北约和俄罗斯之间不能维持合理安全预期，仅在乌克兰危机等议题上达成某种交易，无法满足俄罗斯对西部安全的核心诉求。历史上美俄关系多次“重启”失败也证明，即使双边关系能在短期利益的推动下回暖，一旦俄相应的安全空间受到威胁，俄方必将采取反制措施，进而导致美俄关系再度探底。在北约防御机制持续运作的前提下，特朗普无意也不可能解决美俄关系的深层矛盾，仅靠议题性合作尚难化解两国安全战略的底层逻辑矛盾。

其次，互信缺失和利益单一的结构短板。拜登政府时期，美俄全面对抗格局持续深化，《开放天空条约》最终失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陷入履约危机，冷战后构建的双边军控与战略稳定体系遭受严重冲击。北约北扩后的前沿军事部署与俄罗斯反制形成的安全困境，以及特朗普强推对欧“军费勒索”在客观上固化“俄罗斯威胁”的认知，可能导致双方陷入相互防范与对抗的“死循环”。面对俄罗斯关于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核心限制条款的提议，特朗普并未给予积极和明确的回应，导致作为美俄之间最后一道核军控“护栏”的条约在 2026 年 2 月失效，这表明特朗普尚未将俄罗斯所关心的军控和信任建立机制等作为优先议题。

此外，美国战略学术界的“反俄基因”与俄罗斯社会内部的“疑美惯性”相互强化，导致关键领域的和解举步维艰。即使双方围绕乌克兰和平计划达成共识，俄罗斯关于领土承认、乌克兰裁军和中立、相互安全保障等的诉求，^[2]

[1]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Не надо рассчитывать на больши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РСМД, 31 января 2025 года,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ne-nado-rasschityvat-na-bolshie-dogovorennosti>.

[2] “Putin’s Tough Stance on a Ukraine Peace Plan Shows His Resolve on Russia’s Demands,” AP News, June 1,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russia-ukraine-war-putin-peace-talks-istanbul-7caf1b233b30de0c9683aaa2b042212>.

与特朗普政府以最小代价实现尽早停战、绑定欧洲国家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等的需要并不完全契合。长期的互信缺失导致双方在和平监督和执行机制等问题上难以找到可信方案。

与此同时，虽然美俄元首外交和高层互动得以恢复，双方仍缺乏实质性的利益捆绑，特别是在经贸领域。根据统计，2021年美俄贸易额为344亿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不足1%，占俄罗斯贸易总额的4.3%。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受对俄全面制裁的影响，双方贸易额下降至2025年的约44亿美元，缩水近88%。^[1]同时，俄罗斯积极推行外交层面的“东转南进”和经贸关系多元化，将中国、印度、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作为经济发展新伙伴。特朗普政府在能源领域同样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在全球推销“美国油气”的行为加剧两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竞争关系。特朗普政府明确提出“能源主导权”（Energy Dominance）战略，将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视为削弱俄罗斯能源影响力的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Chris Wright）强调，要帮助欧洲结束对俄油气依赖，并扩大美国天然气出口。^[2]2025年7月，美国与欧盟达成历史性贸易协议，欧盟将在3年内购买总计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包括液化天然气、原油和核燃料。美俄在政治安全议题之外缺乏实质性利益捆绑，成为双边关系调整的另一短板。

最后，内政外交约束造成的执行困境。随着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国安战略报告》描绘的优先议程面临国内司法体系制衡和两党政治博弈的阻力。特朗普个人缓和美俄关系的设想，与美国政府、两党整体的对俄战略框架也存在差异。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等不断抨击其对俄政策，将特朗普政府对俄接触行为形容成“绥靖和投降”。共和党内也不断有力量试图推动对俄制裁法案通过，共和党参议

[1] US Census Bureau, “Trade in Goods with Russia,”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4621.html>.

[2] “ICYMI: Secretary Wright Advances President Trump’s Energy Dominance Agenda in Europ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September 18, 2025, <https://www.energy.gov/articles/icymi-secretary-wright-advances-president-trumps-energy-dominance-agenda-europe>.

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曾起草法案，要求对购买俄罗斯资源的国家征收额外关税，并得到两党 81 名议员的联署支持，^[1]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图恩（John Thune）也再次提交“俄罗斯制裁法案”^[2]。据 2025 年 10 月皮尤研究中心民调，60% 以上美国受访民众认为特朗普滥用行政职权，69% 的美国受访民众认为特朗普过度使用行政权力，给美国带来负面影响。^[3] 特朗普推动美俄关系调整的政策与行动，将成为中期选举季两党激烈博弈的焦点。虽然特朗普可通过总统行政令在某些议题上规避国会限制，但涉及取消对俄制裁、签署经济投资协议、批准俄乌和平方案等关键议题，都面临国会、两党、建制派等各种势力的约束。同时，如果美欧在乌克兰和平协议、对乌安全保障、俄冻结资产处置等问题上缺乏协调，特朗普放松对俄制裁、让俄罗斯重回全球经贸和金融体系的诉求，也可能因欧洲拒绝配合而难以落地。更为关键的是，从美俄乌欧四方之间的多轮沟通进程来看，特朗普在“停火促和”问题上急于求成、缺乏耐心，难以触及领土主权、安全保障，特别是执行机制等深层分歧。如果乌克兰危机从停火到和平的进程不顺利，美俄恢复外交、经贸和军控等议题互动就无从谈起，两国关系的实质性调整也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崇尚的商业交易风格使其关注短期成果和即时收益，有限的战略耐心可能成为美俄关系调整的另一障碍。

五、结语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美俄关系调整，是双方基于价值观、秩序观和利

[1] Max Rego, “Graham Pushes Trump on Russia Sanctions after ‘Here We Go!’ Post,” The Hill, October 9, 2025, <https://thehill.com/homenews/senate/5496413-lindsey-graham-russia-sanctions>.

[2] “Thune: Time to Move on Russia Sanctions Bill,” Politico, October 16, 2025, <https://www.politico.com/live-updates/2025/10/16/congress/thune-graham-blumenthal-russia-sanctions-bill-timeline-00611544>.

[3] Andy Cerda and Steven Shepard, “Most Americans Think Trump Is Trying to Exercise More Power than Previous Presidents,”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8, 2025,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5/10/08/most-americans-think-trump-is-trying-to-exercise-more-power-than-previous-presidents>.

益观的变化，以及内外战略调整和环境变化共同作用下的阶段性转向。双方以乌克兰危机止战促谈为现实抓手，通过重启高层互动、恢复有限沟通，尝试缓和拜登政府时期陷入全面对抗的双边关系。这一进程既体现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与特朗普执政理念对外交政策的外溢影响，也反映出俄罗斯在国际格局加速演变背景下巩固战略地位、改善外部环境的现实考量。

从底层逻辑和结构性条件来看，美俄关系调整的空间和深度均存在明显制约。一方面，双方价值观、秩序观和利益观的调整更多源于现实主义考量和工具理性驱动，其核心目标在于缓解战略压力、降低竞争成本和争取政策主动，而非重建稳定、可持续的战略互信基础。另一方面，北约持续扩张与俄罗斯安全空间诉求之间的根本矛盾并未消解，传统欧洲安全架构崩塌的结构性张力依然存在。在此背景下，当前美俄关系调整本质上仍属于围绕特定议题展开的有限交易，尚不足以支撑双方实现战略层面的全面和解。

从外溢效应看，美俄关系调整导致长期以来支撑西方对外战略的“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出现松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以利益交换、势力范围和大国协调为特征的权力政治抬头，并对跨大西洋关系赖以维系的价值认同和战略共识形成冲击。美国对俄接触与对欧施压并行的方式，进一步放大了美欧双方在安全责任分担、对俄政策和战略目标上的分歧。然而，既不能低估此轮美俄关系调整对欧洲安全格局和国际秩序演变的潜在影响，也不宜高估其改变战后国际体系运行逻辑的能力。在缺乏制度化安排、战略互信和多层次利益纽带支撑的情况下，基于元首互动的美俄关系调整仍具有较强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容易受到国内政治周期、地区热点冲突以及大国战略博弈变化的影响而出现反复，其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均存在明显短板。

【责任编辑：王玉莹】

Abstracts

The Vision of Shared Prosperity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JIANG Shixue & ZHOU Q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embodies a vision of shared prosperity, whose core elements include common development, universal benefits and inclusiveness, win-win cooperation, and the sharing of development outcomes. This vision charts the course for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ghlights the paramount importance of development, sets a grand objective for narrowing the North-South gap, injects new substance into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fuels the momentum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onversely, the lack of shared prosperity would undermine lasting global peace and stability, hinde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obstruct the cultivation of harmonious North-South relations. It would also compromise collective responses to global challenges, impede world economic growth, disrupt political stab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ultimately dete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developed nations themselves. To forge a world of shared prosperity, China has launched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and prioritiz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urrently, China ensures the robust, long-term growth of its own economy, steadily expands its high-level opening-up, advances high-quality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drive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through concrete actions,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pioneer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The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rom Concept to Reality

WU Chuanhua

From the proposition that “China and Africa have always been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o the vision of a “closer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en the commitment to a “high-level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d most recently to an “all-weather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the new era,”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s of the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Its intellectual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have been further strengthened, demonstrating growing vitality, influence, and appeal. Ov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development, the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practice at multiple levels, across diverse fields, and throughout African countries, yielding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consistently remaining at the forefront of efforts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As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re accelerating across the world, China and Africa are facing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Standing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China and Africa ne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solidarity and cooperation, and jointly advance modernization that is just and equitable, open and win-win, puts people first, features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eco-friendly and underpinned by peace and security. They should also pursue high-quality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enhance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and fully implement the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on development, security, civilization, and governance. These efforts will open up new pathways, create more favorable conditions, and unlock broader

prospects for building an all-weather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the new era.

Trump's "Common Sense Revolution": Ideological Formation, Political Practice, and Paradigmatic Conflict

LIU Feitao

In his 2025 inaugural address for his second term, Donald Trump formally introduced the notion of a "Common Sense Revolution," and framed it as an overarching ideological agenda covering reforms in politics, the economy, socio-cultural affairs, and the federal bureaucracy. Far from being a temporary campaign slogan or a rhetorical device for advancing specific policy proposals, the "Common Sense Revolution" represents a populist-conservative political project that departs from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s of "common-sense politics." It mobilizes support under the banners of anti-elitism, anti-establishment politics, and opposition to "woke" ideology; takes "America First" as its core normative commitment; relies on executive centralization and results-oriented pragmatism as its governing instruments; and draws its social base from domestic blue-collar workers and the conservative middle class. At the ideological level, it constructs binary opposi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elite," "common sense" and expertise,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globalism.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it seeks to expand presidential executive authority, restructure the federal civil service, and simplify the logic of governance.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t accelerates the erosion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contributes to a worldwide resurgence of sovereignty-centered nationalism. The "Common Sense Revolution" has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both US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Yet it remains constrained by the

historical pattern of partisan swings in American politics, nor is it likely to deliver the institutional renewal that its advocates envision.

The Tech Right in American Politics: Influence and Challenges

ZHAO Minghao & JIANG Xingyu

The rise of the tech righ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notable development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litics. Guided by ideologies of technological supremacism, libertarianism, and techno-nationalism, the tech right advocates harness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transform public governance, reinforce America's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nd advance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evolving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US government and major technology firms, the deepening polarization of the US political landscape, and the widening polic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major parties have led to the rise of the tech right and its willingness to intervene directly in politics. To this end, the tech righ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embedded in the oper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by supporting electoral campaigns, assuming government positions, and leverag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which has disrupted party-voter alignment, exacerbate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fluenced the political agenda, and left a growing imprint on US technology strategy and policy-making. Meanwhile, the tech right's ability to translate political influence into durable policy outcomes faces constraints, including tensions between elite and mass interests, the misalignment between commercial and national security imperativ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reformist ambitions and institutional inertia. The constraints cast uncertainty over the long-term effectiveness of the tech right's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the future of its alignment with the Republican Party. The rise of the tech right signals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olitical parties,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technology elit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broader implications of this interactive mode warrant continued attention.

From Order to Power: The Evolution of Revisionist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NG Hao

The first Trump administration challenged the conventional assump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at hegemonic powers are inherently inclined to uphold the status quo, making revisionism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nalytical lens for understanding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Trump administration, US revisionist foreign policy has undergone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It has evolved beyond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a more systematic challenge to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is shift is reflected in efforts to establish spheres of influence, exert maximum pressure on other states, employ coercive military instruments, and pursue territorial expansion in order to secure greater material gains and reinforce US power advantages. The shift from order-oriented to power-oriented revisionism is rooted in the continued rise of conservative populism, the consolidation of an increasingly centralized style of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the growing interaction between domestic political dynamics and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lthough this transformation has further undermined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US global leadership, it remains constrained by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power, and the structural limitations of the US political system.

The Recalibration of US-Russia Relations: Ideational Foundations, Driving Forces, and Practical Limits

ZHAO Long

Since Donald Trump's return to the presidency, US-Russia relations have entered a new phase of limited recalibration. At the ideational level, this adjustment reflects a shift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lying strategic outlook: from fram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s a "contest between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to prioritizing transactional interests; from upholding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to recogniz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as an organizing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rom a zero-sum conception of interstate relations to one that emphasizes the pursuit of mutual gains. The reduced salience of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has created a more permissive environment for bilateral engagement. The adjustment has been driven by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including Trump's preference for projecting the image of a strong political leader, the parallel resurgence of conservative political currents in both countries, changing US domestic opinion and the imperative of reallocating strategic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limited convergence among US and Russian strategic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 relevance of a "grand triangle" framework. However, the scope of bilateral rapprochement remains limited due to the two sides' enduring differences over security strategy, deeply entrenched adversarial threat perceptions, the absence of broad-based mutual interest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omestic political constraints and foreign policy commitments. As a result, the current adjustment is best understood as a form of issue-specific transactional accommodation rather than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reconciliation.